

南京民國總統府遺址考實

南京中國近代史博物館（籌）

高丹予 主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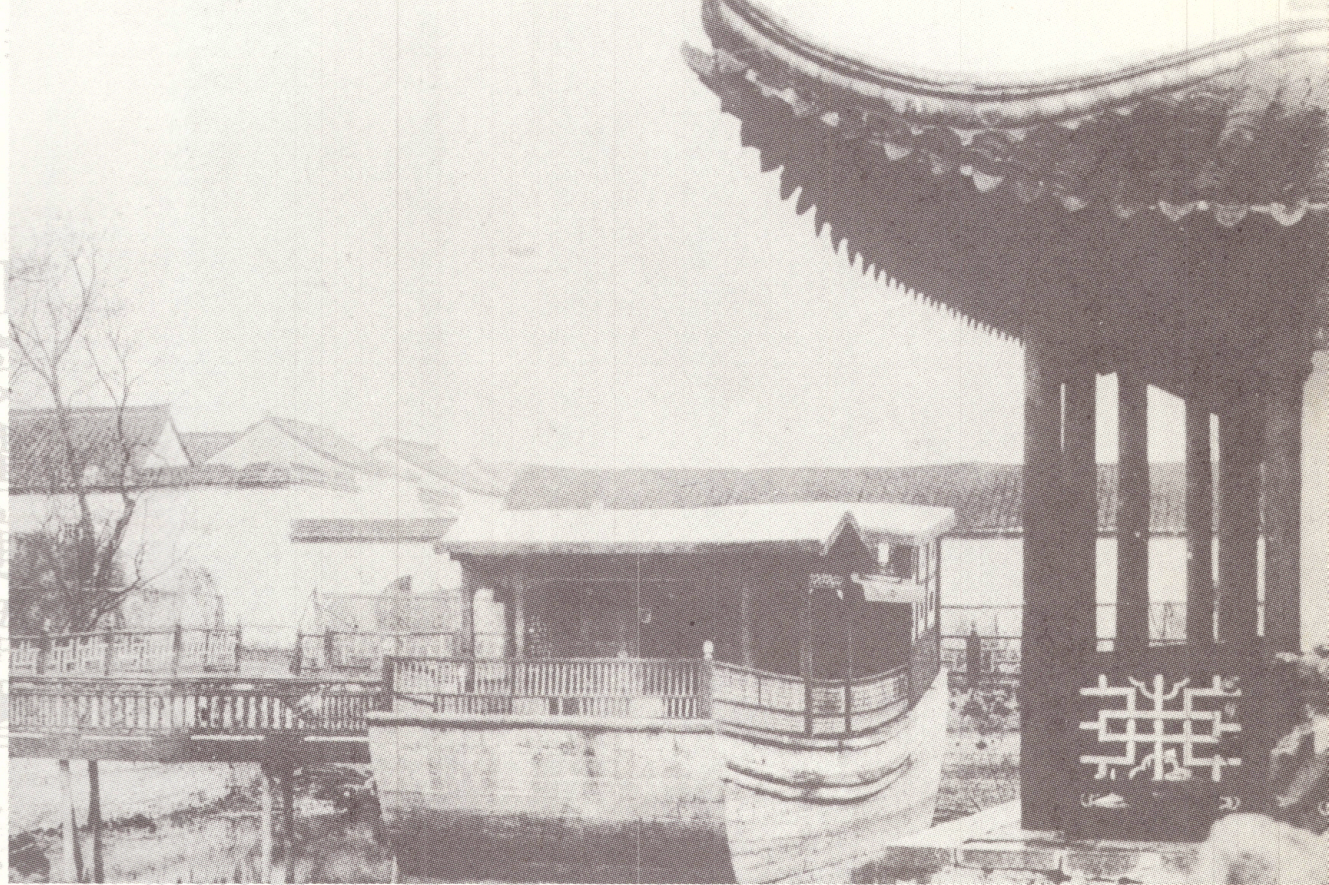


十三號
對
雜稅
康熙

尚署
復城後

有奇十年正
房屋四百八
一十六間廁屋
一百四號箭
又吹鼓樓二
方一石船一
坊日兩江保
初皖藩司移
仍就舊基建
工六年九月
對街經造號
造花廳三間
岸係藩司梅
日宣化又二
南方岳日表
小房屋穿堂

一座半邊式



清兩江總督衙署西花園內石舫

石山一座
部竹木稅兼收戶
有東西織染局
總督

就舊基建
週共折方五百六十大丈
月工竣新造正宅大小

共壹千壹百八十九間
一週水溝五百六十餘
江藩司本在蘇州而此
為安徽布政司署乾隆
麻在淮清橋東司署
再升高街道五年四月
一十九間外司署東首
又舊制瞻園已圯今續
月亭一座並月臺石橋
朱井闌署前二坊日承
年十二月工竣仍就舊基

率羣寮
江安
走廊一百四
計軫恤民生
江甯鹽道

建置

南京民國總統府遺址考實

NANJING MINGUO ZONG TONG FU YI ZHI KAO SHI

南京中國近代史博物館（籌）

高丹予 主編



《东南文化》2000 增刊 2

顾 问：季根章 蔡鸿源

主 编：高丹予

副主编：张祖方

编 委：高丹予 张祖方 徐晓虹

曹 翔 缪 晖 沈 旻

序

古城南京,不仅是六朝古都、十朝立会之名城,并且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饱经沧桑、历经锤炼。位于南京的民国总统府遗址及建筑遗存,更是留下了不同时代的层层烙印。长期以来,由于种种缘由,人们对其遗址和遗存的变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主观臆断、或以讹传讹,以至于仅成为游人赏光猎奇的场所,失去了其作为历史文化遗迹的真实含义和价值。

现编者将南京民国总统府遗址和建筑遗存考实之论述资料与旧照片汇集成册,并嘱为序。阅后,深感编者认真查阅古籍档案文件和原始图文资料,多方佐证,客观分析,去伪存真,实事求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可敬精神,力求真实反映该遗址和建筑群体的原貌,还其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考实》不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南京民国总统府遗址的变迁,且细致考察了此处建筑群兴衰之状况,是一部史料翔实、立论准确、文字简练、图片鲜见,集学术性、资料性于一体的史论集。

南京民国总统府遗址,是认识旧中国曲折过程的难得的遗存所在。这对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及民国史大有裨益。时常披览前踪,有利于继往开来,有利于我们提高认识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历程的成败得失,从而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我想,这就是编纂这本集子的主要目的。

蔡鴻源

2000年3月于南京煦园

目 录

- 序 蔡鸿源
- (6) 南京民国总统府遗址考实 高丹予
- (96) 南京总统府遗址明汉王府质疑 高丹予
- (105) 南京市长江路 292 号大院建筑遗存考 张祖方
- (119) 天朝宫殿及天朝朝仪 张德坚
- (123) 天王宫 [英]Forrest 简又文 译
- (126) 江浙联军血洒金陵 徐家阜 郁 琰
- (137) 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始末探析 一 凡 晓 虹
- (149) 推行奴化教育的工具——大民会 一 凡 曹 翔
- (153) 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见闻数则 汤又新 丁绍兰
- (158) 我所知道的蒋介石总统府 朱明镜
- (171) 林森与台湾的情缘 一 凡 夏 彪
- (178) 李宗仁在南京任副总统与代总统的日子 沈 旻 沈 岚
- 编后记 编 者

CONTENTS

- PrefaceCAI Hong – yuan
- (6)The Documents about Relics of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of Republic of China
in NanjingGAO Dan – yu
- (96)A Study of Han Prince Residence Ming Dynasty at Presidential Palace in Nanjing
.....GAO Dan – yu
- (105)A Study of the Relics of Complexbulidings on Changjiang Road 292, Nanjing
.....ZHANG Zhu – fang
- (119)The Palaces and Ceremonies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ZHANG De – jian
- (123)Tianwang Palace
.....[England] Forrest Translated by JIAN You – wen
- (126)The Bloody Battles with Jiangsu – Zhejiang Joint Army in Jinling
.....XU Jia – bu YU Tan
- (137)Analyse of Japanese Puppet Government in Republic of China from Beginning
to EndYI Fan XIAO hong
- (149)Promotion Enslavement Education by Daming HeiYI Fan CAO Xiang
- (153)The Informations about Government and Presidential Palace of Republic of China
in NanjingTANG You – xin DING Shao – lan
- (158)My Knowleges of CHIANG Kai – shek Presidential PalaceZHU Ming – jing
- (171)The Relationships of LIN Shen with TaiwanYI Fan XIA Biao
- (178)Life of LI Zong – ren in NanjingSHEN Min SHEN Lan
- Edit NoticeEditor



南京民国总统府遗址考实

高丹予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战士站在南京总统府门楼上欢庆胜利，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衰败、黑暗、屈辱的历史就要垂下帷幕，进军的号角预示着一个振兴、光明、辉煌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在中国近代史上，古城南京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数次成为当时政权的所在地，一度还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市内中心稍偏东北的长江路^[1]292号大院——原国民党政权的总统府，曾几度是政府机构的设置处，近代中国的许多大事都曾发生在这里或与这里有关，知名度大，历史内涵深厚。该院占地51240平方米，合5.124公顷，有自晚清到民国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82幢，大小房间520余间^[2]，建筑面积27268.12平方米，使用面积14414.5平方米^[3]。该院最早为清顺治四年（1647年）修建的总督衙署。太平天国时期（1853~1864年）为天朝宫殿。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旋又为两江总督衙署所在地。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在此办公。孙中山离职后至民国十六年（1912~1927年），为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时期（俗称北洋政府时期），此处为临时政府留守府、都督府、讨袁军总司令部、将军行署、督军公署、副总统府、督办公署、联军总司令部。民国十六年（1927年）为国民政府所在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在此成立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为汪伪国民政府的监察院、立法院、考试院的办公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从陪都重庆迁回原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为中华民国政府



元明史料筆記叢刊

庚巳編 客座贅語

[明]陸粲撰
顧起元撰

中華書局

史料笔记《庚巳编》和《客座赘语》是明人写明事的记载。其中，顾起元撰《客座赘语》（[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刻本）皆为南京故实。文中考证纪实，后为清及民国时期诸多地方志沿用。

客座贅語

一六〇

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錦衣之東園，清遠者有四錦衣之西園。次大而奇瑰者，則四錦衣之麗宅東園，華整者魏公之麗宅西園。次小而觀者，魏公之南園，與三錦衣之北園，或必遊勝園中。蓋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楡栢，而無石。方叔詒中不稱有靈石為峯嶺者可推。已所記諸園凡有十六：一曰東園，記稱近聚賢門，稍遠，園在武定橋東城下，西與教坊司鄰，今廢圮。二曰西園，在城南新橋西，魏時倉南，記稱鳳臺園，誤，其隔弄者乃鳳臺園也。今再易主，屬桐城吳中丞。三曰鳳臺園，記稱鳳皇臺，此中舊有一巨石，為陳延尉載去，今廢為上瓦官寺。四曰魏公南園，本徐八公字所創，後轉入魏公，在府第對門。五曰魏公西園，在魏公第之右，多石而偉麗，為諸園之冠。六曰四錦衣東園，在東大功坊下。七曰萬竹園，在城西隅，地大，皆種竹，今為汪節部限太守。計神農分有之。八曰三錦衣北園，在府第東弄之東。九曰金盤李園，在下忠貞廟西，今廢圮。十曰九公子家園，在府第對門。十一曰莫愁湖園，在三山門外莫愁湖南，今圮。以上皆仲山王諸邸所有也。十二曰同春園，齊王孫所創，在南門內沙窩小巷，今為它人分據。十三曰定侯竹園，在竹橋西，漢府之後。十四曰市隱園，在武定橋油坊巷，即魏元白所創者。今南半為元白孫憲副充初拓而大之，北半為故侍御何仲雅，改名足園矣。十五日武臣園，在南門內小巷內，記稱武憲副之第，非，乃憲副之叔名易者。今數更主。十六曰王賓士把園，在廣門外小市西之弄中，其門北僻城墻，實士官縣令。當徐州官南都時，諸園如顧司憲之息園，武憲副之佳傍園，齊王孫似孫之烏龍潭園皆可紀，而未之及也。

古園

古園苑之在志者，麻林園，本吳宮苑，晉及陳皆名麻林，在臺城。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宋元嘉中，以其地為北苑，後改今名。顧延之有三月撰賦詩序。上林苑，在雞籠山東陽寺後，宋初築於玄武湖北，梁武立名西苑，梁改名上林。南望苑，在城東七里，齊文惠太子所立。沈約郊居賦云：「瞻東嶽以流目，心悵愴而不怡。昔儲皇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謝玄暉詩：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即此。婁園苑，齊武帝築齊漢後宮，作婁園苑，青林苑，在廣門北，靈丘苑，齊武帝立，在新林界。方山苑，在方山側，齊武帝立。江潭苑，在新林路西，梁大同初立。西園，齊安帝元興三年，桓玄築於冶城。芳林苑，一名桃花園，一名芳林園，齊高帝舊宅，在古湘宮寺前。芳樂苑，齊東昏即臺城闕武堂為芳樂苑，在今覆舟山前小教場地。建興苑，梁立於陳墟里，在秦淮南岸。玄園，齊文惠太子立，在臺城北。南苑，宋有之，在瓦官寺東北。桂林苑，南朝宮苑記在落星山之陽。東籬門園，梁何點所寓，內有下忠貞家，即今冶城西地，一云即烏府村。南唐北苑，徐鉉有北苑侍宴賦序，云：「望瀟嶠之英姿，祝為聖壽，泛湖漣之清淺，流作恩波。」在城北金波園，南唐，未詳其處。烏衣園，在烏衣巷之東，王、謝故居，一堂扁曰「米燕」。馬光祖新之，堂後

客座贅語卷五

一六一

《客座赘语》中有关竹桥、武定侯竹园与汉王府位置的记载。



总统府。

南京总统府门楼所在地的这个历史舞台上，在近代中国曲折的进程中，演出过一幕幕壮烈与欢庆的活剧，经历过一次次失败与屈辱的痛苦。门楼是历史的见证，100多年的近代史，象一条灾难深重、又奔腾咆哮的大河，在它面前滚滚流过。它曾经看到和听到过：钦差大臣偕制台大人匆匆赶去与夷人签订帝国的第一个屈辱的条约；太平军将士与清湘军在天朝宫殿内浴血奋战；反清联军惊天动地的枪炮轰鸣响彻天堡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庄严军乐声划破夜空；二次革命讨袁军战士在与辫子军厮杀；北洋军阀的混战与走马灯似地幻影；洒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奠都典礼；群情激奋的爱国青年抗日的怒吼；太阳旗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卑躬屈膝的卖国傀儡政权；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复仇的枪声；悲喜交集的还都庆祝会；蒋介石“行宪国大”竞选总统的闹剧；爱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这一切都在它的面前发生，沉重的历史为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感叹和深思。

一、前期总督衙署(1647年8月~1853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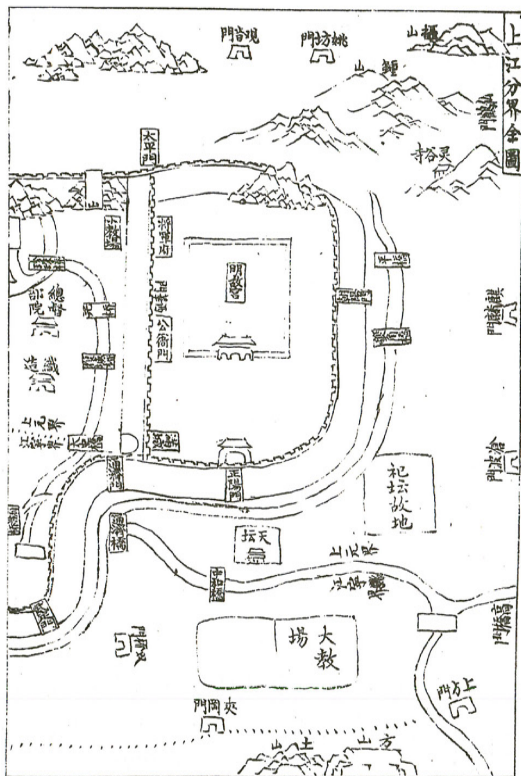
清顺治二年(1645年)农历四月，豫亲王多铎(清睿亲王多尔袞之弟)率清军南下渡淮河经泗州至扬州，“围七日，克之”，明守城将领南京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壮烈殉职^[4]。五月，多铎率军抵南京长江北岸，“明福王朱由崧(宏光帝)逃往太平府(今安徽省当涂县)，忻城伯赵子龙等率文武将吏投诚”。闰六月，清世祖福临命明降将、大学士洪承畴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改南京为江南省(江苏、安徽两省合称)，应天府为江宁府。四年二月，“江南众郡县以次定”；七月，初置辖江南、江西、河南三省总督，驻江宁^[5]。六年，改总督辖江南、江西两省；十八年，两省分置总督。“康熙元年(1662年)，加江南总督操江事务；四年，复并为一；十三年，复分置；二十一年仍合。寻定名两江总督。雍正元年(1723年)，以综治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加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道光十一年(1831年)，兼两淮盐政。同治五年(1866年)，加五口通商事务，授为南洋通商大臣，与北洋



公衙門在滿城內
 總督部院衙門在府治東北汴府東門
 將軍府在滿城內
 織造府在督院前
 總兵府在四條巷大街
 安徽布政司衙門在府治南舊大功坊內
 江蘇布政司衙門在本司左

雅興矣
 斯亭而大
 燕遊之地乎可以養性情焉可以比物我焉
 蓋也此先憂後樂之心也而居之無倦而
 前停大以用時必將於斯于有契焉爾斯
 雅興矣

[清]陈开虞纂修《江宁府志》(康熙七年[1668年]刻本)中有关总督署与织造署位置的记载。



江寧縣新志卷一

[清]袁枚纂修《江宁县新志》(乾隆十三年[1748年]刻本)卷首“上江分界全图”中总督署与织造署的位置。



漢府今駐防城西華門尚衣局本漢府舊址明洪武初封陳友諒子理為漢王建府西華門外後徙高麗永樂封高煦為漢王居之後為織局九連塘在常府北為常府園池舊址按開平王府即今倭緞堂其府西牌樓今名花牌樓明季嗣侯名延齡上章劾馬七英掛冠為僧種菜湖孰其子孫有湖孰種菜圖

倒鐘廠明時建鼓樓於神策門內岡上地勢最高俗謂之鼓樓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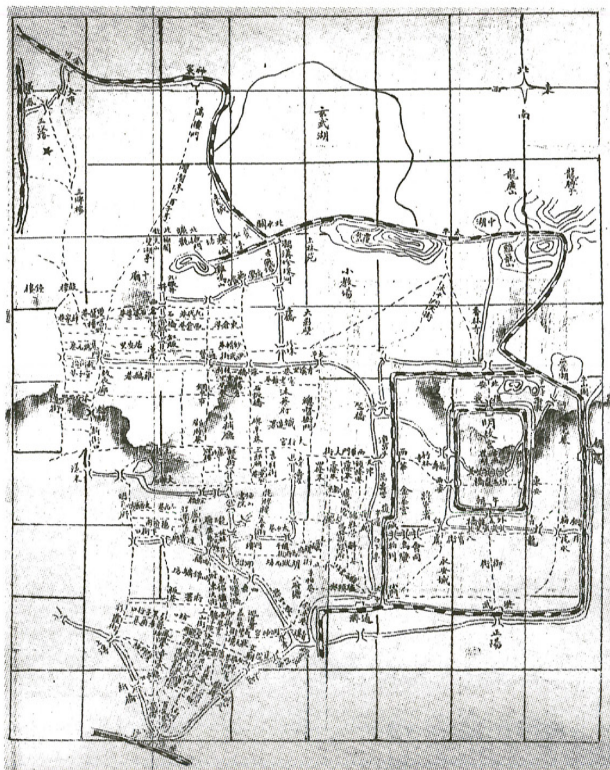
國初樓倒今建

新修江寧府志 卷之八 古蹟 二十五

[清]吕燕昭修、姚鼐纂《新修江宁府志》（嘉庆十六年[1811年]刻本）中有关明汉王府变迁的简述。

賜督署齋
不繫舟
賜藩署齋
瞻園
樓霞
行宮
武夷一曲精廬
蘿壁峭中尋昔句
松軒勝處得今停
奇松詭石天然淨
桐草山花自在芳
樓霞各名勝

《新修江宁府志》中有关高宗弘历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次南巡时在总督署西花园内赐书“不系舟”的记载（文中藩署齋；即藩司署，今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清]陈作霖编纂《金陵琐志五种》，冯煦撰《钟南淮北区域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刊本)卷首的“金陵全图”中总督署、织造署、沐英府的位置。

<p>御賜廊是也</p> <p>小教場</p> <p>俗呼小營古樂游苑也為綠營訓練之所及三年大比試武生於此清時車駕南巡皆閱鎮將射於教場</p> <p>中有演武臺</p>	<p>竹橋</p> <p>明武定侯竹園在竹橋西漢府之後漢府者洪武初封陳友諒子埋為漢王建府西華門外後徙高麗永樂中封子高煦為漢王亦居之旋以反誅清初改為</p>	<p>織局</p> <p>西華門街</p> <p>舊有劉文成基王文成守仁一公祠今毀其北向有毘盧菴光緒中湖南僧海峰募湘軍諸將資重修之大雄殿萬佛藏經二樓規制皆備遂改菴為寺焉</p> <p>過三條巷口</p> <p>巷內有文昌宮殿闔宏壯巷又名仁孝里里人趙拱辰子自明孫咸至皆以純孝稱故錫名以旌異之</p> <p>四條巷口</p>
--	---	--

[清]《钟南淮北区域志》中有关明武定侯竹园的方位及汉王府沿革的记载。



遥峙”^[6]。

“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7]。两江总督是清八总督之一，排列仅次于直隶（依次为陕甘、四川、闽浙、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一人”^[8]。

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清首任总督马国柱^[9]始在明汉王府后面、黔宁王沐英府东面，即武定侯郭英的竹园内修建总督衙署^[10]。康熙二年（1663年），曹玺（曹雪芹的曾祖）以内务府郎中身份由京赴第一任江宁织造^[11]，遂将设在后湖（今玄武湖）畔的明染织局改名为江宁织造署，旋即迁往总督衙署前，将明汉王朱高煦的旧府第改建为江宁织造衙署^[12]。在这里，曹氏祖孙三代承袭江宁织造达60年之久。

总督衙署的主体建筑，最前面是黑漆巨型八字大门，左右红色立柱，衙前广场宽阔，重门掩处肃穆威严。进门是大堂，为中轴线穿堂式建筑，其后是二堂、三堂，再后是任官住所。左右两侧有朝房或长廊，作收捐、收费、签押、听差之用。左走廊后面是监狱，为衙署连体建筑，警卫森严^[13]。

衙署大院西侧是花园。园内引青溪河道小溪流入，遂凿成一卧瓶状小湖。乾隆年间，湖中建有石舫一座。船牙底部用砖石雕刻，船舱为木结构，彩绘浮雕，具有传统工艺特色。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高宗弘历二次南巡到南京时曾赐书“不系舟”^[14]。

最初的总督衙署建筑，经太平天国修造天朝宫殿后已不复存在，仅西花园内石舫尚存。

二、太平天国天朝宫殿（1853年5月~1864年7月）

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初十，太平军克南京，定都于此，易名天京。当年四月，即在总督衙署原址上加以改扩建，修造天朝宫殿。“日驱男妇万人，拼力兴筑，半载方成”。“工甫成，即毁于火”。“四年正月复兴土木，于原址重建伪宫”^[15]。由此，天朝宫殿建筑分前后两期，其后较前宏大。天朝宫殿因实物完全无存，考证无凭。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清湘军进城后将天朝宫殿内财物抢掠一空，浙江巡抚、湘军统领曾国荃（曾国藩之弟）又纵



兵焚烧7日。6年后始重建总督衙署,然已面目全非。另,有关天朝宫殿的记载,各家互有出入,或根据传闻,或虽目睹,然因所记时间前后不同,且各人所记多凭记忆,不免有失实之处,互相矛盾亦在所难免。现比较各家异同,取其可信者,将天朝宫殿的概貌介绍如下:天朝宫殿又称天王府。建筑范围以原总督衙署为基础,向东西两方向扩展、南北两方向延伸。据《金陵杂记》载,“东边由黄家塘以至利济巷,西首由箭道绕至北首外(今大行宫十字路口以北、太平北路东面一带),围墙民房全行拆毁,平地又挖成沟渠;南首民房由卫巷等处拆至大行宫长街(今大行宫十字路口一带)”^[16]。其北面所至不详,然以地势及东西南三面所至远近考之,当北至杨吴城濠南岸(今浮桥东至太平桥西一段),此处不仅便于守卫,且有现成城濠,不必另挖濠沟。从以上范围来看,天朝宫殿的地盘几乎包括总督衙署、乾隆行宫(原江宁织造衙署,即明汉王府)^[17]、明黔宁王沐英府旧址的全部在内^[18]。

据《贼情汇纂》载,天朝宫殿“曰宫禁。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19]。城之高度,各说不一:《金陵杂记》说“据称有二丈高四尺宽,墙头嵌砌碎磁瓦锋”^[20];《金陵省难纪略》则说“筑围墙,厚三尺,高三丈”^[21];《天京游记》叙述说“天宫甚广,围以黄墙,墙高四十英尺”^[22]。外重宫墙之外,并“挑挖濠沟”^[23]。

太阳城(外重宫城)正门,《贼情汇纂》说“用黄色涂饰,向南开门,曰天朝门”^[24],《金陵兵事汇略》称为“荣光门”,上冠以“真神”二字^[25];《金陵杂记》则说因“门上雕刻双凤,遍贴泥金,……称之为凤门”^[26]。“门之两旁设东西朝房二所”,“每处约房五、六间,内外各三层”,“外墙内厅”^[27]。《贼情汇纂》谓天朝门“前丈余开河一道,宽深二丈,谓之御沟,上横三桥,以通往来”^[28]。《金陵杂记》则谓“凤门前十余丈又挖长方坑一道,……上搭木桥,旁有栏杆,涂以黄色,……谓之五龙桥,并有伪典造五龙桥石匠总制”字样^[29]。桥前有牌坊一座,《贼情汇纂》称“用红黄绸绉扎成彩棚”^[30];《金陵兵事汇略》说上有“天堂路通”四个大字^[31];《金陵杂记》则说“上有立匾,亦系全金,上刻‘天朝’二字”^[32]。桥南有高台,《贼情汇纂》和《金陵杂记》中均称



之为“天台”，为天王洪秀全“十二月初十生日登台谢天之所”^[33]。《金陵省难纪略》说天台“高二、三丈，方广四、五丈，四围设栏杆，用黄布遮，台脚支梯倚台，宽丈余，长五、六丈，亦有栏名天桥”^[34]。《金陵杂记》又说“台前又筑一坛，约数尺高宽，云系礼拜时焚烧贼衣并牲品之所”^[35]。天台两旁，《贼情汇纂》谓“数丈外，建木牌楼二，左书‘天子万年’，右书‘太平一统’。牌楼外有下马牌，东西各一”^[36]。《金陵杂记》则称“天台两边又竖立左右两牌坊，上书‘左旁门’、‘右旁门’字样”^[37]。天台之南，《贼情汇纂》称“过桥一里，砌大照壁，高数丈，宽十余丈”^[38]；《金陵杂记》则称“桥之南又数十丈旧基，将至大行宫街处，砌一照墙，其高宽倍于小营之大影壁，壁上绘双龙双凤”^[39]。

金龙城(内重宫墙)正门，据《天京游记》叙述，“正门上有一匾额，金漆色辉煌夺目，上书‘真神圣天门’，两旁列大鼓二”，“墙内可见黄色绿色的屋瓦(琉璃瓦)，又有两座很美的亭子”^[40]；又据《金陵兵事汇略》称，“门内为朝房，东西各数十间。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为栏，上镂双龙”^[41](1982年秋，在今长江路292号以西，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办公室地下发掘出一井，其井栏确系五色石砌成)。《天京游记》又称，“在宫之前门，有一黄色大照壁，长约三百码，上涂……龙多条”^[42]。《金陵杂记》说，“去秋又于督院照壁外，另起高大门楼一座，……称之为凤门。……凤门前十余丈，又挖长方坑一道，……上搭木桥，桥之南又数十丈旧基，……砌一照壁，……绘双龙双凤”^[43]。可见天朝宫殿前大照壁有二：其一原在圣天门前，为天朝宫殿前期的南界(当是今南京总统府前的照壁位置)；其后期向前延伸，此照壁是否拆除，不得而知，但按常理似应加以拆除(今南京总统府前的照壁，当为后人所建)。另一在“桥之南又数十丈”，即“将至大行宫街处”，为后期的大照壁，“上绘双龙双凤”，与前一照壁仅绘“龙多条”不同。

据《贼情汇纂》称，天朝宫殿的正殿曰“金龙殿”^[44]。《金陵兵事汇略》说“殿前牌坊一，上下雕龙，文饰金彩”，“殿尤高广，梁栋涂赤及以龙凤，四壁彩画龙凤狮象”^[45]。其后宫内室，“多至千数百间”^[46]，《贼情汇纂》则说



不智者也神民之官不立孰與達天人之際哉上江緊望百城於是觀禮矣作祠祀考以俟後之君子

同治上江兩縣志卷十一

考建置

往者粵匪作逆陷金陵偽稱為天京踞總督署為天王府始居旋徙墮明西華門一面城自西長安門至北安門南北十餘里窮甌石築宮垣九重毀祠廟數衙署夷壇墀攫倉庫圮橋梁斫竹木堙窪峻高塲上下數百里宮室陵墓坊表柱礎作偽宮殿苑囿餘建偽王府宮廡大小百餘所如是者十三年工作弗息蓋盜賊凶疏之久者也天地閉塞百產匱絀賴同治三年夏六月十六日浙撫威毅曾伯六太平門城墻入焚烈穢惡翦刈萌蘖雖天清地坦而城郭殘破荆棘繁生相國以下僦居民舍於是召流匪振窮恤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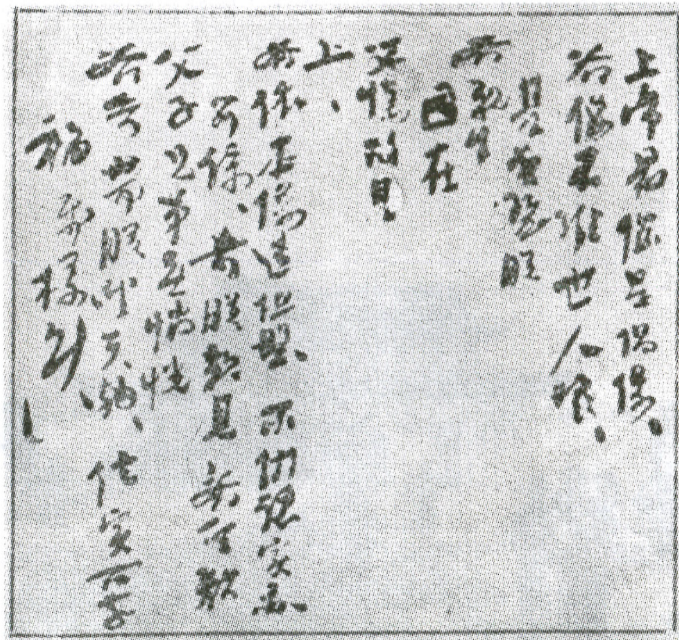
[清]莫祥芝、甘绍盘修、汪士铎等纂《上江两县志》(同治十三年 [1874 年] 刻本) 中有关太平天国建造天朝宫殿的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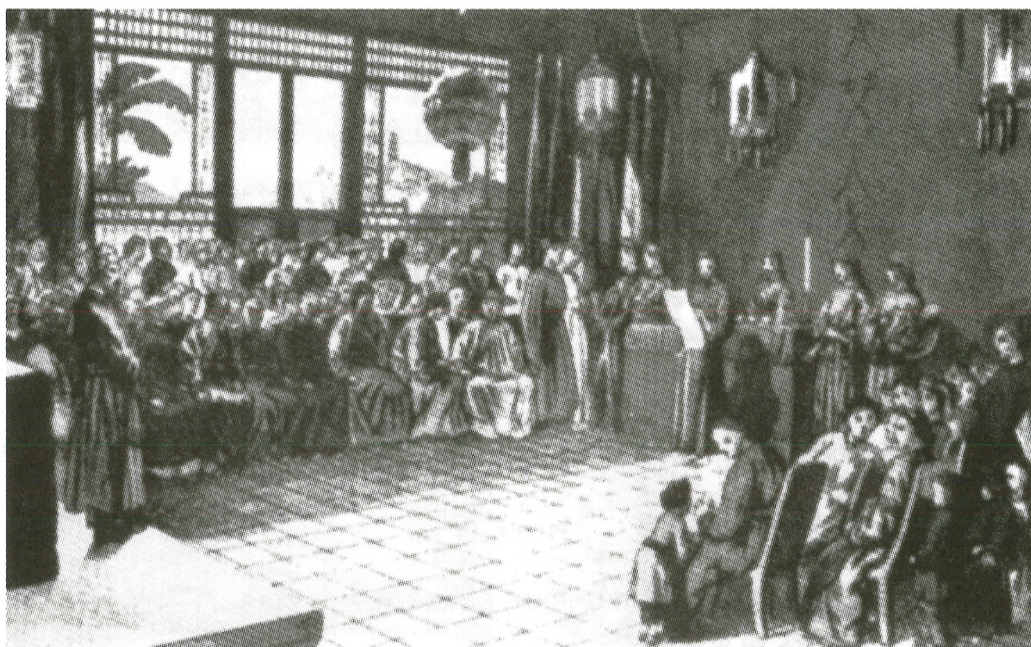
天朝宫殿圣天门。(当时外国人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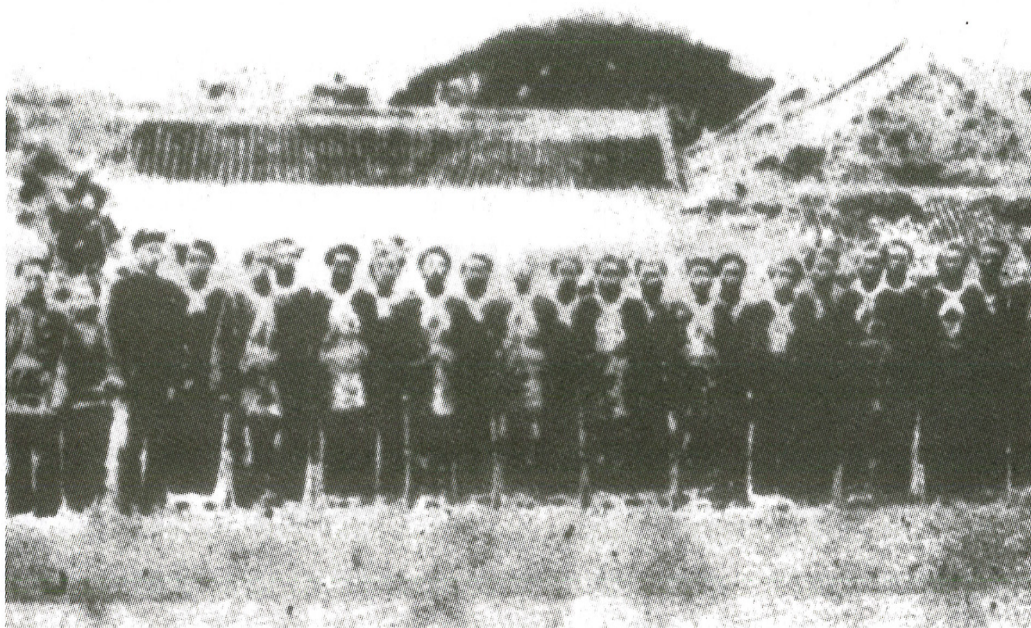
天王洪秀全(1814~1864年)。(当时外国人绘)



洪秀全手迹。(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太平天国官员礼拜上帝。(当时外国人绘)



太平军将士。(约 1860 年摄)



有苑,称为“后林苑”^[47]以上为后期天朝宫殿的大概景况。天朝宫殿存留的实物,经今人多次考证,“仅有西花园内的石船及小隍城巷(今长江路东口以西,南京总统府前东南面小巷)的牌楼石柱和座子而已”^[48]。

三、后期总督衙署(1872年5月~1911年12月)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清湘军破天京,湘军统领、浙江巡抚曾国荃纵兵抢掠焚烧7日,天朝宫殿焚毁殆尽。八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命“撤伪王府材修贡院”,“奏请于十一月举行乡试”^[49]。四年五月,又“立民房及贼所遗屋章八条”^[50]。因总督更迭,湘军裁减,淮军西征剿捻军及太平军遗部,粮饷缺乏,“苦无材木”;同时,破城后江宁诸多衙署(将军署、都统署、织造署、总督署、藩司署、粮道署等)急待重建等原因^[51],总督衙署延至九年,“仍就旧基建造”。“先清理官界,参差不齐配买民基。筑砌围墙一周共折方五百六十丈”。“十年正月开工,……十一年四月工竣”^[52]。重建衙署期间,曾国藩时任总督,衙署竣工前二月初四卒于任所^[53]。

新建衙署正宅、门楼、穿堂、厅楼、亭阁等,计1189间。同时,又建吹鼓楼2座、牌坊4架,并整修了西花园、荷花池、驳岸等建筑^[54]。重建后的衙署不及原来规模宏大,但基本上恢复和保持了总督衙署的旧有面貌。

衙署坐北向南,正面是圆形大门,两边有东西辕门,重檐翘角,造型精致,略具徽派风格(因前总督马新贻曾任安徽巡抚,招募过一批徽派工匠及监工)。衙前有牌坊两座,上书“两江保障”、“三省钧衡”匾额^[55]。两边是灰色围墙。门前立一对石狮,左右有木岗亭。南边立一高大照壁,东西为箭道。

进门有隔墙和二门。穿过二门是大堂,砖木结构,红色立柱,八架五开架,前后跳檐,宽敞宏大,为衙署主要建筑。沿大堂中轴线向北,为二堂、三堂。三堂之后为官吏住宅和花房。大门至大堂两侧为东、西朝房,整齐壮观。二堂西侧为花厅。东侧有两个庭院,曲径幽深,为重要机密用房^[56]。衙署前的辕门、牌坊及衙署的圆门、二门等建筑,其原貌一直存留至国民政府初期^[57]。



重建后的衙署西花园,又名“煦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再建^[58]。全园占地1.4公顷,除湖中石舫外,陆续建有漪澜阁、望亭、鸳鸯亭、桐音馆、忘飞阁、夕佳楼、御书碑亭等建筑。园内布局精巧,为中国古典风格,别具江南情趣。此园经民国时期及解放后多次整修,至今保存完好。

园内西侧,有一幢坐北向南的西式古典建筑(此即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办公处),砖木结构,单层,共7间,为晚清总督端方在任时所建^[59]。此建筑原系端的私家花厅,正中为一方形廊厅,左右为东西走廊,厅南侧为砖砌连续拱卷。东边三间为办公室、会议室、休息室,中间为穿堂,西边三间连通,是大会议室。

园内东侧,有一中式建筑的二层砖木结构楼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曾作为起居室)。该楼亦为端方时建造。木柱外廊、木栏杆花格窗、梁额檐口、雀替(建筑中枋与柱相交处的托座)等处都有精细雕刻。楼顶系硬山屋顶形式,烟色小瓦覆以屋面,楼上、下各三间。以上两建筑,现存完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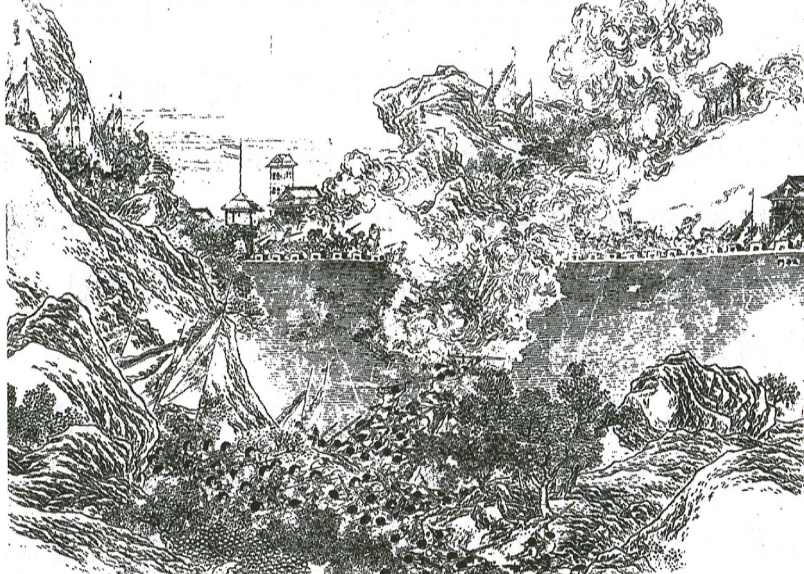
总督衙署规模宏大,一派官衙气势。清两江总督前后占据该建筑长达245年之久(前期从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始建至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军克南京前,共206年;后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四月重建至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革命军占领南京,共39年)。

清初设置三省总督(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寻定名为两江总督)至清末,共264年,计92任,82人。其中,雍正元年(1723年)进士尹继善断续四任(第22任,雍正九年〔1731年〕七月至十年九月;第32任,乾隆八年〔1743年〕二月至十三年九月;第35任,乾隆十六年〔1751年〕五月至十八年正月;第37任,乾隆十九年八月至三十年三月),前后在任近20年,是两江总督中任职最长的一位^[60]。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陶澍,继59任总督(道光十年〔1830年〕八月至十九年三月)^[61]。在任十年,与江苏巡抚林则徐(道光十二年二月至十七年正月在任)^[62],合力疏浚吴淞江、浏河等以宣泄太湖诸水,颇得民心^[63]。



克復金陵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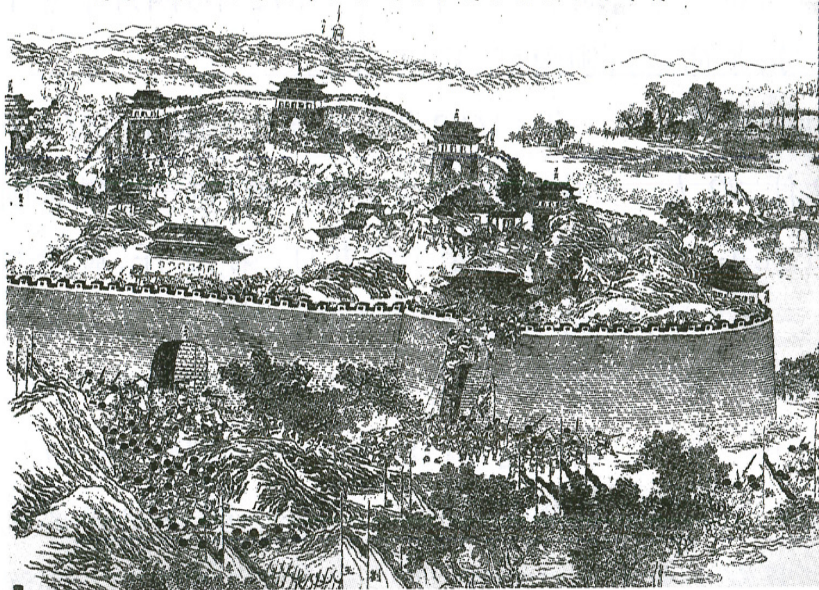
自江西肅清之後乃得專事於金陵是圖為官報曾係克復金陵第一戰時堂詳繪之湘官軍得天龍勝子山始得屠高麗下之於六月朔日起春春輪流若攻傷者相望李成英跪草吳雲閣等重開地道各軍擊其左潛攻其右相持者幾一月五有相備李秀成突於某夜犯地道大營我軍嚴防所乘越日焚營中官營分所部為四路傳令發大群各一營指開城垣二十餘丈武勇即劉連統李成英等即從側門破入各勇隊附奉夜戰投火燒焚敵軍嚴防射擊砲傷十九數人乃無一逃者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下午，湘軍炸塌太平門城牆，衝入城內（〔清〕金谿艾氏征輯《平定粵匪功臣战绩圖》，光緒二十年〔1894年〕石印）。

克復金陵第二圖

左路環城之賊既破武明在儀鳳臺據關臺等處險險龍臺山擊退右路太平門之賊李祥和等即從是門攻入時王遠和等擊中路攻德天王府之北劉連統等由右路廣城趨神策門通別部東南桂榮其村等從是門梯而登會柳營連綿戰至獅子山奪復鳳門其中左一路有彭毓斌等由內城營地直擊通濟門左路則蕭卓泗熊登雲等分途奪取朝陽洪武二門羅遠元等各率所部從聚寶門之西仰攻而入李金洲等從通濟門梯而入陳漢易良虎龍濟城等督會同曹義升水師營取水西單西門至是春門皆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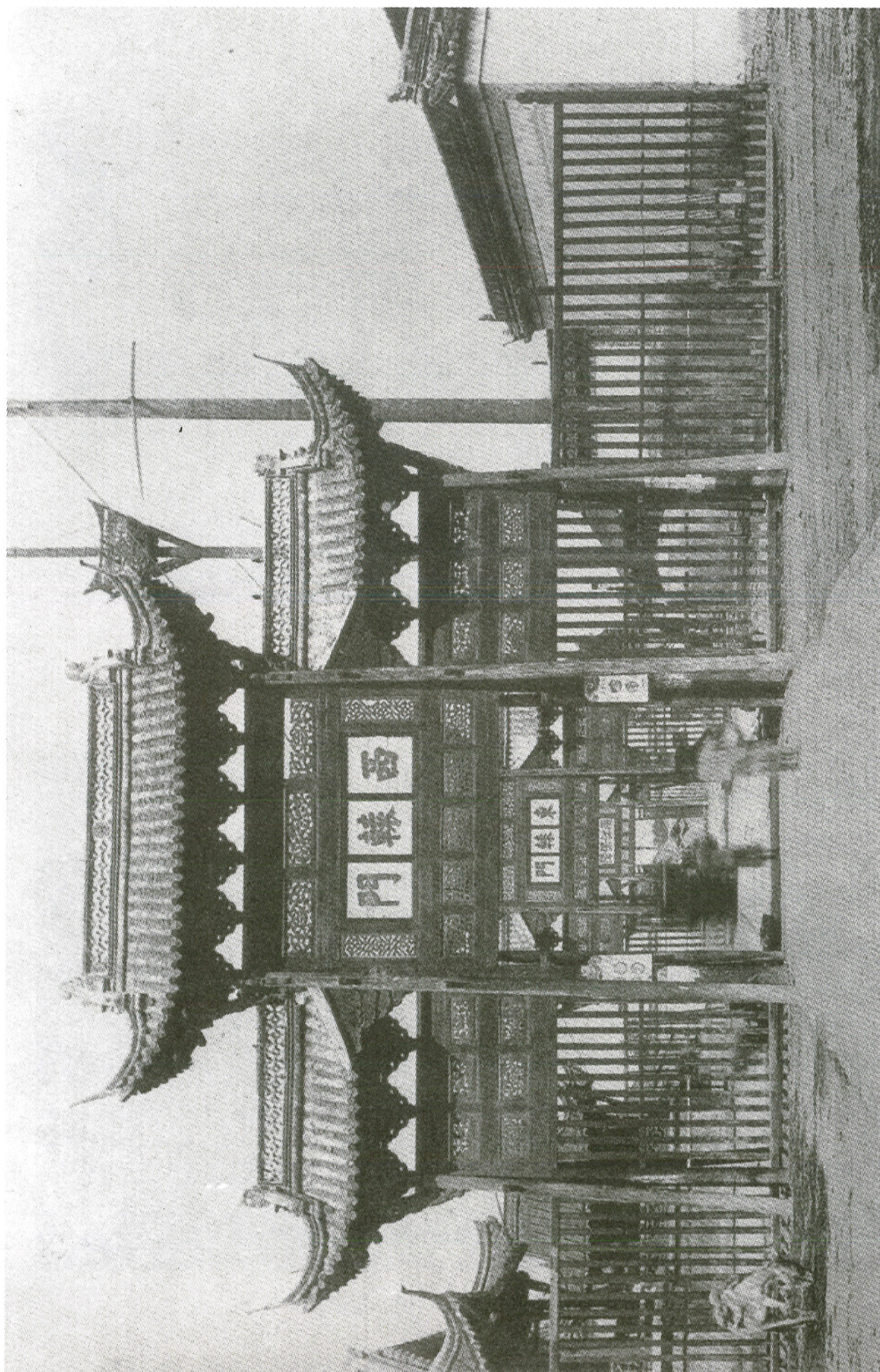
湘軍一隊人馬直向天朝宮殿。同時，儀鳳門、鐘阜門、金川門、神策門、朝陽門、洪武門、通濟門、聚寶門、水西門、旱西門相繼被湘軍攻破。



曾国藩(1811 ~ 1872 年),三任两江总督。(1870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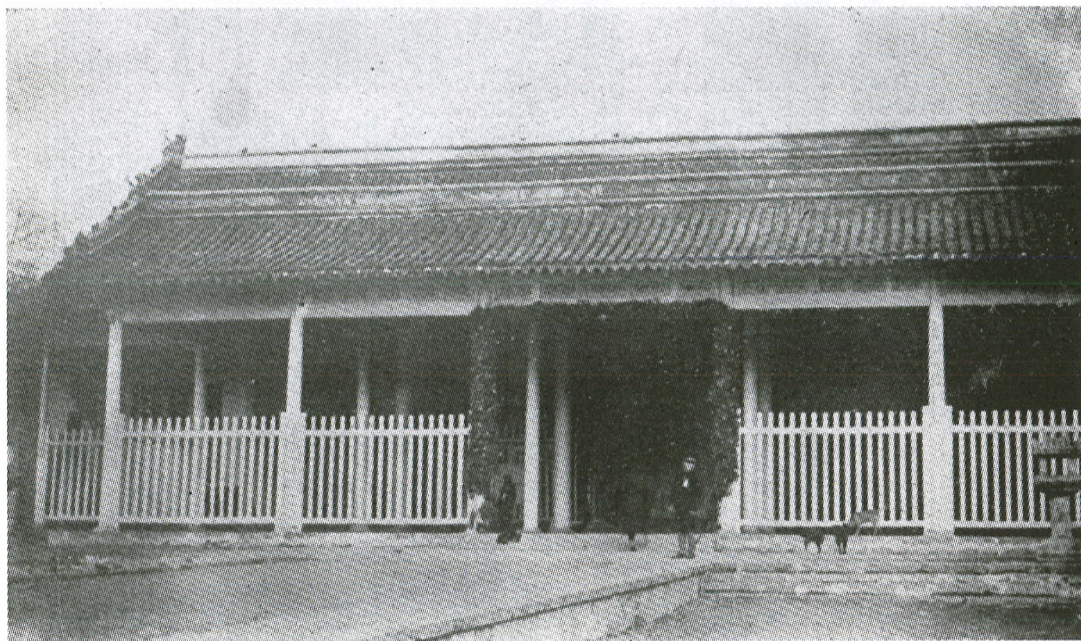
清政府在曾国藩逝后于南京莫愁湖畔建立的曾公阁。(1930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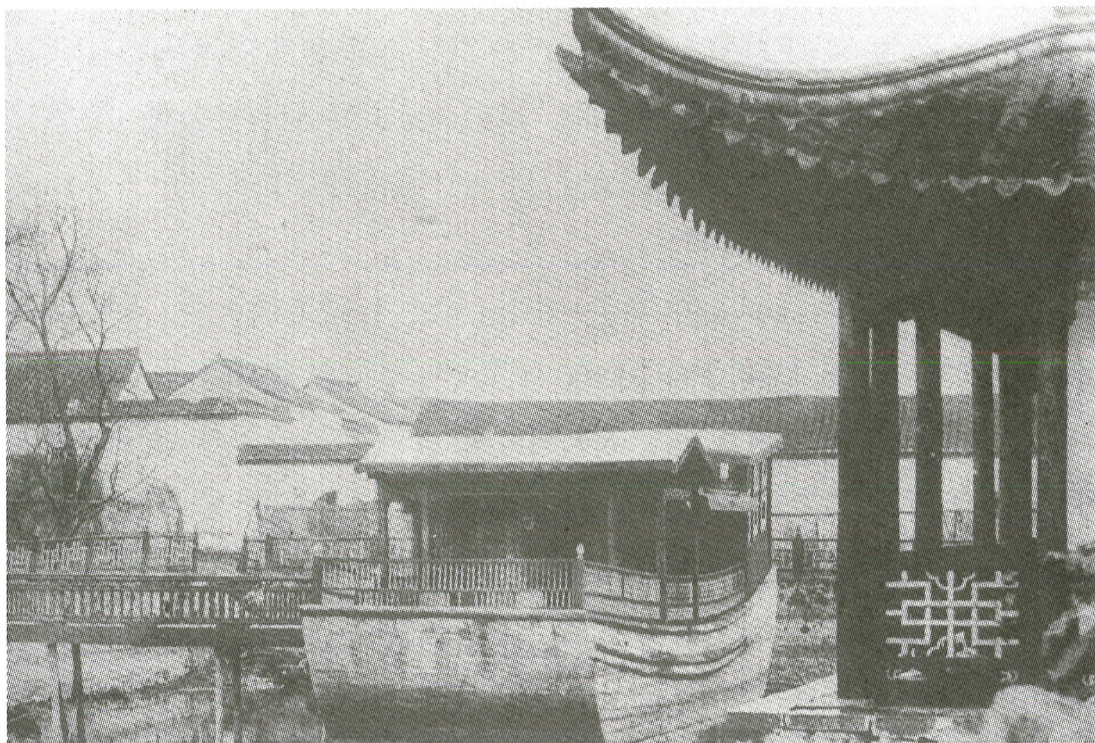
两江总督衙署前的东、西辕门。(1889年摄)



两江总督衙署圆门(正门)。(1911年摄)



两江总督衙署二门。(1911年摄)



两江总督衙署西花园又名“熙园”，取春风和熙之意。图为园内石舫。（1889年摄）



两江总督衙署东墙外，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修建的南京城内铁路经过这里。（1910年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后为64任总督)偕前两江总督、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康华丽”号上,按照英国全权公使、英将璞鼎查提出的条件,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64]。

鸦片战争后,两江总督中不乏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曾国藩三任总督(第70任,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至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第72任,同治五年十一月至七年七月;第74任,同治九年八月至十一年二月卒于任所)^[65]、李鸿章(第71任,同治四年六月至五年十一月)^[66]、左宗棠(第82任,光绪七年〔1881年〕九月至十年正月)^[67]、张之洞两任(第85任,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至二十一年十一月;第87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至二十九年二月)^[68]等人。

清四大奇案之一“张文祥刺马”,即发生在同治九年(1870年)重建总督衙署的前夕。两江总督马新贻暂以江宁府衙(今府西街南京市第一中学一带)作总督的行辕。七月二十六日,马于大校场阅毕驻军“月课”(驻军操练)后在校场的西箭道被张文祥刺杀^[69]。

四、临时大总统府(1912年1月~4月)

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其后,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等地纷纷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建立革命政权——都督府。九月十五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当日组建江苏都督府。二十一日,苏浙沪都督府在镇江组成联军,以决心革命的清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总司令,会攻南京。十月十二日,联军光复南京^[70]。联军中镇军第一支队司令林述庆首先率部入城,进驻总督衙署,自称江宁都督。同日,徐绍桢率领的联军,亦在署内设总司令部。清最后一任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署理张勋等皆先期弃城渡江北逃。旋即裁撤江宁都督,林改任北伐军临淮总司令^[71]。十三日,江苏都督府迁宁,程德全任都督,原两江总督衙署为江苏都督府^[72]。十一月十



日,国内已光复并宣布独立的 17 省都督府代表聚集南京,依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73]。

十一月十三日(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由沪抵宁,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就职宣言,提出: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的政务方针,并发布《告海陆军将士文》,中华民国正式诞生。次日,通电各省都督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并以临时大总统就职的当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即阴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三日,民国临时政府成立^[74]。至此,长达 268 年的清帝国灭亡,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正式诞生。

五日,孙中山发表《宣告各友邦书》,阐述中华民国立国精神与新政府对外立场^[75]。

同日,程德全任临时政府内务部总长,庄蕴宽代理都督。九日,都督府迁至苏州^[76]。十一日,徐绍桢任南京卫戍总督。二十八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77]。

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次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并荐袁世凯接任。十五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二十日,参议院选黎元洪继任副总统^[78]。

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79]。

四月一日,孙中山公布《参议院法》,遂正式解卸临时大总统职。同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二日,参议院正式议决临时政府迁北京,临时大总统府为南京留守府。三日,孙中山离开南京赴上海^[80]。至此,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府内的 91 天结束。

临时大总统府沿用原两江总督衙署建筑,至今大都尚在。临时大总统办公处,设在衙署大院西花园西侧,原晚清总督端方的私家花厅内。孙中山起居室在西花园东侧的中式二层楼房上。楼下为警卫队住房,楼上为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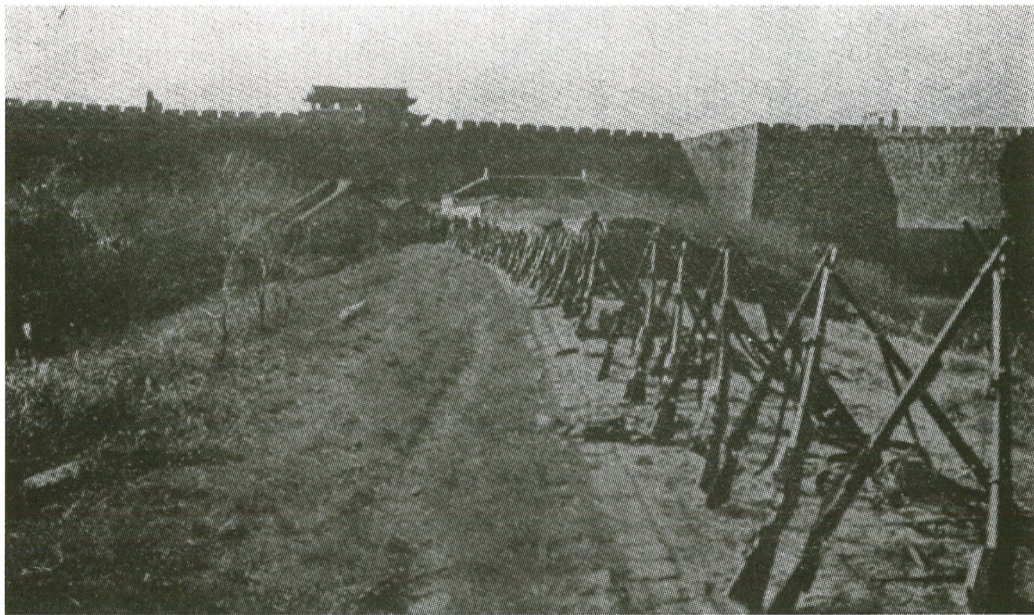
徐绍桢(1861~1936年),1911年11月任江浙联军总司令。(1912年摄)



江浙联军从11月24日起分路进攻南京,并组成敢死队攻打紫金山西峰天堡城清军要塞。(1911年摄)



12月1日,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署理张勋逃离南京。驻南京美国领事出面为清军向联军接洽“议和”。(1911年摄)



守城清军出城缴械投降。(1911年摄)



林述庆(1881~1913年),江浙联军镇军第一支队司令。(1912年摄)



12月2日,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联军中镇军第一支队司令林述庆首先率部入城,沿两江总督衙署围墙行进。(1911年摄)



孙中山(1866~1925年),1912年1月1日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摄)



1912年1月1日下午,上海各界人士在火车站欢送孙中山
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摄)



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大门。(1912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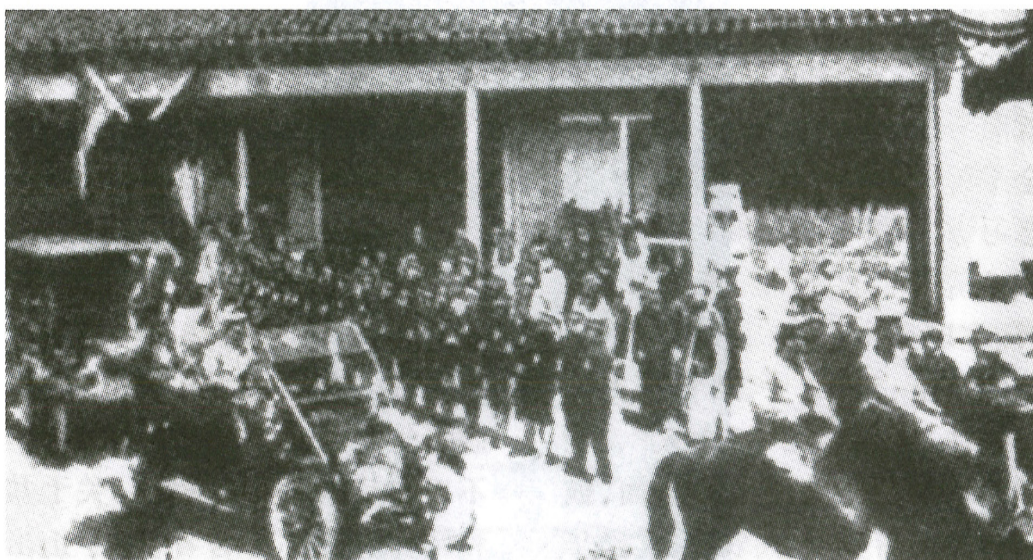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办公处。(1911年摄)



黄兴 (1864 ~ 1916 年), 1912 年 1 月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参谋总长, 4 月至 6 月为南京留守。(1915 年摄)



1912 年 1 月 28 日, 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 参议员暂由各省都督选派的代表充任。前排左第三人起, 依次为蔡元培、黄兴、孙中山、胡汉民。(1912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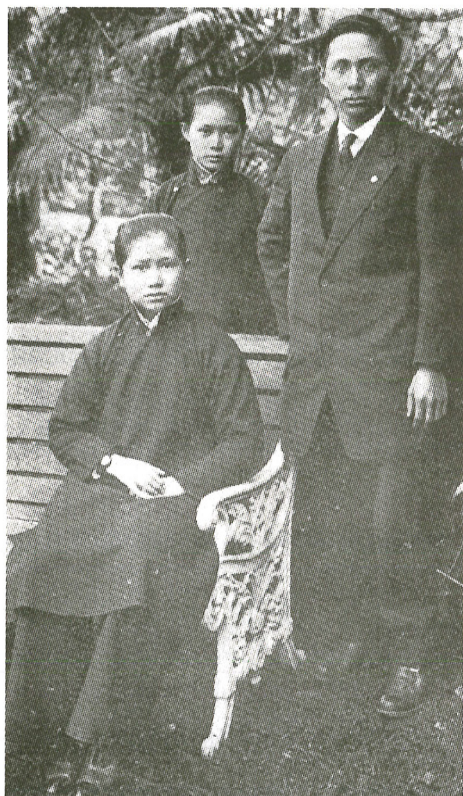
1912年4月3日,孙中山率胡汉民等离开临时总统府前往上海。(1912年摄)



孙中山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起居室。(1936年摄)



孙中山前夫人卢慕贞
(1876~1952年)。(1912年摄)



孙中山的子女：长子孙科、大女孙珽（坐椅者）、次女孙琬在临时总统府西花园内。(1912年摄)



中山的卧室、餐厅和浴室。孙中山任职期间,曾与前夫人卢慕贞居住于此^[81]。

五、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4月~1927年3月)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北洋政府开始。

民国元年六月一日,南京留守黄兴解职。十三日,程德全复为江苏都督;次日,程由苏州迁南京,留守府为江苏都督府^[82]。此后,都督府内犹如走马,不断易主。

民国二年(1913年)七月十五日,黄兴入南京宣布江苏独立,都督府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黄自任总司令。两日后,程德全潜逃;二十九日,黄因援绝撤走,程即通电取消独立,复为江苏都督府。八月八日,何海鸣以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在都督府宣布独立,旋被捕;三日后放出,何再次宣布独立。九月一日,张勋攻占南京,三日后任江苏都督。十二月十六日,冯国璋代理都督,张改任长江巡阅使^[83]。

民国三年(1914年)六月三十日,冯国璋改任将军,都督府改称将军行署^[84]。

民国五年(1916年)一月一日,袁世凯称帝,建号洪宪。三月二十三日,废止帝制,复称大总统。六月六日,袁病死。次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七月六日,冯国璋改称督军,将军行署改名督军公署^[85]。十月三十日,冯当选副总统,督军公署旋即为副总统府。十一月三日,冯兼任江苏督军^[86]。

民国六年(1917年)七月六日,冯国璋抵北京就代理大总统职。八日,江苏省长齐耀琳兼代江苏督军。八月六日,李纯任江苏督军。十五日,卢永祥任会办江苏军务^[87]。

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十二日,李纯在署内自杀,一说为他人所杀,此为民国疑案之一。三日后,齐燮元代理督军。民国十年(1921年)九月一日,齐任江苏督军^[88]。

民国十三年(1924年)九月三日,卢永祥与齐燮元两军交战;十月十三日,卢败逃日本。十一月十三日,齐通电脱离北京政府,旋被免督军职并废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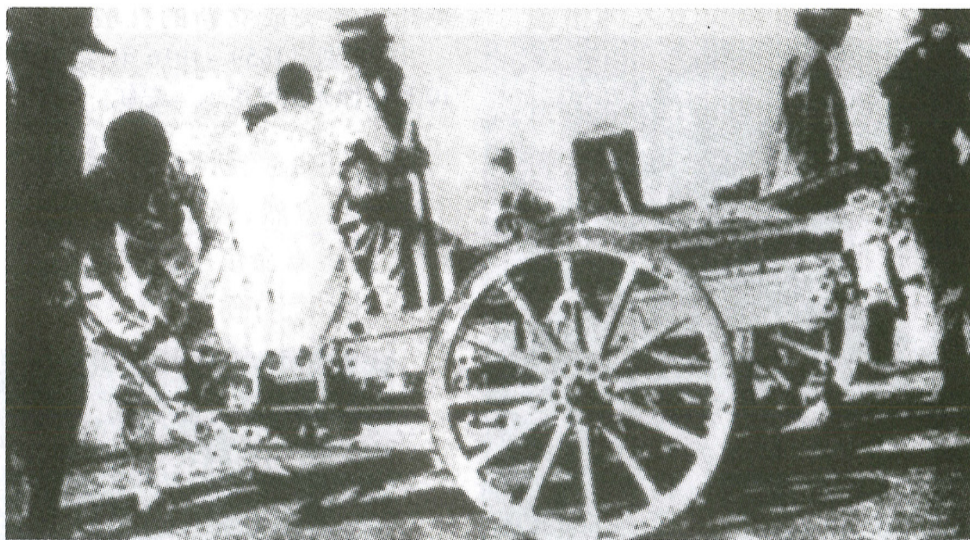
袁世凯（1859~1916年），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5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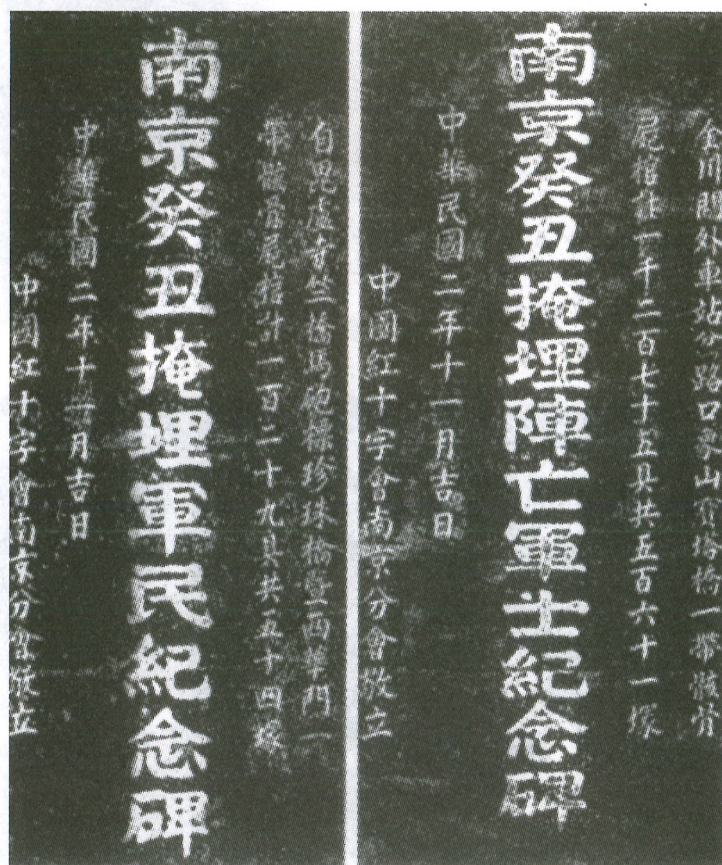
黎元洪（1864~1928年），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1916年6月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1916年摄）



1912年10月10日，江苏都督府门前纪念武昌起义一周年阅兵。（1912年摄）



1913年7月,江苏讨袁军在太平门外装配山炮。(1913年摄)



1913年11月,南京红十字会掩埋江苏讨袁军阵亡将士的纪念碑。(1913年摄)



冯国璋（1857~1919年），1913年12月至1917年7月任江苏都督、将军、督军、中华民国副总统、代理大总统。（1917年摄）



孙传芳（1885~1935年），1925年10月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11月任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1932年摄）



韩国钧（1857~1942年），1924年12月任江苏省长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1924年摄）



军称号。十二月十四日,江苏省长韩国钧兼任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89]。

民国十四年(1925年)一月十六日,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兼任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督军公署为督办公署。八月三日,卢辞职,江苏省长郑谦兼任督办军务善后事宜。二十九日,杨宇霆任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十月十五日,孙传芳自任五省(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司令,二十日抵南京,十一月二十五日,孙任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督办公署同时为五省联军总司令部^[90]。

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二月四日,孙兼任安国军副司令,设司令部于署内^[91]。民国十六年(1927年)二月二十八日,孙与张宗昌联合,设直鲁联军司令部,并合组七省(浙、闽、苏、皖、赣、直、鲁)联军,署内再设七省联军总司令部^[92]。

三月二十三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东路总指挥何应钦率第一军攻占镇江,并促驻常州、无锡国民革命军西进会攻南京。二十四日,直鲁联军退至浦口;当晚,国民革命军特派员章杰策反南京警察开城迎国民革命军。二十五日,何应钦、程潜、鲁涤平、贺耀组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六军、第二军、第四十军相继进入南京^[93]。同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程潜为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主席^[94]。

原署内建筑,于民国六年四月二日冯国璋任副总统期间发生大火,烧毁房屋60余间^[95]。同年七月,在原地重建平房40余间。现总统府旧址穿堂后部西侧具有民初风格的房屋即当年所建。

民国十五年孙传芳任督办期间,将原总督衙署的第五进和第六进平房改建为新式假二层楼房(“子超楼”前,后为国民政府政务局所在地),其余建筑基本保持原貌。

六、国民政府(1927年4月~1937年11月)

民国十六年四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到南京,派军队包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总工会,逮捕全部共产党员干部。十日,开始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制造了南京“四·一〇”反共事件^[96]。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



务委员、共产党员侯绍裘、中共南京地委书记谢文锦、省党部秘书长兼工人部长、共产党员刘重民、省党部妇女部长、共产党员张应春、省党部青年部长、共产党员许金元、中共南京地委委员、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市党部工人部长、市总工会负责人文化震等 10 人惨遭杀害。十一日,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97]。十二日,上海青红帮头领杜月笙等人遵照蒋的密令,纠集青红帮流氓和特务,配合蒋介石的军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两日内,工人纠察队牺牲 120 余人,受伤 180 余人,2700 余名工人纠察队员被解除武装。接着,上海全市大肆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98]。十七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七十四次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议决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次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99],遂将江苏省议会暂作政府所在地,旋即迁往原督办公署(今南京总统府)。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清党”,国共合作正式分裂。八月中旬,军阀孙传芳率领 11 个师、6 个混成旅,向南京反扑。国民革命军在城东北龙潭一带血战 6 昼夜,击溃孙军,国民政府得以巩固。八月十二日,蒋介石辞职(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九月十三日,汪兆铭下野(即汪精卫,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前届委员会会议主席)^[100]。十五日,宁、汉、沪国民党三派在南京建立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宣告宁汉两政权合流和国民党之统一^[101]。

民国十七年(1928 年)一月九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二月七日,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02]。同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推任谭延铤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主席^[103]。

同年十月八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组织法》,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04]。

当月,国民政府命令“办理国都设计事宜”,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和古力为国民政府建筑顾问,同时成立首都建设委员会,由孙科负责。次年四月,颁布墨菲主持设计的《中华民国首都建设计划》^[105],并颁布《建筑法》,



制定《营造业管理登记条例》^[106]。七月,即按建设计划改扩建国民政府所在地建筑。原两江总督衙署的围墙、隔墙、圆门、二门、东西辕门等均被拆除,并扩大圆门原址,重建门楼。门楼高14米、东西宽26.8米、南北进深5.5米,楼上有7间小屋。正门为砖砌结构,水泥饰面,迎面为三拱卷门洞,内设铜制镂空雕花大门三扇。楼面塑有8根圆柱浮雕,整体建筑采用西方古典柱式巴洛克风格。门楼上方塑有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惟所书“国民政府”四个大字^[107]。门楼下设一对石狮,门楼对面新砌一大照壁。当年十二月底,国民政府新门楼落成^[108]。同年十月,改扩建原总督衙署的旧花厅,为国民政府大礼堂^[109]。原衙署大堂东侧设参军处,建一组木结构平房。同年十二月,又在西花园内北端建一幢西式三层大楼,次年六月竣工,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办公处。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各方震惊,民众纷纷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置民族利益而不顾,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上下抗日民众的强烈不满。九月下旬,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要求抗日,相继发表宣言,成立抗日团体,组成义勇军。十月中旬,南京全市42所大、中学生两万余人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十一月中旬,南京、上海、北平、杭州等地数万名学生聚集在国民政府门前请愿,高举“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督促政府立即出兵”的横幅,并冲进国府大门,要求蒋介石出见。十二月中旬,北平、上海、安徽等地学生请愿团到南京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政府当局出兵抗日收复失地。

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辞职;二十八日,林森任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八月一日林在重庆因车祸引发脑溢血病故,后由蒋介石接任)^[110]。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惊慌失措,恐日军逼近首都,“被迫屈结城下之盟”,次日即召开国民政府会议并发表宣言,宣称:“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



旋”，决定“国府移驻洛阳办公”。三十日起搬迁，1000余名国民党军政要员，以洛阳河洛图书馆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在地；行政院及中央政治会迁入洛阳职业学校^[111]。五月五日，经英国公使蓝普森斡旋，十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同年十二月一日，国民政府又从洛阳迁回南京原址^[112]。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国民政府大院最北端建文书局办公楼一幢，由鲁创工程公司承造，次年底竣工^[113](因时任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林森，字子超。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国民政府还都后，将此楼冠名为“子超楼”)。此楼主体建筑为四层，中部为假六层的西式楼房。该楼长33.3、宽20、高23.5米(不含底层深3.3米)，占地面积666平方米，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使用面积1935平方米，共有大小房间53间(其中，底层12间、一楼11间、二楼13间、三楼7间、四楼9间、五楼1间)^[114]。该楼整体为砖混结构，内部装饰精细，立柱贴深褐色面砖，外墙为米黄色砖砌，造型对称，简朴实用。楼层底部为半地下室。该楼从地下室至三楼有电梯直达。

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七月至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日军侵占南京前夕，国民政府按《首都建设计划》，除改扩建政府所在地外，陆续建有军政部、司法院、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励志社以及国民大会堂、国立美术馆、中央医院、中央大学礼堂等建筑^[115]。同时，还建设了市内交通干线。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爱国学生爆发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中旬，南京各大、中学生7000余人为声援北平学生挽救危亡的救国运动，齐到国民政府请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同年十月初，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南京。三十日，国民政府议决迁往陪都重庆^[116]。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十七日，日本成立战时最高统帅部大本



1927年4月9日，蒋介石到南京后拜谒明孝陵。(1927年摄)

(四十) 日一十月三卯丁曆

▲上海銀行旅行部消息
 四川路一百十四號上海銀行旅行部，頃接該部北京分
 部來電，謂京漢特別快車自四日起，在京鄭間每週往返
 各開一次，頭二三等及臥車飯車均有，計星期一上午十
 點零五分由京開，次日上午九點十二分到鄭，星期三上
 午十點由鄭開回，於次日上午九點抵京。

▲時人行蹤錄
 ▲張國燾 國民軍第七師長張國燾，於昨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
 由漢江乘半車於午後一時零四分抵滬。
 ▲陳銘標 粵軍第十一軍軍長陳銘標，昨因粵務須來滬接洽，故
 特於昨晨七時三十五分，由青島乘車來滬，於下午五時抵北站，
 旋即於五時四十分鐘赴滬報。
 ▲王普 粵軍第二十七軍軍長王普，前因粵務，會由蕪湖乘輪來
 滬，昨已公畢，於昨午一時三十五分，由滬乘專車赴甯，再乘輪
 過蕪湖防次。

●南京省市兩黨部被搗毀之滬訊
 江蘇省黨部職員某君，昨由甯來滬，據其報告云，江蘇省黨部自
 四月一日移甯後，原擬遷入省議會對址辦公，嗣以該會在丁家橋
 地方交通不便，遂暫在中正街安福公學原址市黨部內設辦事處，
 連日來傳講及領票等事，運動甚多，又當活動，同時將有人搗毀
 黨部之謠，亦隨之而起，蓋甯京原為軍閥官僚政客聚集之地，又
 有反動派與之相互勾結，對於黨部自仇視也。八日晚，黨部是
 晚舉行晚來都事，但該部常務執行及監察委員被搗毀，張曙
 時，被槍天，對黨民，高爾柏等，仍在該部開執行委員會，直至深

上海《申報》：民國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二日关于“搗毀省、市党部”的报道。



蔣介石逆跡昭著

即照辦，中央執行委員會元（十三）印

▲蔣介石又演奪手好戲
▲蔣介石被重傷又失蹤
▲上海慶祝大會被解散
▲上海市政府無事可作

(南京十二日電)蔣到此後，空氣惡化，昨有流氓多人搗毀江蘇省黨部及南京市黨部，侯紹裘被打重傷後旋又失蹤。

(上海十三日電)甯訊，蘇省部及甯市部被封。上海十二日電)警廳佈告禁止集會遊行，今午慶祝汪精衛復職大會，到白萬人，空氣緊張，將到能華請願，蔣部兵士忽開槍射擊，死傷無算。同時法界鐵網門緊閉，羣衆逃往無路，慘絕萬狀。

外兵在滬暴行愈烈

▲日水兵搜捕海員工會
▲日界住戶遭日兵蹂躪
▲日兵架炮對準華界
▲英水兵搜劫大夏大學續報

漢口《民國日報》：民國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四日关于“蔣介石逆跡昭著”的报道。

國民革命軍
微(五)口
井下合
露出兵
紛紛
天白日旗
又訊：開
助擊：李
武力于
吾輩應
結大部，討
江
南昌十
實行清黨
分子，重
各七
湖北
（街路）蔣
匪部：以
黨內同志，
造成白色恐
之實，總理
中央會議，
關，違師洪



漢口《民國日報》：民國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五日及十七日关于蒋介石制造南京“四·一〇”反共事件的报道。

上海《時事新報》：民國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九日报道“蔣介石通电清党”。

蔣介石通電清黨

依照監委會所開辦理

▲通告 爲布告事，照得此次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蔣介石等國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等，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各委員在所在地將該等黨員人等通知公安局或警廳隨時分別看管嚴戒，免予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爲，仍須和平待過等因，准此，中國國民黨自應嚴爲防範，除呈報遵照外，合令各軍一體知照，務應嚴爲防範，如有上項情事，應即嚴密執行，以維治安而防亂，此令。

朱培德僕僕贛鄂

朱培德十四日借黃德烈漢，侯

▲通告 爲布告事，照得此次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蔣介石等國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等，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各委員在所在地將該等黨員人等通知公安局或警廳隨時分別看管嚴戒，免予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爲，仍須和平待過等因，准此，中國國民黨自應嚴爲防範，除呈報遵照外，合令各軍一體知照，務應嚴爲防範，如有上項情事，應即嚴密執行，以維治安而防亂，此令。



五期星 日四十月三年卯丁歷舊即 報 晨 日五十月四年六十國民華中 版二第

上海左派勞力傾軋
殺氣騰空之上海市
軍隊開鎗轟擊工人
右派工人乘機活潑
總罷工已失敗

【本報上海十四日電】上海十四日，工人糾察隊，因軍隊開鎗轟擊，已告失敗。據悉：十四日晨，工人糾察隊在滬北一帶，與軍隊發生衝突。軍隊開鎗轟擊，工人受傷甚重。糾察隊隨即潰散。右派工人乘機活潑，紛紛向工廠復工。總罷工已告失敗。

直魯軍三路進攻
浦口軍隊向東渡江
何應欽部扼守下關

【本報南京十四日電】直魯軍三路進攻，浦口軍隊向東渡江。何應欽部扼守下關，形勢緊張。據悉：直魯軍三路進攻，浦口軍隊向東渡江。何應欽部扼守下關，形勢緊張。

中央執行委員 今日在寧舉行會議
武漢派討伐蔣介石
蔣工人反對示威

【本報南京十四日電】中央執行委員今日在寧舉行會議，武漢派討伐蔣介石。蔣工人反對示威。據悉：中央執行委員今日在寧舉行會議，武漢派討伐蔣介石。蔣工人反對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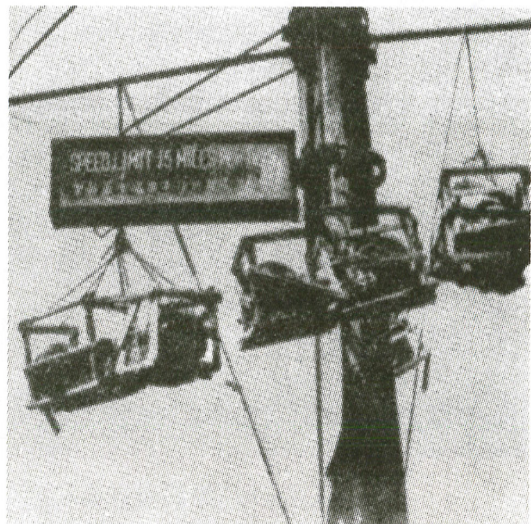
北京學院英數夜被招生
京師稅務監督公署通告

【本報北京十四日電】北京學院英數夜被招生，京師稅務監督公署通告。據悉：北京學院英數夜被招生，京師稅務監督公署通告。

上海《晨報》：民國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五日关于“四·一二”反共政变的报道。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清党”为名，胁迫工人纠察队缴械。次日，工人纠察队抗议游行，遭到军队和杜月笙帮会分子的袭击，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余人。（1927年摄）



1927年4月15日，悬挂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口车速极限牌下的共产党人头颅。（1927年摄）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奠都典礼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地(原江苏省议会)举行。(1927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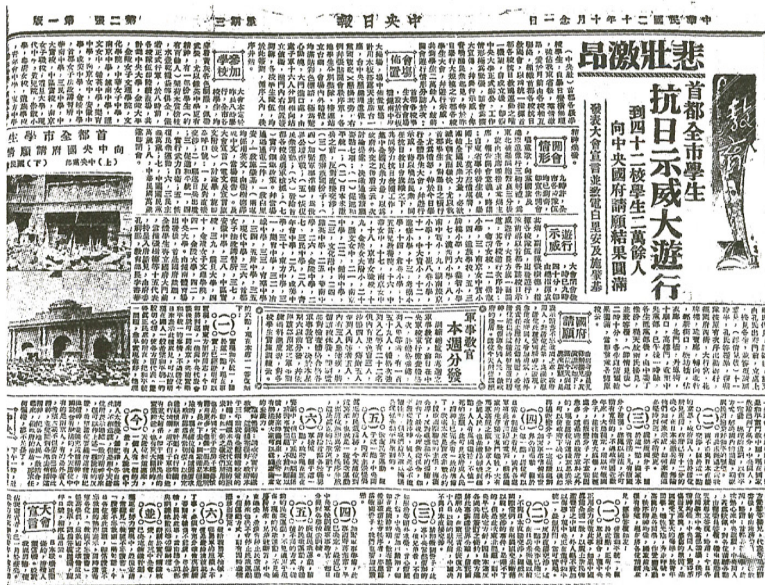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典礼后合影：前排自右至左：甘乃光、邓泽如、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胡汉民、蒋介石。(1927年摄)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时在江苏省议会扎的门楼。(1927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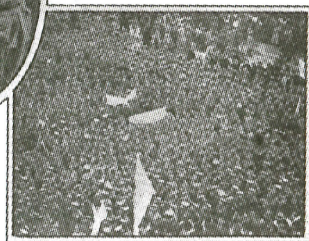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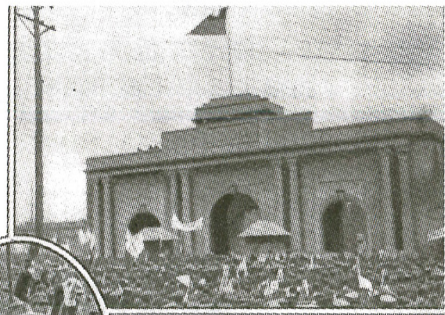


奠都南京时将江苏省议会暂作国民政府所在地。(1927年摄)



南京《中央日报》：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月二十一日关于“首都全市学生抗日示威大游行”的报道。

1931年11月26日，南京、北平、上海、杭州等地数万名学生聚集在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要求蒋介石出见。（1931年摄）



上海抗日团体——中华警钟会在国民政府门口悬挂警钟，日夜敲击以示警钟长鸣，不忘国耻。（1931年摄）



1931年11月27日下午，蒋介石在警卫簇拥下在中央军校大礼堂门口接见学生代表，许诺“一定出兵抗日”，并说：“三日内如不出兵，砍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1931年摄)

示威團衝打國府
▲高呼反動口號
▲搗碎崗亭玻璃

(中央社)北平暨上海各校學生示威團，于昨日(十七日)下午二時，離中央黨部，赴珍珠橋，搗毀中央日報(詳情另誌)後，旋離珍珠橋經浮橋折至國民政府，國府事先已飭警衛，將大門鐵柵緊閉，并派徒手警衛，在門內警備，以防不測。該團至時，見大門已閉，無法衝進，隨在門外狂呼打倒賣國政府，打倒賣國外交，及其他反動口號，並盡情咆哮，將國府門外崗亭，及玻璃搗碎，約有半小時之久，始行退去。

張學良 徐源泉
派飛機迎外使
 ▲本社十七日北平專電
 張學良今派飛機，來接英美法三使。
青代市長

昨出發督剿
 ▲本社十七日漢口專電
 徐源泉為肅清鄂北赤匪，昨晚出發督剿，先赴應城視察，再轉各縣。

吳稚暉
一連對日談

(中央社)記者昨(十七)日訪吳稚暉先生，詢以對日來學潮之感想，比承凌見，作如下之問(密問)這兩天的學潮，教育真正破產了，你有什麼感想呢？聽說前天曾同于右任先生在中央黨部對被捕學生十一勸戒，勸戒後當場釋放，怎麼勸怎麼成的呢？

(吳答)豈敢豈敢！我來周旋今日的學生同，就不配說勸，更何敢戒；我們且從長討論你謂「教育破產，就是俗傳謂「救國不忘讀書」，在忘了讀書，就算破產？不對不對，形而下者之道，「形而下者為之」，這兩句易經上的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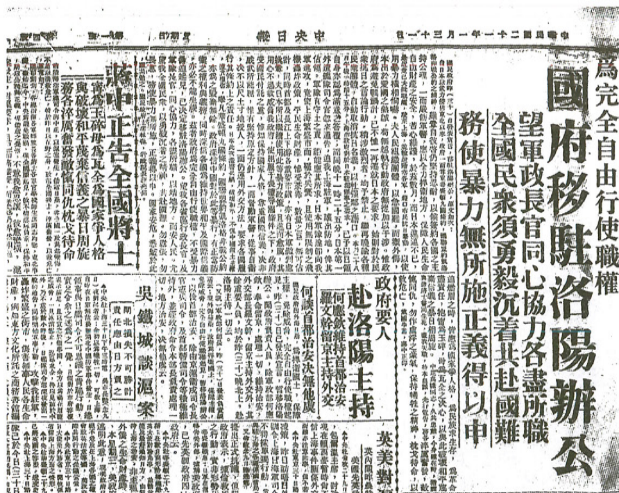
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年(1931年)十二月十八日关于学生请愿团“冲打国府”的报道。



蒋介石 (1887 ~ 1975 年),
1928 年 10 月 10 日就任国民
政府委员会主席。(1928 年摄)



林森 (1867 ~ 1943 年),
1932 年 1 月 1 日就任国民政府
委员会主席。(1932 年摄)



南京《中央日报》: 民国二十一年 (1932 年) 一月三十一日关于“国府移驻洛阳办公”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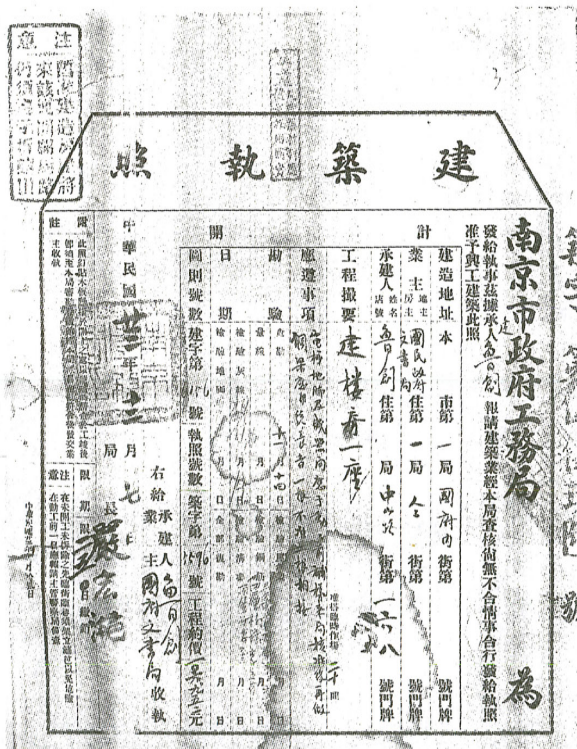
1932 年 1 月 30 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
人离开国民政府前往洛阳。(1932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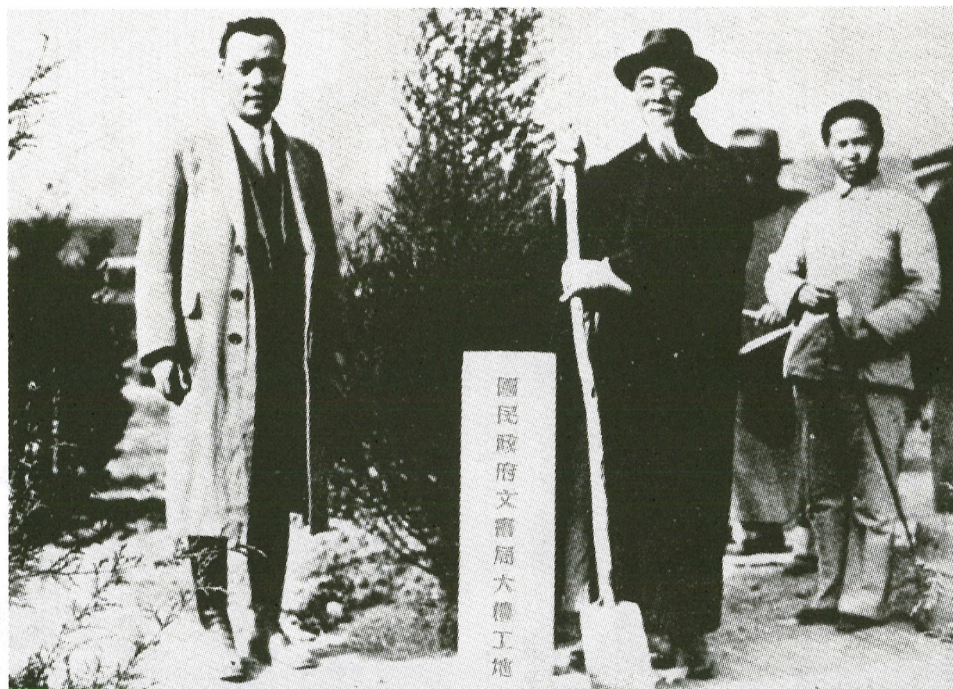
1932 年 2 月初, 官员迁走后的国民政府大门。(1932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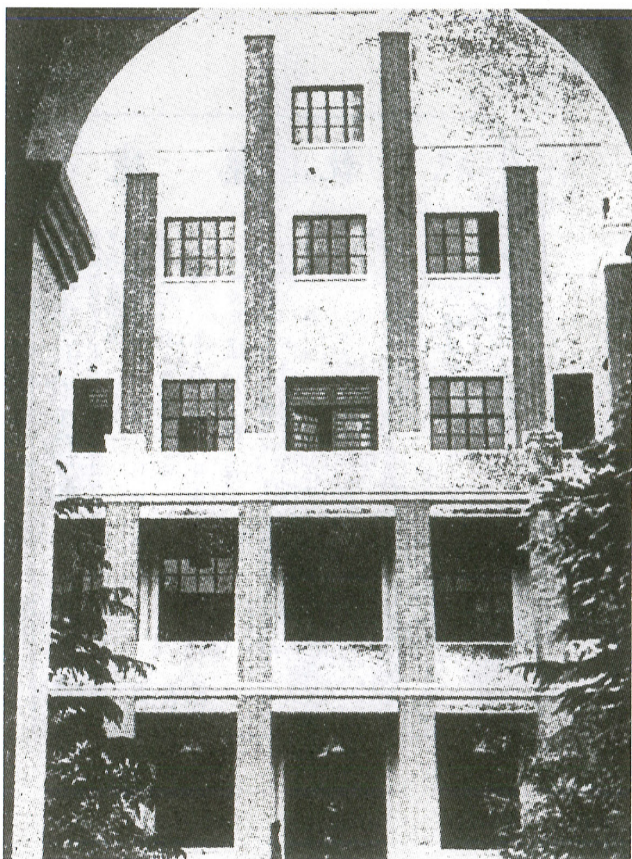
移驻洛阳河洛图书馆的国民政府大门。(1932 年摄)



南京市政府工務局核发建造国民政府文书局大楼(“子超楼”)的《建筑执照》(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二月七日)。



1935年3月12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国民政府文书局工地前种植雪松。(1935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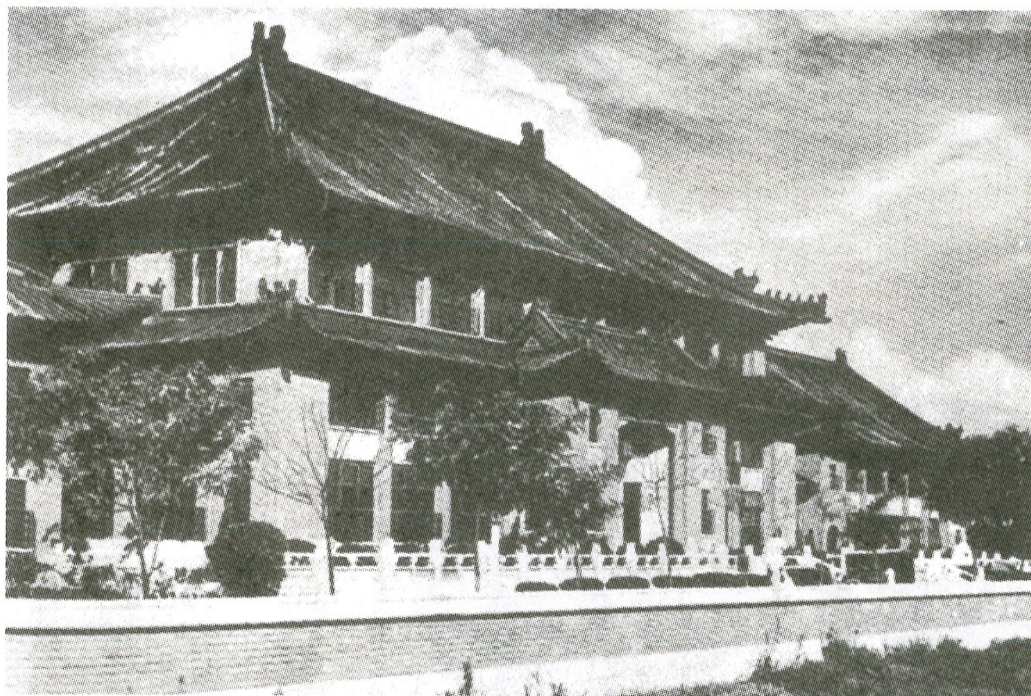
新建的国民政府文书局大楼(“子超楼”)。(1936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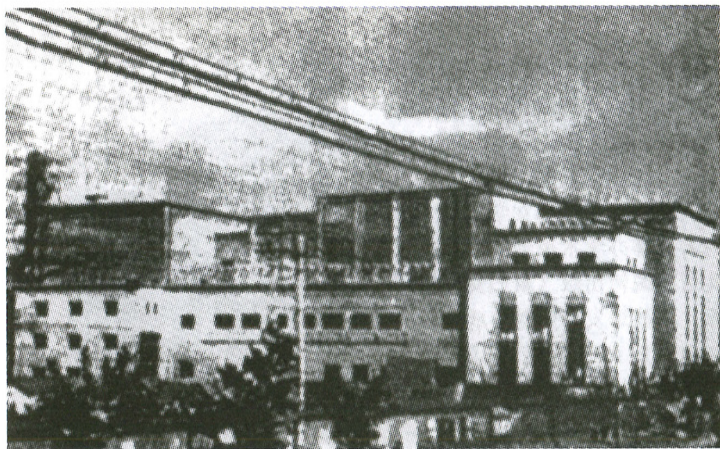
建于 1933 年的励志社,位于中山东路与黄浦路交汇处。(1933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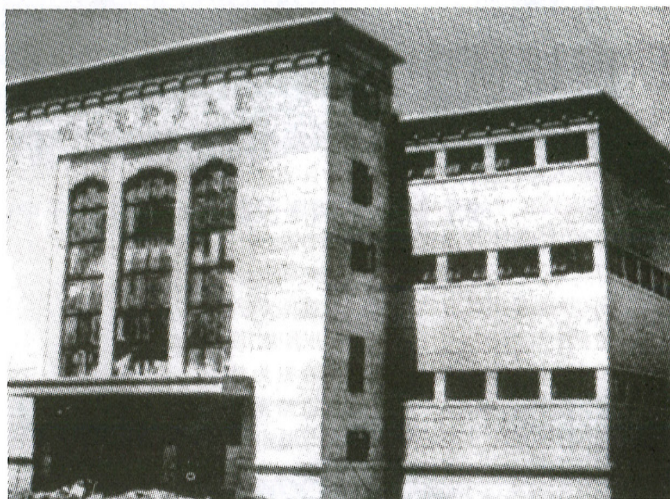
建于 1935 年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位于中山北路大方巷。(1936 年摄)



建于 1932 年的国民政府铁道部,位于中山北路萨家湾。(1932 年摄)



建于 1936 年的国民大会堂，
位于国府路西段。（1936 年摄）



建于 1936 年的国立美术馆，
位于国民大会堂东面。（1936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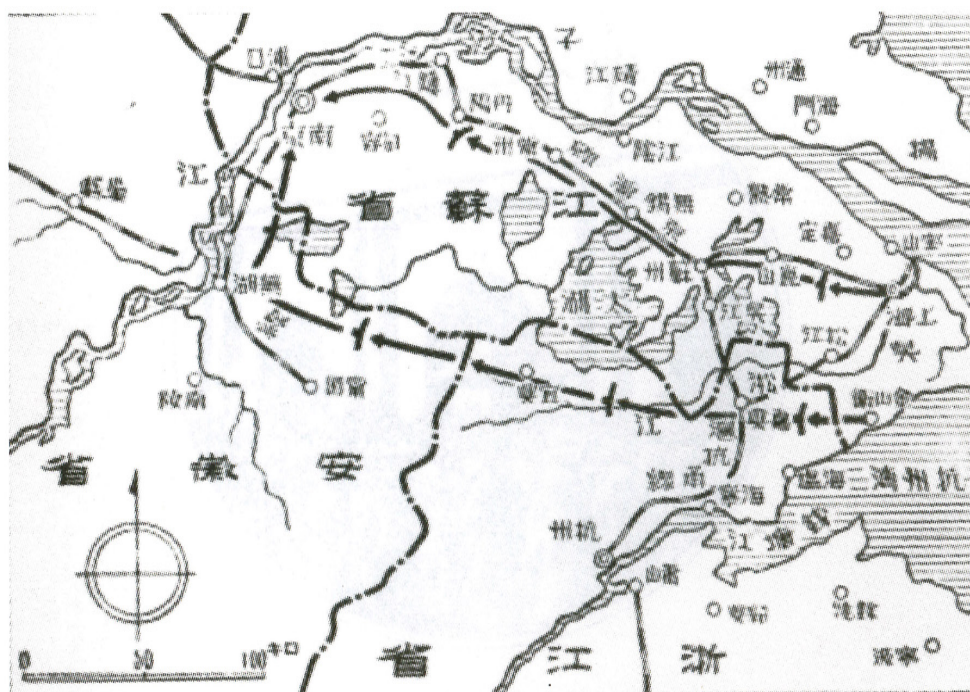
建于 1931 年的中央
大学礼堂。（1932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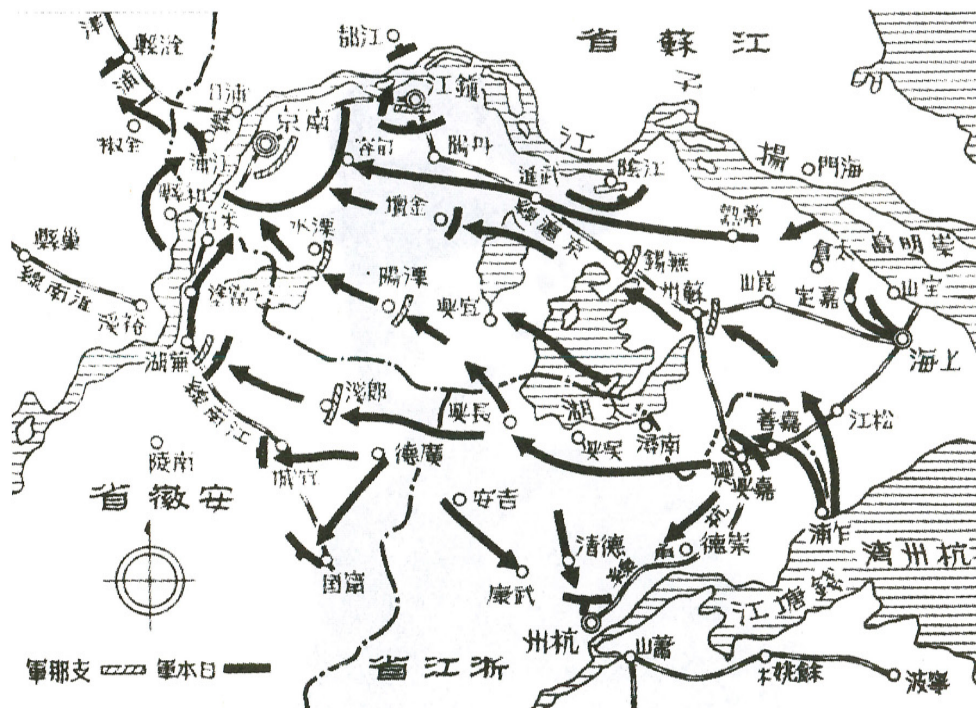
1935年12月19日，南京各大、中学学生7000余人
为声援北平学生挽救危亡的救国运动，到国民政府门前
请愿。（1935年摄）



1936年的蒋介石。（1936年摄）



日本中支那(华中)方面军参谋本部绘制的《从上海到南京
进军路线图》。(1937年绘)



日本中支那(华中)方面军参谋本部绘制的《进攻南京谋略图》(1937年绘)



日军发动京沪战争的罪魁：左起海军第三舰队司令谷川清大将、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中将、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中将。（1937年摄）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从南京中华门缺口突入城南，坦克蜂拥入城。（1937年摄）



日军进城后,疯狂屠杀平民和战俘的同时,大肆抢夺市民财物。(1937年摄)



日军将抢劫的民财堆放在原国民政府大院内。(1937年摄)



日海军第3舰队一水兵在南京下关砍杀平民，提着被害者头颅在炫耀。(1937年摄)



被捆绑双手的俘虏惨遭集体屠杀。(1937年摄)

日军在活埋捆绑双手的战俘。(1937年摄)





1937 年 12 月 17 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率部从中山门至国民政府门前举行入城式。(1937 年摄)



入城式上，上海派遣军第 16 师团中岛今朝吾部日军在国民政府门楼上升日本国旗和团队旗。(1937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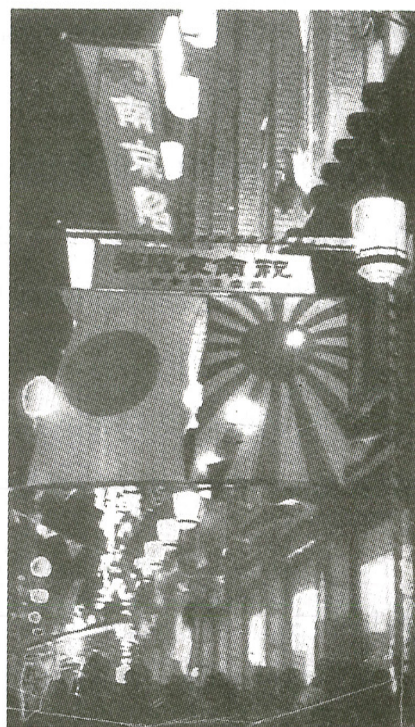
东京《日日新闻》刊登的杀人比赛照片（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十四日）。图左为炮兵小队队长向井敏明，右为副官野田岩。（1937年摄）



日军攻占南京后，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遇难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战俘遭杀害者达30万人以上，造成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是江东门外屠杀现场之一。（1937年摄）



东京《日日新闻》刊登“紫金山下”一文中附的照片（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十七日）。三个杀人比赛者“竞赛”后拭去刀上血迹的得意情态。（1937年摄）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东京银座的欢庆之夜。（1937年摄）



营。二十四日,大本营会议,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提出:应“不失时机,果断进攻南京”并获批准。十二月二日,日本中支那(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在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下,以8个师团兵力,分水陆三路并进,从上海方向进攻南京。十三日晚,柳川平助中将指挥的第10军第6师团谷寿夫部队首先入城,以各种火器射击无辜难民,尸横遍地。次日晨,朝香宫鸠彦中将指挥的上海派遣军第16师团中岛今朝吾部队进入原国民政府,途中,师团长中岛命令:“不要保留俘虏!”其部沿途疯狂屠杀平民与解除武装的军人。其余6个师团及海军第三舰队相继侵入南京和下关江边。6个星期内,日军在南京进行了灭绝人寰的大屠杀,30万同胞惨死在日军屠刀下^[117]。

七、日伪时期(1938年3月~1945年8月)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的策划下,以派遣军特务机关长白田宽三大佐为首的“白田机关”,从上海搜罗了一批北洋军阀时期的亲日派官僚和国民党方面的投降派军人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等,在日军护送下来到南京。次日,在原国民政府大礼堂成立华中地区日伪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18]。梁鸿志任伪行政院长,温宗尧任伪立法院长,陈群为伪内政部长。

伪政府成立后,由于南京遭到日军6个星期的烧杀焚毁,到处残垣断壁,原国民政府各机构的房舍均被日陆海军占据着,“政府”仅有几个院、部、委员会,无办事人员,也无处办公。两日后,又在日军保护下返回上海,躲在日租界虹口区新亚饭店二、三楼设立各院、部、会“事务所”^[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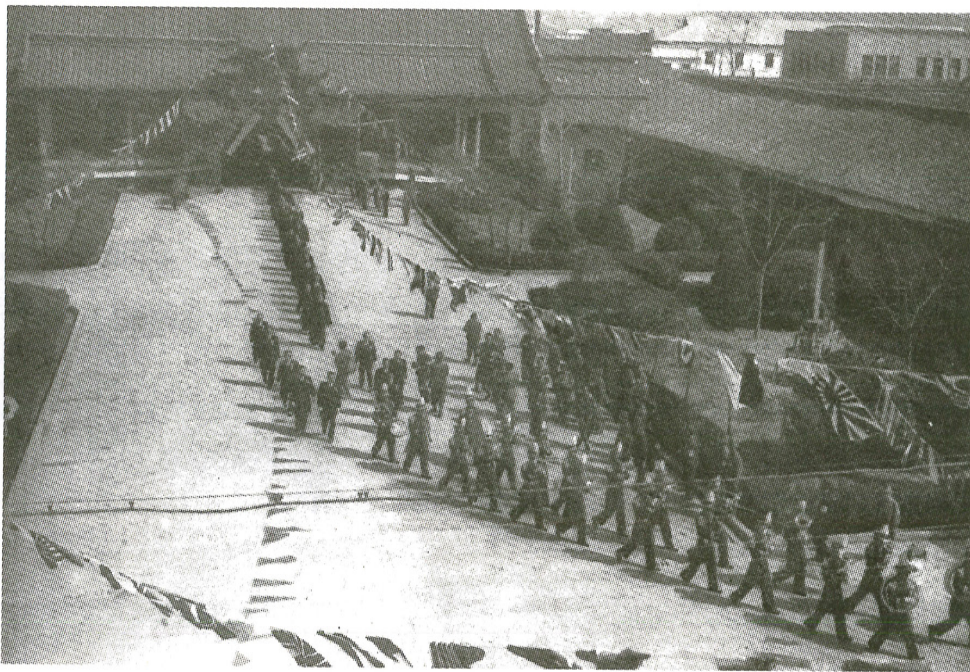
同年九月中旬起,驻在新亚饭店的伪政府各“事务所”人员连同日本职员、日军顾问陆续迁回南京。十月一日,伪政府正式在原国民政府所在地挂牌,门楼上方挂有伪行政院长梁鸿志书写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匾额^[120]。

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响应日本近卫声明,公开叛国投敌。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三十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仅存两年零一天的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其有关人员并入汪伪政府。

梁鸿志任伪监察院长,原国民政府所在地为汪伪政府的伪监察院、伪



1938年3月28日,日军搜罗一批汉奸在原国民政府大礼堂成立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图为成立典礼上群奸合影。右起:财政部长陈锦涛、实业部长王子惠、内政部长陈群、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外交部长陈策、教育部长陈则民。(1938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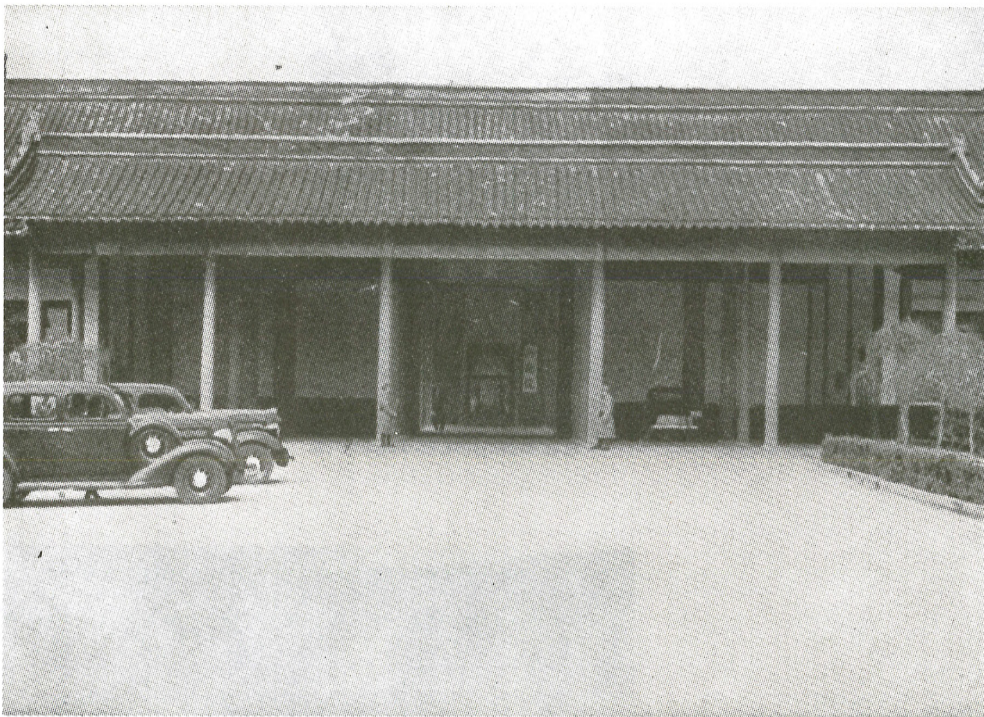
成立典礼后,群奸跟着日本乐队绕原国民政府大院一周。(1938年摄)



1938年10月1日,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原国民政府门楼上正式挂牌。(1938年摄)



日军驻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熊吉少将在原国民政府大院内向伪军训话。(1938年摄)



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在原国民政府大堂内挂牌。(1938年摄)



汪伪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在原国民政府西面隔壁，(图中后景为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办公处)。(1941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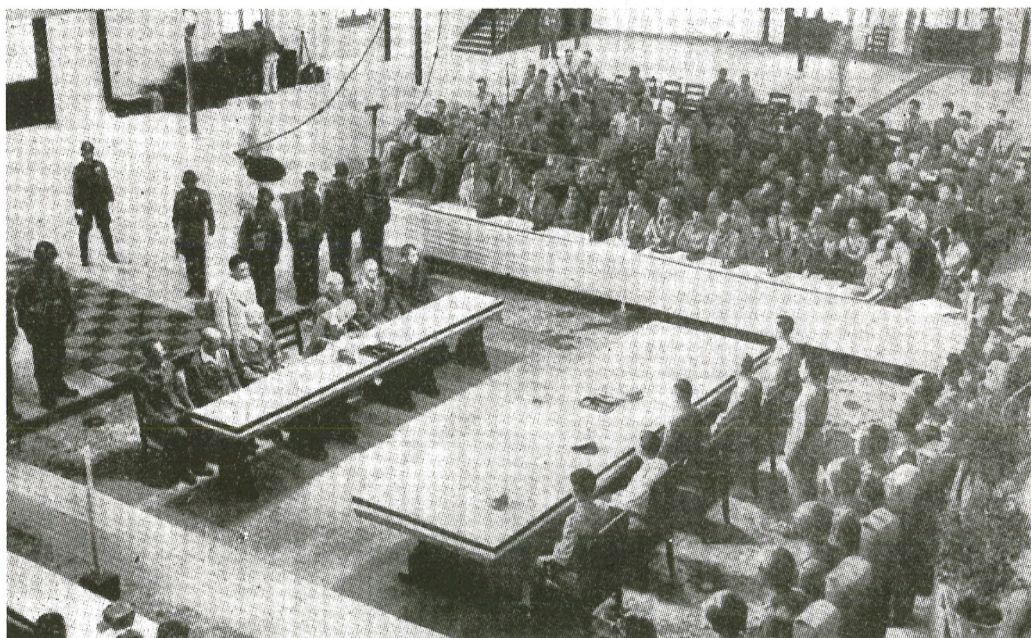
1940年1月24日至26日,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举行青岛会谈,对成立伪中央政府进行“最后洽商”。图右为汪精卫、中为王克敏、左三为梁鸿志。(1940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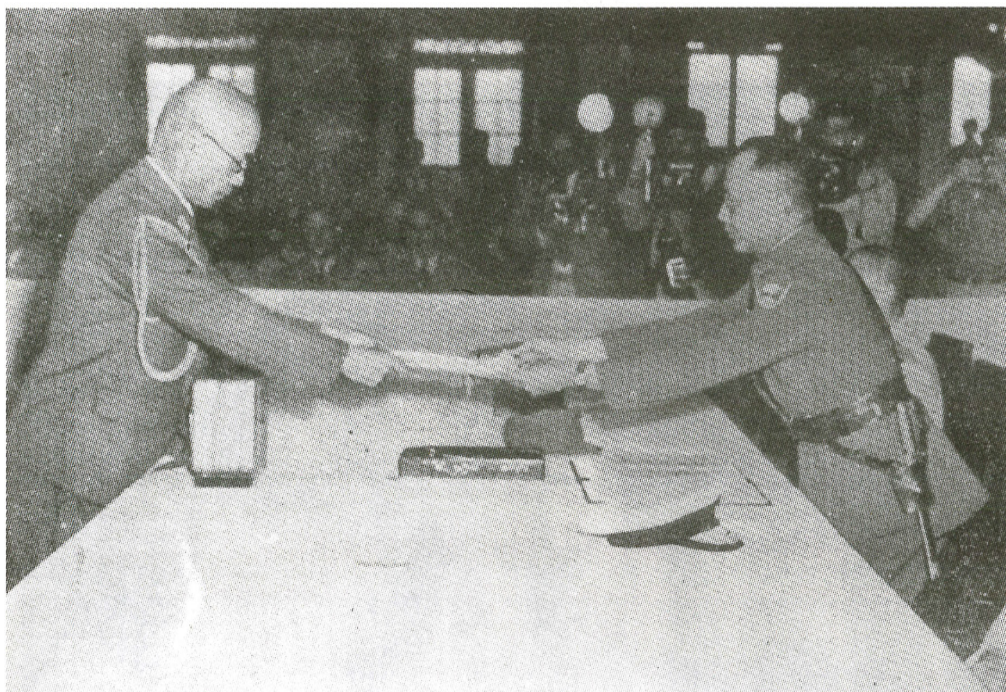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就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并发表演说。(1940年摄)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后,群奸在礼堂(今南京市政府内礼堂)前合影。前排右起第六人为汪精卫。(1940年摄)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受降。（1945年摄）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政府受降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递降书。（1945年摄）



立法院(陈公博为院长)、伪考试院(王揖唐为院长)办公地。原国民政府西面隔壁为汪伪政府的军事参议院。。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十五日,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庆祝抗战胜利。次日,汪伪政府自行解体。九月九日,中国政府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日本投降后,侵略者和卖国者最终都受到历史的审判。

日伪时期,国民政府原址建筑基本保持旧貌,但饱经战乱,年久失修,已破旧不堪。

八、国民政府还都(1946年5月~1948年5月)

同年十月,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事业委员会。十一月,国民政府还都接收工作组抵南京,绘制“国民政府地形图”^[121],并登报招标维修原国民政府各机构建筑及整修西花园。次年四月底基本竣工。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原址。政府机构基本未变,仅少数处、局的办公地点有所更动。门楼上仍塑谭延铤所书“国民政府”四字,门楼下设一对木制岗亭,内有卫兵站岗,门楼内房屋为卫兵司令室和宿舍。

进大门,大院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厢房(原两江总督衙署的朝房),为卫兵和文职人员宿舍。沿中轴线入大堂,正中悬挂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四字描金匾额。大堂前东西两侧各有内外两个小门。东侧外门额刻“琼树”两字,内门额刻“清峙”;西侧外门额刻“璇麤”,内门额刻“飞黄”;均为清两江总督衙署遗存。“琼树”通东厢走廊,“清峙”里面是国民政府的机要室。出“璇麤”门北面有三间两厢一小院为参军处医务室,“飞黄”里面是国民政府的总收发室。

穿过大堂,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平房。东为总务局会客室,西为交际科。向前东侧有一组平房,为总务局各科室办公处^[122]。

由此向北,是一段半落地彩色玻璃穿堂。穿堂左侧是大礼堂,为外国



使节呈递国书、外国领导人来访时蒋介石接见的场所。礼堂东侧是外宾休息室^[123]。

紧连大礼堂的二堂东侧是参军处。穿过二堂，登上台阶，左右各有一幢五开间西式平房。东面两间是套间，外间是蒋介石的会客室，内间是休息室。西面是外宾接待室，其东墙上悬挂双醒狮油画，喻意当时中国是东方的醒狮^[124]。

经穿堂再往北，是一红漆长方形双扉木门，曰“麒麟门”。此门专供蒋介石通过，府内其他人员须从门两侧绕行^[125]。

进“麒麟门”，有一座两层西式楼房，系政务局办公楼。该楼前后都有拱形长廊。

出政务局大楼走廊，面对宽敞的草坪，前方是一座西式假六层大楼，为国民政府沿至总统府的办公大楼（“子超楼”）。楼前有十级大理石台阶。一楼及地下室部分为文书局办公室。二楼东南角上的三室套间是蒋介石的办公处。西侧一间为接待室（原为林森书房），中间为办公室，隔壁是休息室。蒋的办公室对面房间，后为副总统李宗仁的办公处。共两间，一间为办公室，另一间为接待室^[126]。三楼正中是国务会议厅。厅内呈长方形，坐北向南，北墙嵌有一块长方形汉白玉，上镌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建楼时手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黑体字。厅内朝南有双扉雕花门，门外是长形露天阳台^[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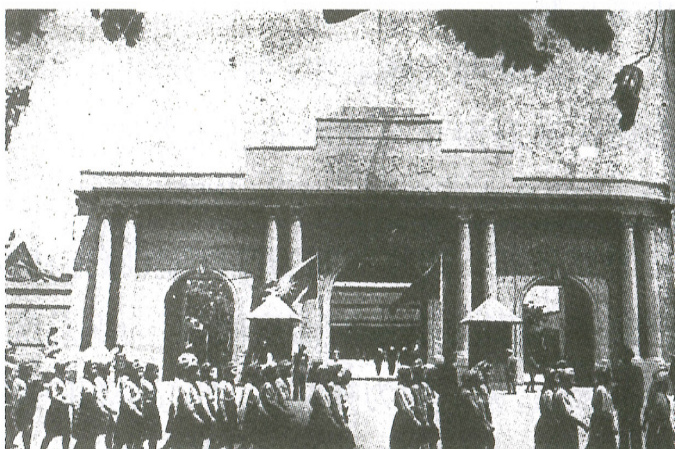
四楼为电讯室和卫兵职员室。五楼平台上是警卫的岗楼和休息室。

沿府内中轴线两侧向东西延伸，各有一组建筑群。东建筑群原系两江总督衙署建筑，为中式平房，后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拆除部分房屋，新建国民政府行政院。国民政府还都后是总务局庶务科、出纳科的办公处，以及警卫队、军乐队、清洁队人员的宿舍。西建筑群位于大礼堂以北，是四个小四合院，大多为抗战前国民政府建造，为典礼局、印铸局的办公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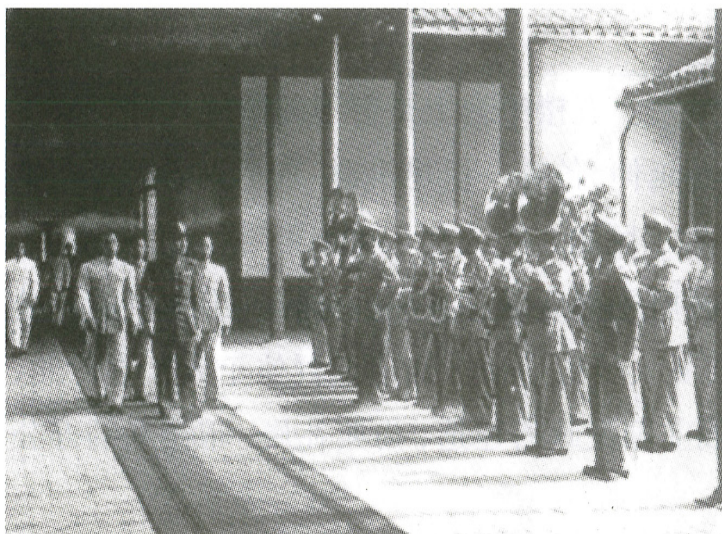
府内还有两个花园。东花园在“子超楼”东面，有西式的喷水池。池东



1946年5月3日，苏军撤出东北当天，蒋介石夫妇从沈阳飞抵南京准备参加还都典礼。（1946年摄）



5月5日，还都庆祝会后，一队女童子军从国民大会堂前游行至国民政府门前。（1946年摄）



5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参加还都记者招待会后步出会场。（1946年摄）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四月中旬,国民政府改组为所谓“多党政府”。四月二十三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在“子超楼”三楼会议厅召开首次国务会议。图中坐为蒋介石,蒋右一孙科、右二胡海门、右三陈布雷、右五邵力子、右六宋子文;蒋左一居正、左二吴鼎昌、左三张群、左四于右任、左五王云五。(1947 摄)



1947年5月20日,京、沪、苏、杭等地学校6000余名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国民党宪警在珠江路以高压水龙、棍棒阻挡游行学生前往国民政府。图为学生纠察队在奋力抢夺水龙。(1947年摄)



学生游行时的情景。图右上:学生与宪警抢夺水龙;右下:学生与宪警对峙;左上:学生代表与政府代表邵力子等准备谈判;左下:游行队伍出发;中:被宪警打伤的学生。(1947年摄)



有一座防空洞，池北是花园，池南有一幢两层西式楼房，是文官处职员宿舍。西花园(煦园)内的桐音馆，为军务局办公处。园内北端的三层西式大楼，是国民政府以至总统府的图书馆。后一排平房为政府档案室^[128]。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公布由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和《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为国民党统治制造法律依据^[129]。三月下旬，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政府加紧筹备“行宪国大”，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国大代表选举在南京、上海、北平、沈阳、汉口、广州等地同时举行^[130]。

同年五月十九日，国民政府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若干学校之学生及一部分工商界之职工，相率集众请愿，迭提过当之要求，出以越轨之行动”。^[131]次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16所专科以上学校6000余名学生聚集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遭到国民党宪警以水龙、棍棒袭击镇压，100多名学生受伤，28名学生被捕，造成震惊中外的“五·二〇”血案^[132]。

九、总统府(1948年5月~1949年4月)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副总统，实行总统制。

四月十九日，国民大会举行第十三次大会，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二十九日，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133]。

五月二十日，蒋介石、李宗仁就任正、副总统职。国民政府遂组成中枢机构——中华民国政府总统府，国民政府门楼换上监察院副院长周钟嶽所书“总统府”三字。

总统府组织机构，设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资政13人：吴敬恒、张人杰、李煜瀛、孔祥熙、许崇智、吴忠信、张君勱、徐傅霖、曾琦、李璜、莫德惠、章嘉、周钟嶽。秘书长：吴鼎昌；参军长：薛岳。下辖四会一院馆，即：国策顾问委员会，委员36人：邵力子、章士钊、张凤翔、俞飞铭、汤芑铭、钮永建、王树翰、陈大齐、尧乐、陈布雷、郑照、迪鲁瓦、何鲁之、张国淦、



李根源、鲍尔汉、孙丹林、罗桑坚赞、冯自由、李文范、陈其采、茅祖权、张作相、万福麟、邓家彦、焦易堂、蒋梦麟、张难先、姚雨平、余家菊、戢翼翘、肖萱、胡海门、张钫、魏怀、刘盥训。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崇禧;代主任委员:龙云。稽勋委员会,委员15人:张群、钮永建、何鲁之、胡海门、颜惠庆、刘维炽、张厉生、孙科、居正、戴传贤、于右任、周钟嶽、雷殷、王世杰、贾景德。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6人:张人杰、于右任、孔祥熙、戴传贤、孙科、陈果夫。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代)。国史馆,馆长:戴传贤。总统府大院内设六局两室:第一局(文书局),局长:许静芝。第二局(政务局),局长:陈方。第三局(军务局),局长:俞济时。第四局(典礼局),局长:吴思豫。第五局(印铸局),局长周仲良。第六局(总务局),局长:陈希曾。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侍卫室,侍卫长:石祖德^[134]。

同年初,国民政府经济日益恶化,“行宪国大”后,物价暴涨,货币贬值,至次年春,经济已至崩溃边缘,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引退;次日,李宗仁代理总统^[135]。

四月一日,国民政府和平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一行抵北平。当日,南京11所大专学校7000余名学生示威游行,揭露政府当局假和谈阴谋,在总统府门前集会及游行中遭大批特务宪警毒打,死3人,伤200余人,酿成震惊全国的“四·一”惨案^[136]。

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二十二年的统治宣告终结。

十、结语

长达300年之久的南京民国总统府遗址沿革,历史悠久,易主频繁;其具有晚清及民国时期近130年历史的建筑群,是国内罕见、保存完好的近代官府遗存。大院内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及遗存物件,与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著名人物都有密切关联。

鸦片战争后,南京民国总统府的遗址沿革,犹如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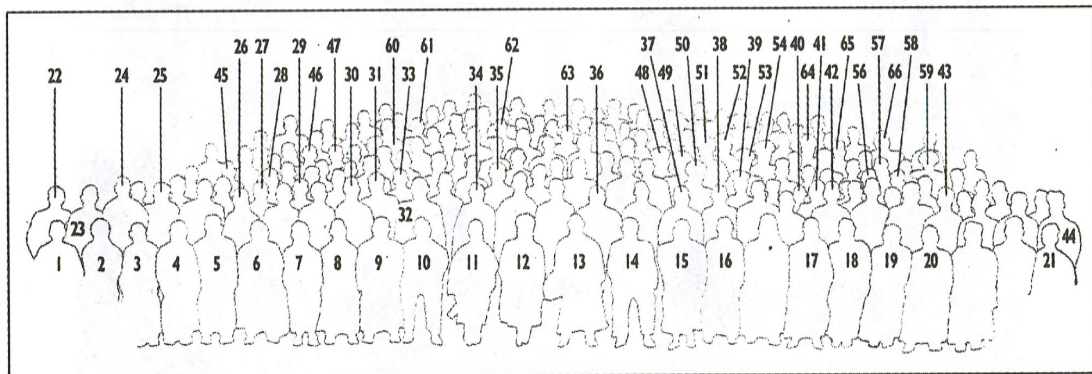
1948年5月1日，“行宪国大”主席于右任致闭幕词。（1948年摄）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就任总统、副总统。图为蒋介石就职后致词。（1948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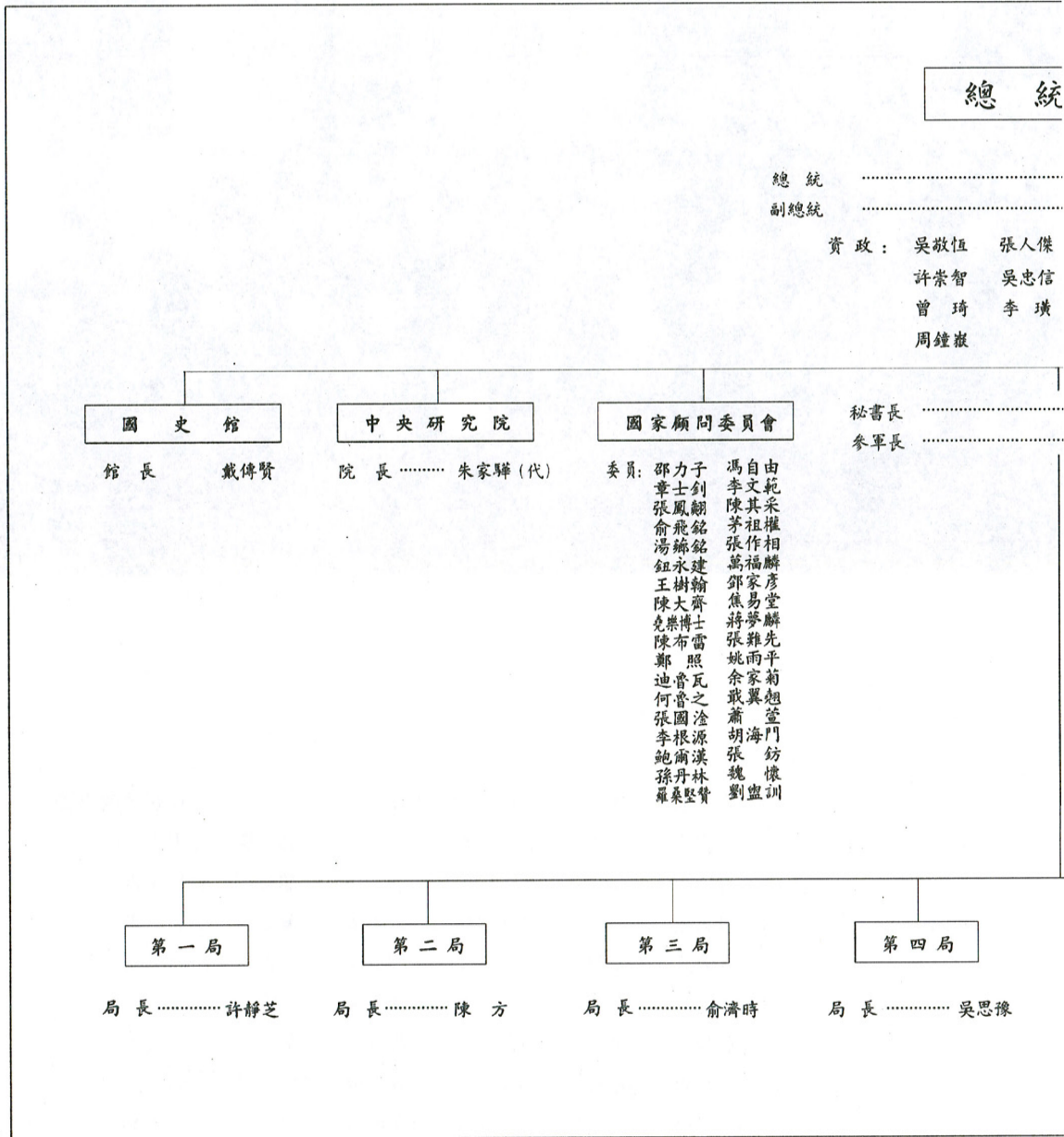
总统府全体人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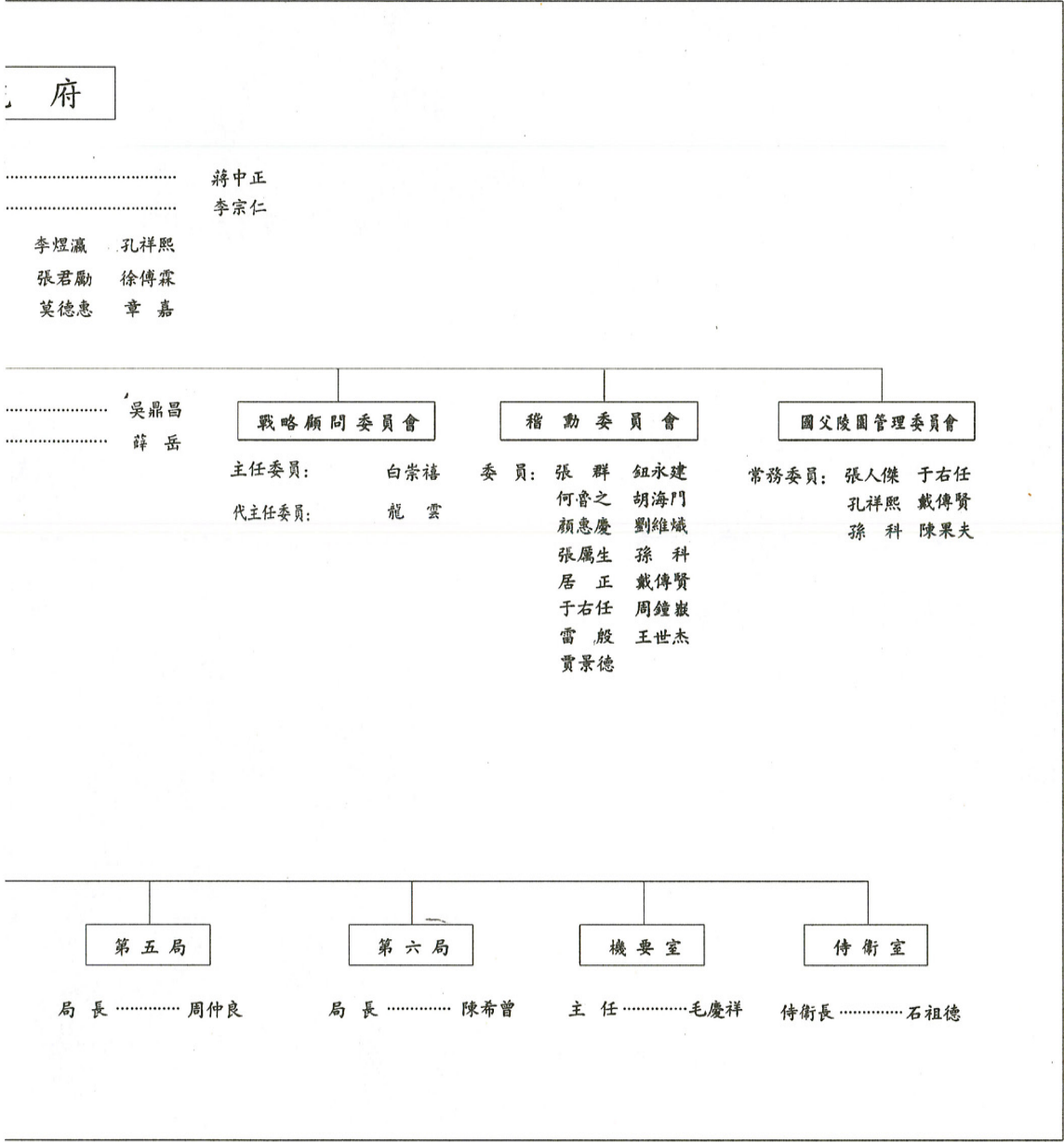


(1948年攝)

- | | | | | | |
|------|------|------|------|------|---------|
| ①茅祖權 | ②陳立夫 | ③戢翼翹 | ④邵力子 | ⑤莫德惠 | ⑥章嘉呼圖克圖 |
| ⑦王寵惠 | ⑧戴季陶 | ⑨鄒魯 | ⑩孫科 | ⑪郭德潔 | ⑫宋美齡 |
| ⑬蔣介石 | ⑭李宗仁 | ⑮張羣 | ⑯居正 | ⑰胡海門 | ⑱何應欽 |
| ⑲鈕永建 | ⑳王雲五 | ㉑何魯之 | ㉒谷正綱 | ㉓陳布雷 | ㉔徐堪 |
| ㉕吳鼎昌 | ㉖王世杰 | ㉗張厲生 | ㉘林雲陔 | ㉙黃伯度 | ㉚吳忠信 |
| ㉛馬鴻逵 | ㉜俞鴻鈞 | ㉝程潛 | ㉞陳其采 | ㉟朱家驊 | ㊱姚雨平 |
| ㊲常乃惠 | ㊳洪蘭友 | ㊴龍雲 | ㊵許世英 | ㊶黃紹竑 | ㊷謝冠生 |
| ㊸甘乃光 | ㊹左舜生 | ㊺俞飛鵬 | ㊻郭懣 | ㊼張知本 | ㊽顧祝同 |
| ㊾劉峙 | ㊿白崇禧 | ①孫連仲 | ②余漢謀 | ③徐永昌 | ④桂永清 |
| ⑤王正廷 | ⑥杭立武 | ⑦孫立人 | ⑧凌鴻勛 | ⑨黃珍吾 | ⑩秦德純 |
| ⑪劉士毅 | ⑫李士珍 | ⑬黃杰 | ⑭張治中 | ⑮于學忠 | ⑯黃仁霖 |
| ⑰陳慶雲 | ⑱周至柔 | ⑲余濟時 | | | |



总统府组织机构表





“行宪国大”选举总统期间，一家饥民跪在离国民政府不远的大行宫路口“告地状”行乞。（1948年摄）



1948年8月，政府当局发行金圆券。不久物价暴涨，金圆券贬值，至1949年3月，以9000000元金圆券兑换1块银元。图为市民在新街口交通银行内兑换金圆券。（1948年摄）



1948年12月，总统府第六局（总务局）发工资的一天，工人将金圆券抬到官员家。（1948年摄）



政史上重要一頁

蔣總統引退

共方疑其將東山再起 李宗仁遭重大試驗

蔣氏的「引退」，也是幾經曲折的，徐州失守，杜聿明被圍以後，局勢漸趨緊張，蔣氏沒有放棄「戡亂到底」的意志，臨行之前，還分任張華、余漢謀、朱紹良為重慶、廣州、福州三接濟公署主任，蔣岳、陳誠為廣東台灣兩省政府主席，且早已把存在上海的金銀運往華南，據悉是為將來再起準備。在胡野史和聲中，蔣在二月三日還在成都發表談話：「抵抗極權主義，或力中與工作」，可見總統「引退」之中，還另外有一番打算。

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後，儘管他有些和的誠意，而適遇的困難却是空前的，例如：一、孫科在行政院總辦公上所表示的不合作，二、釋

提出「引退」後的數小時，本報獲得南京確實消息，即在門首及本社附近貼出蔣總統決定下野的傳外，一時觀看人山人海，在蔣觀察中每個人都有一種鬆鬆的感覺，很多人牽著小本子紀錄蔣氏的內幕，美國軍官看了掛鐘珍電影攝影，電車開車的開到門口停下來看蔣外，的確，這是一個大新聞，是中國政治史上相當重要的一頁，一個從事革命二十年，滿頭白髮的蔣氏，不是一個崇拜的「民族英雄」，今天，至少是暫時被這「引退」了。

蔣總統在二十一日下午四時，當飛機離離的心緒，只要看他時時不自遠客很多的明故宮機場起飛，兩枚在大機場，便可以想像得到。

蔣總統在二十一日下午四時，當飛機離離的心緒，只要看他時時不自遠客很多的明故宮機場起飛，兩枚在大機場，便可以想像得到。

蔣總統於一月二十一日引退前，最後一次到中山陵前發願部隊，發表談話，時為一月十六日。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made his last public speech in Nanking on January 16, 1949 before he retired.

放逐學良的命途不能發現，三、共黨害國字的出任總統是「蔣美」的虛假和平，四、經濟政治以及軍事上不能完全控制，五、國材南次的釋放，代人受過，六、共黨要求建國，那一號戰犯和其他十四個名要「飛犯」，七、物價紙幣狂漲，金圓券暴漲的危險，八、一切，都是蔣氏代總統今天所擔負的軍去問題。但蔣氏就任十餘日來所表現的問題則更難負責任的精神，也應得若干人的同情和體諒。總之，在今日這從一個動盪的局勢，主觀的過早的評判一個人的成敗功過，都是不重要的，誰是真正為人民，真正為和平，人民自己是會看得更清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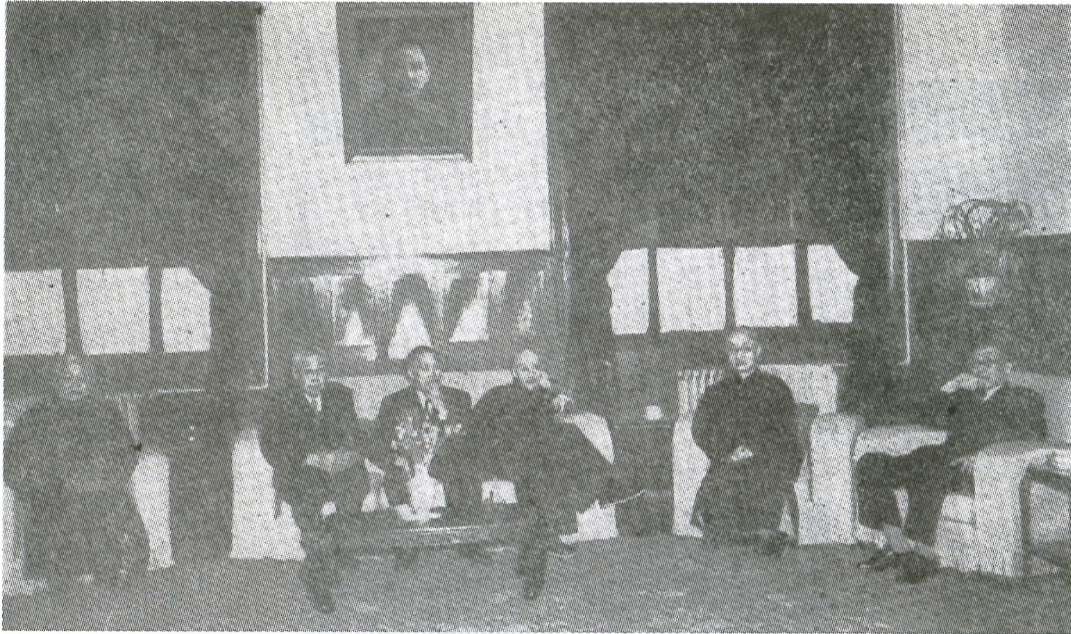



一月二十日午報本報曾於上海自總部之蔣國總統蔣氏引退，對之新聞，均列外強斯不與鬥者，讀者如歸。習日，對以都蔣總統蔣氏。
The United Pictorial issued an extra on January 20, 1949 for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retirement from his post.

上海《聯合畫報》第224期（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一月版）关于“蔣總統引退”的图文。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当日下午乘美龄号专机赴杭州，22日至奉化溪口。图为蒋介石在黄博路官邸向李宗仁等告别。（1949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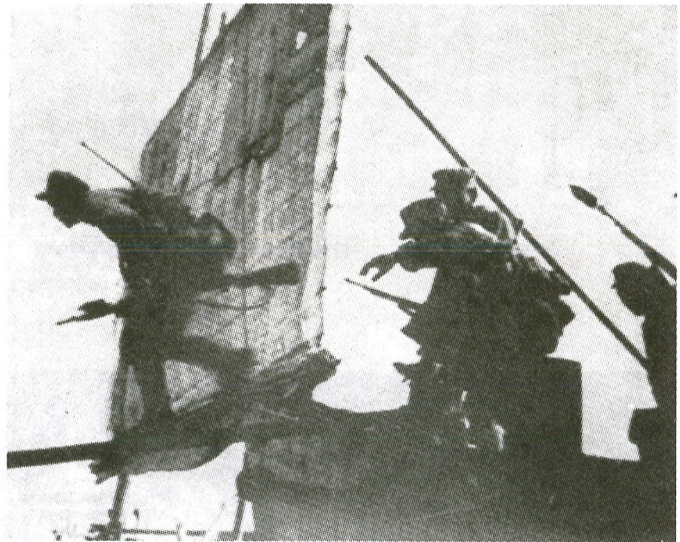
1949年2月27日，李宗仁代总统接见从北平归来的四位上海和平使者团成员。左起：邵力子、颜惠庆、李宗仁、章士钊、江庸、吴铁城。（1949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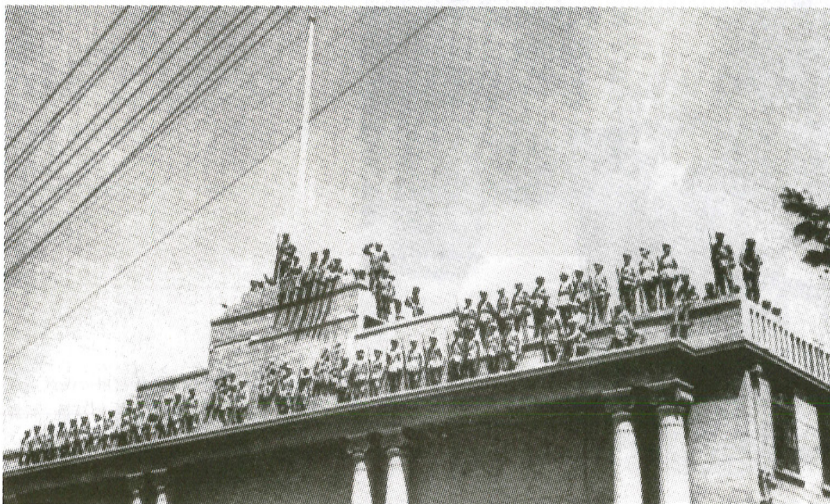
1949年4月1日，南京11所大专学校7000余名学生在总统府门前集会揭露政府当局假和谈阴谋，遭宪警殴打。（1949年摄）



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担任渡江作战指挥任务。总前委由刘伯承（中）、邓小平（左二）、陈毅（右二）、粟裕（左一）、谭震林（右一）五人组成，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1949年摄）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狮过大江。（1949年摄）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战士站在总统府门楼上欢庆胜利。（1949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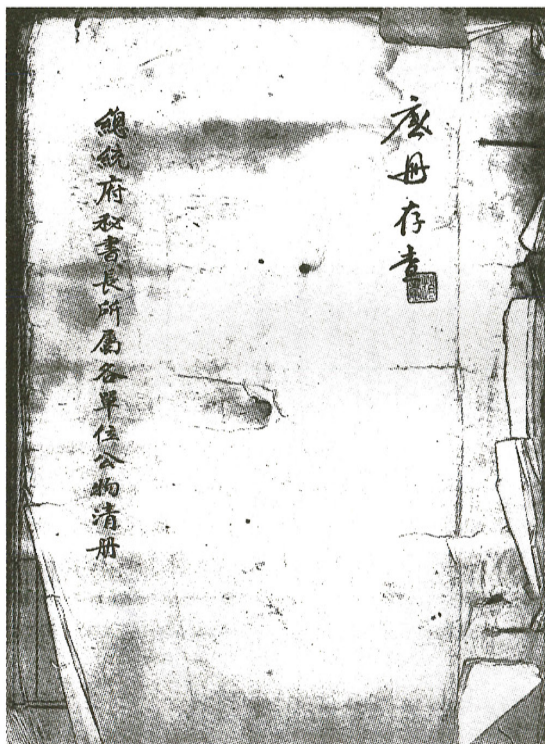
鐘山風雨秋蒼蒼，萬石巖壑
 神遊大江重踏新龍舟。餘生苦
 戰地無遺，慨而慷。宜於乘舟
 追窮寇，禱吾法。名高重器之
 天，表有情。天高有人，測
 三五足滄桑。

毛澤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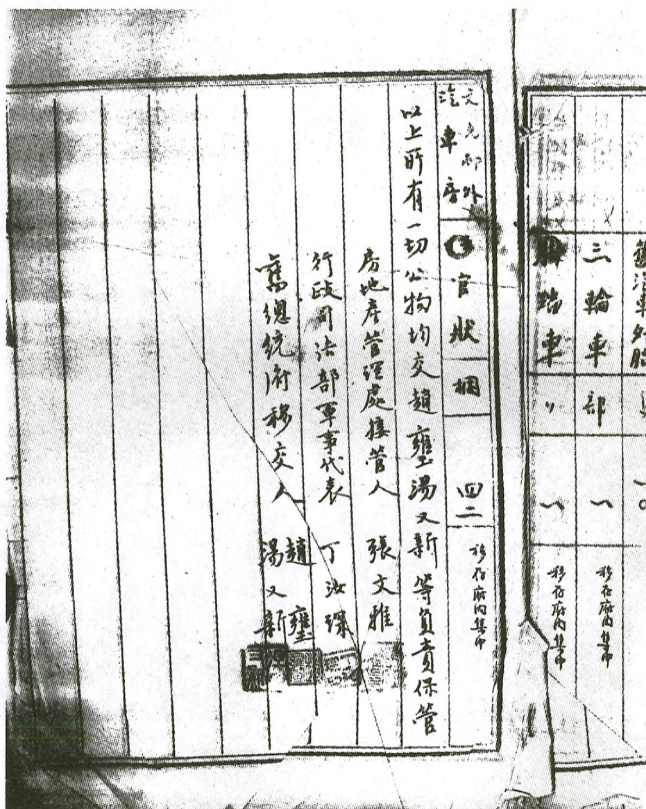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手迹。



毛泽东主席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喜看“南京解放”捷报。（1949年摄）



1949年5月，原总统府人员向南京市军管会呈交《总统府秘书长所属各单位公物清册》。



军管会代表、房地产接管人、原总统府移交人在清册上签名盖章。



它揭示出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历史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独立、民主、富强,即反帝反封建和实现现代化。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曲折进程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屈辱走向辉煌,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实践检验从切身感受中作出的正确选择,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作者为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筹] 副研究馆员)

-
- [1]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首都志》载,当时名国府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伪时期称维新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后易名林森路;解放后至今改名长江路。
- [2][114]南京市房产管理局产权处资料登记第139200号:《总统府移交及接管经过》,第12页。
- [3]1974年1月10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机关行政管理局房产管理所测绘制图标明:长江路292号大院占地面积49340平方米,合74亩,有房屋81幢,建筑面积26832.8平方米,使用面积14103.5平方米。1982年5月又收回房屋1幢(民初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办公处),占地面积1900平方米,建筑面积435.32平方米,使用面积311平方米。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尚有34000平方米占地面积被其它单位借用,故不在大院总面积计算在内。
- [4]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七十四、列传第一百六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7016~7021页。
- [5]赵尔巽等纂:《清史稿》卷四、本纪四、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95、97、107页。
- [6][7][8]赵尔巽等纂:《清史稿》卷一百十六·志九十一·职官三,第3338、3336。
- [9][53][60][61][62][65][66][67][68]赵尔巽等纂:《清史稿》,卷一百九十七、表三十七、疆臣年表一,第7060页,7178~7179、7199~7207、7215~7217、7220~7235页;7342~7357、7800~7807页;7396~7403、7405~7408、7411~7414页;7404~7405页;7428~7432、7447~7448、7460~7462页。
- [10][18]顾起元撰:《客座赘语》卷五、金陵诸园记,〔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刻本;另见:谭棣华、陈稼禾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160页;吕燕昭修、姚鼐纂:《新修江宁府志》卷之八、古迹,〔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刻本,第25页;陈作霖编纂:《金陵琐志五种》,冯煦:《钟南淮北区域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刊本,第24页;叶楚伦、柳诒徵主编、王焕镛编纂:《首都志》卷二、街道,正中书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第96页。



- [11]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第 14 页。
- [12][17] 陈开虞纂修:《江宁府志》建置,〔清〕康熙七年(1668 年)刻本,第 15、6、21 页;袁枚纂修:《江宁县新志》卷首《上江分界全图》;〔清〕乾隆十三年(1748 年)刻本;同上。
- [13][56][58][59][106]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建筑志》,方志出版社 1996 年,第 21、22、62、23、4 页。
- [14] 吕燕昭修、姚鼐纂:《新修江宁府志》卷之二·天章,第 33 页。
- [15][19][24][28][30][33][36][38][44][47] 张德坚:《贼情彙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中国史学会主编,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第 164 页。
- [16][20][23][26][27][29][32][35][37][39][43] 漆浮道人:《金陵杂记》,同[15]丛刊·第四册,第 627、626 页。
- [21][34]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同[15]丛刊·第四册,第 706 页。
- [22][40][42][英] 福礼赐(Forest)著、简又文译:《天京游记》,同[15]丛刊·第六册,第 948、949 页。
- [25][31][41][45][46] 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卷一,〔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刻本,第 36 页。
- [48] 朱悞:《南京的名胜古迹》,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第 21 页。
- [49][51][52][54][55] 莫祥芝、甘绍盘修、汪士铎等纂:《上江两县志》卷十一·建置,〔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刻本,第 1、1~7、8 页。
- [50] 曾国藩修订:《金陵房产告示八条》,〔清〕同治四年(1865)五月刻本,第 1~6 页。
- [57][81]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革命写真画》(第三集),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元年(1912 年),第 5 页;第十二集,第 16~18 页;第 3 页。
- [63] 赵尔巽等纂:《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九、列传一百六十六,第 11605~11608 页。
- [64]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第 30~33 页。
- [69] 赵尔巽等纂:《清史稿》,卷四百二十六、列传二百十三,第 12243 页。
- [70][72][73][74][76][77][78][79][80][82][83][85][86][87][88][89][90][91][92][93][100],《首都志》卷十六、历代大事表,第 1528 页;1529 页;1530 页;1531 页;1532 页。
- [71][84][94][101][102][103][104][133] 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上),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12 页;142 页;143 页;499 页;506 页;507 页;525 页;585 页;665 页。
- [75]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八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第 20、22、23 页。
- [95] 上海《申报》:民国六年(1917 年)四月四日,第四版。



- [96]上海《申报》: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二日,第四版;汉口《民国日报》: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四日,第二版;郭秀茹、罗庆新、刘健:《南京四·一〇反革命事件》,《南京党史资料》(1984年第6辑),南京市党史办公室1984年。
- [97]上海《时事新报》: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九日,第三版;宋平:《蒋介石——总司令·委员长·总裁·主席·总统》,香港利文出版社1994年,第154页。
- [98]上海《晨报》: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三、十四、十五日,第二版;同上书,第155页。
- [99]汉口《民国日报》: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二十日,第一版。
- [105]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中华民国首都建设计划》,民国十八年(1929年)四月版。
- [107]国民政府参军处典礼局:《国民政府对外宾礼一周年汇刊》,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刊发,第1~3插页。
- [108]南京《中央日报》: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十九日,《中央画刊》国民政府新建大门照片。
- [109]《国民政府公报》: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月八日,第289号,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印行。
- [111]南京《中央日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月三十一日,第四版。
- [112]南京《中央日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二月二日,第一版。
- [113]南京市档案局:建字第6156号、筑字第5596号《建筑执照》,南京市政府工务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二月十二日签发,并附《建筑要求和施工说明》。
- [115]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房地产志》,南京出版社1996年;第201~211页。
- [116][129][130][131][135]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4页;963页;1018~1019页;998页。
- [117]王晓华、原伟华、范玉荣、丁晓虹编译:《日本侵华大写真》,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3页。
- [118]上海《新闻报》: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 [119]行政院宣传局编制:《维新政府初周纪念册》,1939年5月,第5页。
- [120]《南京新报》:1938年10月2日,第一版。
- [121]虞锦福绘制:《国民政府地形图》,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三日。
- [122][123][124][125][126][127][128]朱明镜:《我所知道的蒋介石总统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37页。
- [132]南京《中央日报》: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一版。
- [134]中华民国政府新闻局:《中华民国政府组织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月制印。
- [136]南京《中央日报》: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四月二日,第二版。



南京总统府遗址明汉王府质疑

高丹予

长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对南京总统府的历史讳莫如深,仅知道它曾是太平天国天朝宫殿的遗址^[1]。八十年代初至今,诸多叙述南京总统府历史和介绍金陵古迹的著作中,又把它推前为清江宁织造署和圣祖玄烨(康熙)、高宗弘历(乾隆)数次南巡时的行宫所在,甚至推寻到是明初两个汉王的府第和黔宁王府的遗址。然而,历史的遗存不能仅凭人们的主观臆断,它的存在与否应符合当时客观社会发展的过程和确切的事实。让我们沿着诸多的史料记载,并查看明《洪武京城图志》和清上元、江宁两县府等志中所绘的官衙、府第和街道等处的方位图示,来追寻南京总统府的最早遗址。

按时间顺序,我们先来考证明初两汉王和黔宁王的身世及其府第所在的位置。

首言前汉王陈理。元末,中原群雄角逐,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率军在江西鄱阳湖的湖口、泾江一带与自称汉王的陈友谅军会战。“友谅中流矢死”,“军大溃,太子善儿被执。太尉张定边夜挟友谅次子理,载其尸(按:指友谅尸体)遁还武昌。……嗣伪位(汉王)”。“是冬,太祖亲征武昌。明年二月再亲征”,并派大臣“入城招理。理逐降”^[2]。朱元璋为了羁縻陈理和陈友谅的旧部,“府库财物恣理取,旋应天,授爵归德侯”^[3]。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八月,改称南京)^[4]称帝,国号明,建号洪武,后世尊太祖。不久,即在皇城的西华门外为陈理盖了一座侯第——归德侯府(按:《明史》及万历《上元县志》中均未见太祖封陈理为汉王的记载。汉



王陈理之说，始见于清嘉庆《新修江宁府志》中有关江宁织造署的记载：“尚衣局本汉府旧址。明洪武初，封陈友谅子理为汉王，建府西华门外，…后为织局”^[5]，后为一些史志沿用。笔者认为，朱元璋招降陈理后已授侯，如无大功，当不再封王；再者，即使朱称帝后再封陈理王，亦不会封其“嗣伪位”的称号，此属当朝忌。鉴此上，疑是后人称陈授侯前嗣其父位的自封号——汉王。侯府的位置，据最早清康熙七年（1668年）的《江宁府志》载：“织造府在督院前”^[6]，“总督部院衙门在府治东北沐府东门”^[7]（按：府，江宁府署，“在内桥西南”，今府西街南京市第一中学一带；“东北”，以府署为坐标，当在今总统府遗址周围一带；“沐府”，黔宁王沐英府。据光绪《钟南淮北区域志》在“沐府西门与糖坊桥”条目中载：“沐府西门东为黔宁王沐英府第故名”^[8]；民国时期纂修的《首都志》为“国府路西段与糖坊桥”栏目注：“沐府西街骂驾桥，东接黔宁王府故名”^[9]）。按此方位，黔宁王沐英府应座落在今长江路288号以西、江苏省美术馆以东和太平北路十字路口以北、浮桥往东以南之间一带。又据《钟南淮北区域志》卷首所绘《江宁府全图》中方位标明^[10]，“总督衙门”与“沐英府”之间东西并列，可以看出，沐英府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其东门与同坐北向南的总督衙门的西门相望。“织造府在督院前”，即总督衙门的前面是织造署。“尚衣局本汉府旧址”，则织造署即归德侯陈理（汉王）的原府第。再据乾隆《江宁县新志》卷首的《上江分界全图》中所绘方位^[11]，“织造”与“总督部院”之间，呈南北前后向，“织造”前是西华门大街，系上元、江宁两县的分界线。按此方位，归德侯（汉王）府的位置，应是今总统府遗址前，汉府街以西、大行宫小学以东和大行宫十字路口以东、长江路东口以西之间的一块长方形地段。但好景不长，“理居京师，邑邑出怨望语。帝曰：‘此童孺小过耳，恐细人蛊惑，不克全朕恩，宜处之远方。’”^[12]洪武五年（1372年），“理及归义侯明昇并徙高丽”。^[13]徙，古称流刑为徙。陈理等徙边藩属，是犯罪服刑。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政权，明初法严。当年，太祖“定宦官禁令及亲属相容隐律”^[14]，规定“刑法有五：笞、杖、徒、流、死。”^[15]流属刑之四，又分三等：“二千里，



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为一等加减”。^[16]陈理等徙高丽后,再未见有其返回记载,实际上是到几千里的“口外为民”,终身流放。其亲属,“徒流者并听随行,违者罪杖”^[17]。归德侯府即当罚没废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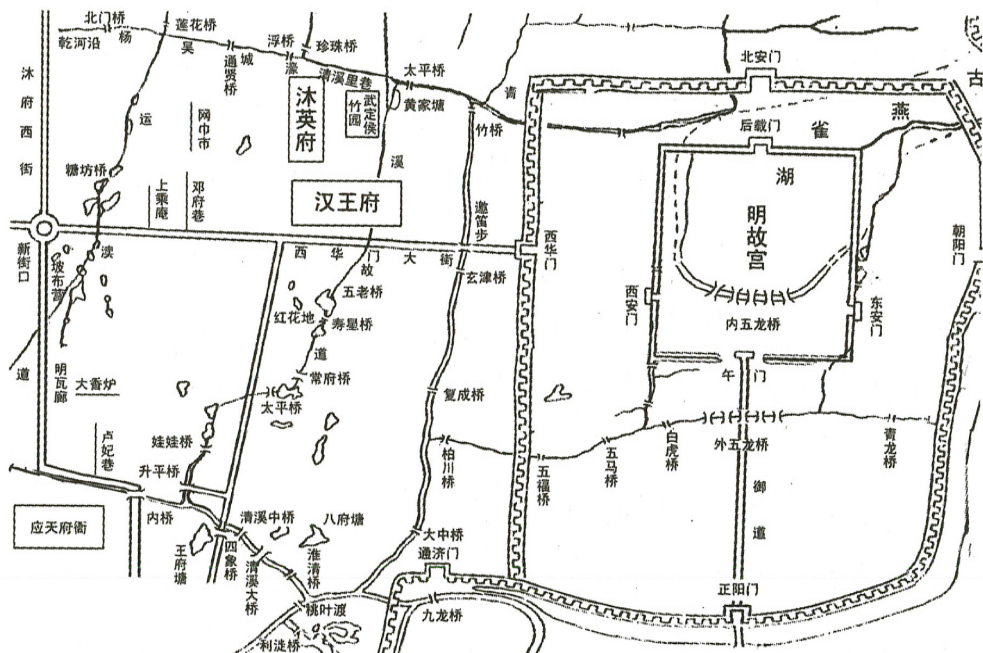
次言黔宁王沐英。太祖“抚为子,从朱姓。年十八,授帐前都尉”,“寻迁大都督府佥事,进同知”。洪武十年(1377年),“充征西副将军,从卫国公邓愈讨吐番。……功多,封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西平侯”。洪武十四年(1381年),“寻拜征南右副将军,同永昌侯蓝玉从将军傅友德取云南”,在曲靖消灭元梁王,并平定大理、乌撒、东川、建昌、芒都等少数民族地区。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冬,“入朝,赐宴奉天殿,……帝亲拊之曰:‘使我高枕无南顾之忧者,汝英也。’”“二十五年六月,……卒于镇,年四十八。……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18]。可见,沐英是位深得太祖宠爱的功臣。其府第——黔宁王(沐英)府的位置,前文已考。沐英墓在今中华门外岩山上石马上应塘村,解放后有墓志出土^[19]。另,沐英有三子,“皆镇云南”。次子沐晟,永乐四年(1406年)“论功封黔国公”,其子沐斌,“幼嗣公爵,居京师”^[20](按:沐英有后人迁南京,故清诸志中均有沐府与总督署同时并存的记载)。

最后言汉王高煦。成祖朱棣次子,“性凶悍”。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立长子高炽为太子,“封高煦为汉王,国云南。高煦曰:‘我何罪,斥万里?’不肯行”。永乐十三年(1415年)改封青州,又不欲行,“成祖始疑之”。高煦“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隶籍兵部,纵使劫掠”。次年,成祖“尽得其不法数十事,切责之,褫官服,囚系西华门内,将废为庶人”。后经太子高炽求情,成祖削除其护卫,改封乐安州,仍称汉王。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病逝北征途中。仁宗高炽即位,年号洪熙,“未几,仁宗崩”。宣宗瞻基继位,年号宣德。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高煦在乐安谋反,宣宗“及闻亲征”,俘获高煦父子,并令其“为书召诸子,余党悉就擒”。宣宗废其“父子为庶人,筑室西安门内锢之”^[21]。之前,洪武三十年(1397)太祖定大明律^[22],后世沿用。“明律视唐简覈而宽厚不如宋”,谋反列十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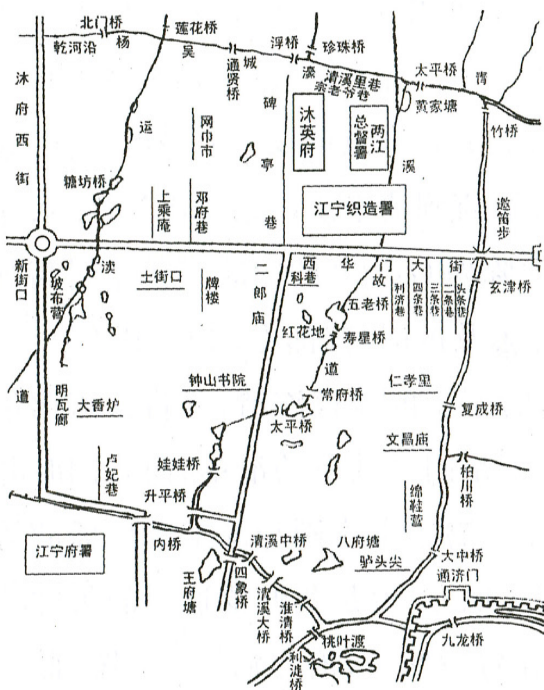


之首^[23],当灭十族,其家产罚没。不久,“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株连死者“六百四十余人,其故纵与藏匿坐死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编边氓者七百二十人”^[24]。永乐十三年高煦改封乐安州前,其在南京的汉王府位置,为了避讳,明及清初的诸多地方志均无具体记载,直到清平定南京 166 年之后,才在嘉庆《新修江宁府志》中注明是归德侯陈理(汉王)的旧府,“永乐封高煦为汉王居之”^[25]。此说,后在清诸多地方志及民国《首都志》中沿用^[26]。

综上所述,我们已为明初两汉王和黔宁王的身世澄清,并将其府第位置基本考定,即前后汉王府和黔宁王府不是同一处所的沿革,而是同时并存相近的两个地方(前后汉王府系一处);黔宁王府则与汉王府后面的另一处所相近并列,“其东门可望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追寻的关键所在。据明《客座赘语》载:“武定侯竹园在竹桥西,汉府之后”^[27],(按:此为明人写明事的史料笔记中首次提及“汉府”),《首都志》中沿用^[28](明初武定侯郭英,“征陈友谅,战鄱阳湖,皆与有功”。洪武十四年(1381年)“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攻克曲靖、陆凉、越州”等地,“降大理、金齿、广南,平诸山寨”。洪武十七年(1384年),“论平云南功,封武定侯”,“永乐元年



图一// [明]洪武元年(1368年)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汉王府、沐英府、武定侯竹园位置图。



图二// [清]顺治四年(1647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总督署、沐英府、织造署位置图。

卒”)[29]。“汉府之后”应是武定侯竹园(图一)。按此方位,清顺治四年(1647年),就在这块地方修建总督衙署[30],此即今总统府的最早遗址所在(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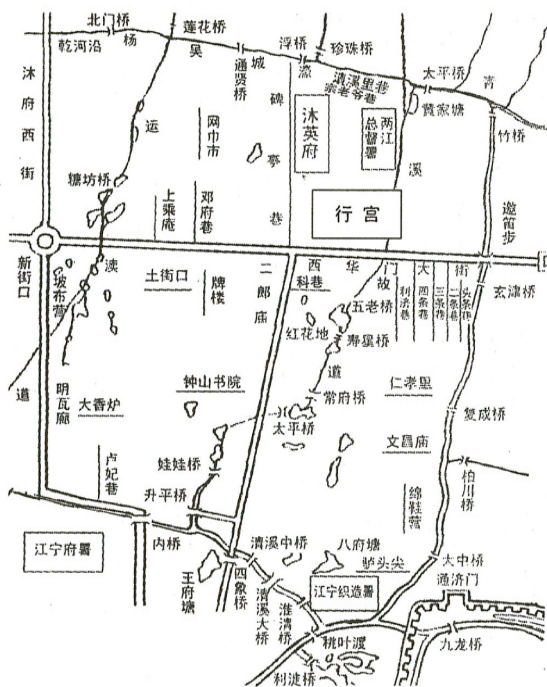
再,据“尚衣局本汉府旧址”载,清康熙二年(1663年),曹玺(按:曹雪芹的曾祖)由京赴第一任江宁织造[31],遂将设在后湖(今玄武湖)畔的明染织局改名为江宁织造署,旋即迁往总督署前,将废置的明汉王朱高煦的旧府第改建为江宁织造署。后来,曹玺在署内建亭,其子曹寅“课子树楝其侧,名曰楝亭”[32]。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四十六年(1707年),圣祖玄烨六次南巡到南京时,从二十八年(1689年)二次起,五次将织造衙署作为行宫[33]。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曹寅(按:康熙二十三年曹玺卒于任所,其子寅系曹雪芹的祖父)由苏州织造移任江宁织造,从康熙三十八年起,当了四次接驾的差[34]。曹寅自号楝亭,著有《楝亭诗钞》、《楝亭十二种》等书[35]。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曹頔(按: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病故,其子頔接任两年后病歿,其过继子頔系曹雪芹的父亲)袭职江宁织造。雍正五年(1727年),因皇室斗争牵连,曹頔被逮问罪,罢官、抄家。次年,其家属(按:此时曹雪芹约五岁左右)也迁回北京[36]。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弘历首次南巡时,织造署奉旨改建,“行宫时藩司兼织造故无署”[37](按:江宁藩司署原在苏州,乾隆初年移至南京淮清桥东)[38]。经“大吏改建,行殿有绿静榭、听瀑轩、判春室、镜中亭、塔影楼、彩虹桥、钓鱼台诸胜”[39](按:其时,曹家的人早已不再任织造,他们迁回北京已有24年之久)。乾隆二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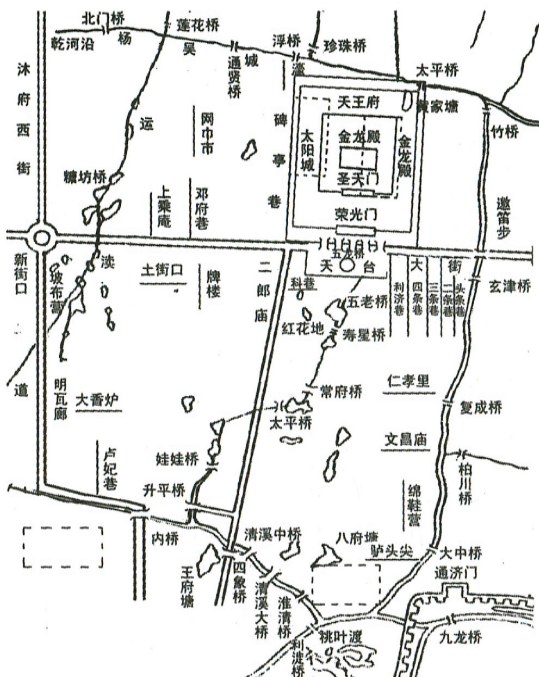


(1757年),弘历二次南巡到南京时驻蹕于此,并作为主要行宫(今大行宫名之来历),尔后的四次来南京亦在此驻蹕。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一位姓舒的织造“买淮清桥东北民房改建织造衙署”^[40](图三)。近年一些文章中,将织造署和总督署合二为一,把曹府内发生的事放到后面的督署中,又有将曹家昔日的繁华拉到乾隆行宫内,还有把织造署的新旧地址混为一谈,这些都是与事实不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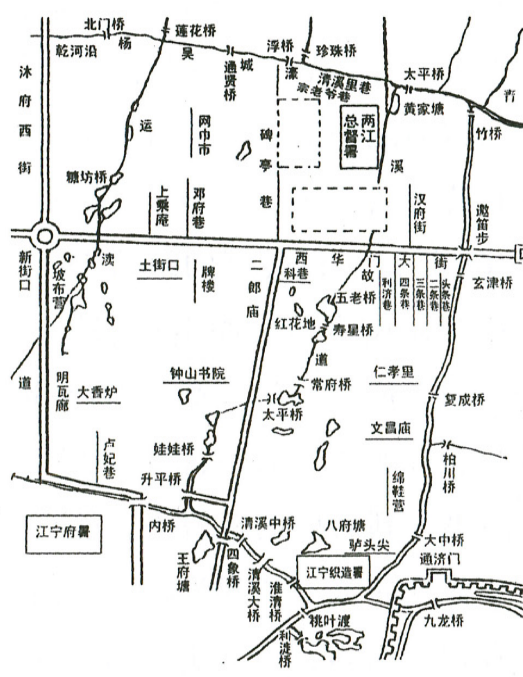
另,今总统府遗址大院内的西花园又名“煦园”,并有墙上的砖刻为证,有人因据以推断为明高煦的府第——汉王府之所在。此亦非是。上文已考,明初的汉王府、黔宁王府、武定侯竹园是同时并存的、三个相近的不同处所。汉王府旧址清初改建为织造署,武定侯竹园旧址亦是清初的总督署所在。前面的方位及其景致不可能移到后面去。据清《贼情汇纂》、《金陵杂记》等和同治《上江两县志》载,太平天国建造天朝宫殿时,几乎包括原织造署(行宫)旧址、总督署、黔宁王府等三处所有的地盘在内^[41](图四)。后被清湘军焚毁,“仅西花园内的石舫尚存”^[42](按:此石舫并非太平天国的遗物。据嘉庆《新修江宁府志》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弘历二次南巡到南京时,曾赐书总督斋(西花园)内太平湖边石舫为“不系舟”^[43]。同治十年(1871年)重建总督衙署时(图五),院内亦重建“花园、荷花池、驳岸、一周水沟五百六十余丈,有石船一座”^[44],后又经晚清及民国期间几次修复,已非原貌。又,高煦已有宽敞的汉王府供其休闲玩乐,再“凶悍”,亦不大可能到府院后面的武定侯竹园内建座花园。煦,温暖之义。鉴



图三//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至咸丰三年(1853年)总督署、沐英府、织造署位置图。



图四// 太平天国时期(1853-1864年)天朝宫殿位置图。



图五//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总督署、织造署位置图。

此,“煦园”名当系后人在修园时之所书刻,取春风和煦之意而已。由于园名与前面汉王府主人高煦的“煦”字关联,故有人据以作出可疑的论断,在此提出鄙见,供读者参考。

(作者为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筹] 副研究馆员)

[1] 国务院于1982年2月23日发布,南京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京市人民政府在今长江路292号大院内(总统府遗址)立有纪念碑。

[2][3][4][12][18][20][21][23][24][29]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十一,第3690~3691页;卷二、本纪第二、太祖二,第21页;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十四,第3756~3759页、第3761~3762页;卷一百十八,列传第六、诸王三,第3616~3620页;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十八,第3821、3822页;中华书局1974年。

[5][25][30][37][39][40][43]吕燕昭修、姚鼐纂:《新修江宁府志》卷之八、古迹,第25页;卷之五、纪年事表,第13页;卷之十二、建置,第21页,第6页;卷之二、天章,第33页;



-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刻本。
- [6][7]陈开虞纂修:《江宁府志》卷之七、建置,[清]康熙七年(1668)刻本,第15页。
- [8][10][32]陈作霖编纂:《金陵琐志五种》,冯煦:《钟南淮北区域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刊本,第30页,第1页,第16页。
- [9]叶楚伦、柳诒徵主编、王焕镛编纂:《首都志》卷二、街道,正中书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第96页。
- [11][13]袁枚纂修:《江宁县新志》卷首,[清]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 [14][15][16][17][22]丘汉平编著:《历代刑法志》(下),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568页,第569页,,第572页,第570页。
- [19][42]朱偁:《南京的名胜古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1页,第18页。
- [26][28]同[8],第24页;同[9],第104页。
- [27]顾起元撰:《客座赘语》卷五、金陵诸园记,[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刻本,谭棣华、陈家禾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160页。
- [31][33][34][35]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4页,第15页。
- [36]周汝昌:《曹雪芹小传》,百花出版社1980年,第255页。
- [38][44]莫祥芝、甘绍盘修、汪士铎等纂:《上江两县志》卷十一、建置,[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第8页。
- [41]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中国史学会主编,神州国光社1952年,第164页;滌浮道人:《金陵杂记》,同上丛刊,第四册,第626~627页;同[38],第1页。



[清]《新修江宁府志》中有关江宁织造署的位置及其改建为乾隆行宫的记载。

行宮在江寧府治利濟巷大街向為織造解署
 聖祖南巡時即
 駐蹕於此乾隆十六年大吏改建
 行殿有綠靜榭聽瀑軒荆春室鏡中亭塔影樓彩虹橋釣
 魚臺諸勝內貯歷年奉
 頒法物謹列於左
 御製七言詩一軸
 御題匾聯其六副以上乾隆十六年
 三希堂法帖一部乾隆十八年
 御製七言詩一軸乾隆二十二年

總督部院署在府東北沐府東門
 將軍署在駐防城內 左翼副都統署在駐防城內
 軍署東南
 江寧織造署舊在府城東北督院署前乾隆十六年以
 改建
 行宮時藩司兼管織造故無署乾隆三十三年織造舒
 買淮清橋東北民房改建織造衙署
 江寧布政司署在府城南舊大功坊內 即安徽布政司
 五年奉文移安藩 庫在司署內 理問廳署在府城
 署駐安慶府城內 淮清橋東管糧同知劄 日盈庫大使署在江安糧道

[清]《新修江宁府志》中有关江宁织造署改建行宫后搬迁的记载。

御史廊	珍珠橋	梅園新村	寧濟邨	紫禁城	黃埔路	蕪園	桃源新村	水晶台	竺橋	又一村	漢府街	西華巷	欄標	馬標	塔節里	鼎新里	黃家塘	太平橋南	太平橋
		右一局九所							大廳部分廳所皆織造			狗兒巷						第一駐蹕所大廳署署	
									客棧暨舖式定後台園在竹園西廂房之後										

民国《首都志》中有关汉府街、竺桥等街道变迁的简述。



南京长江路 292 号大院建筑遗存考

张祖方

南京市长江路 292 号大院,历史上曾为清两江总督署、太平天国天朝宫殿、中华民国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国民政府和总统府的所在地。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政治地位和风格迥异的建筑遗存一直蜚声海内外。

长江路 292 号大院现有用地面积 43202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0815 平方米,其中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建筑 70 余栋,建筑面积达 17338 平方米^[1]。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遗存就是一段沉重的历史载体,通过这样的载体,可以汇聚出近代中国百余年间的政治风云,把人们带进那难以忘怀的岁月。

(一)

早在清顺治四年(1647年),清王朝就在这里初建三省总督署,总督江南(江苏、安徽两省合称)、江西、河南三省军政粮饷等。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这里定为两江总督署,辖江南、江西两省^[2]。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天王洪秀全定名南京为天京,将这里作为太平天国中央政权所在地,在两江总督署的基础上,大兴土木,建造天朝宫殿。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清湘军破天京,历经十年建成的壮丽天朝宫殿,几天之内化为一片废墟。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在烧毁的天朝宫殿原址上复建两江总督署。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于民国元年元旦(1912年1月1日)在此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四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该处为黄兴的留守府。六月,留守府取消,这里频繁易主,相继成为江苏都督府、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将军行署、都督公署、副总统府、



督办公署、联军总司令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院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日军进逼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次年(1938年)三月二十八日,由日军扶植的汉奸梁鸿志等在此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大院被汪伪政府的监察院、立法院、考试院及军事参议院占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这里重新成为国民政府办公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五月,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大院由“国民政府”改称“总统府”,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

(二)

长江路292号大院的早期建筑,由于战事频繁,政权多变,特别是经过两次大火焚毁,现基本上已不复存在。据史料记载,第一次大火发生在咸丰三年(1853年)底,当时正值天王洪秀全征集男妇万人“並力兴筑”天朝宫殿之际,不慎起火,使已经落成的天朝宫殿等建筑“燔为焦土”^[3]。第二次火灾是在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天京被浙江巡抚曾国荃统领的湘军攻陷,入城湘军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就抢,天京全城火光冲天,连烧七日,天朝宫殿也随之再度化作一片瓦砾,仅西花园中的石舫幸存^[4]。该石舫系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两江总督尹继善所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高宗弘历第二次南巡时,应尹继善之求,曾为石舫亲笔赐名“不系舟”^[5]。

院内现有的主要建筑,除上述清中期建造的石舫外,其他修建时间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段(图一)。

一、清同治十年(1871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晚清时期

同治九年(1870年)秋,曾国藩接替被刺身亡的马新贻再任两江总督。次年(1871年)正月,曾国藩“依照原式建筑”在这里重建两江总督署,



并对西花园进行全面改造,至十一年(1872年)四月工程全部竣工^[6]。现在的东西朝房、马厩、大堂、穿堂及穿堂两侧的部分建筑基本上保持了当时的格调。改造后的西花园占地21亩,具有典型的江南古典园林建筑风格,其内除原存的石舫外,还有鸳鸯亭,望亭、桐音馆、忘飞阁、夕佳楼、御书碑亭、漪澜阁等。这些建筑后来历经修整,至今仍基本完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在西花园西侧新建一栋具有西式古典风格的七开间花厅,此建筑于1912年成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的办公处^[7]。

此外,西花园东北角的一幢三开间两层小楼,原为两江总督高级幕僚的住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住在这里。文化大革命中,小楼曾遭火灾,不久即按原样修复^[8]。

二、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月的北京政府时期

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任中华民国政府总统,这里成为冯国璋的副总统府。次年四月二日晚,由于府内冯的居室起火,致使60余间房屋被烧毁。同年五月,在原地重新建房40余间^[9]。现在所见的穿堂中后部西侧具有民国早期风格的房屋就是当时所建。

民国十四年(1925年),孙传芳任江苏督办,次年,(1926年)原清两江总督署的第六进被改建为新式假三层楼房(在今“子超楼”前,为原总统府第二局办公房),同时期改建的第五进后来为蒋介石接见外宾和会客的用房^[10]。这两处建筑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风貌。

三、民国十六年(1927年)至二十六年(1937年)的国民政府时期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由刚成立的首都建设委员会主持着手制定“首都建设计划”,并于当年对国民政府所在地实施改造^[11]。这里原两江总督时期的围墙、二门、圆门及门前两侧的东西辕门等此时均被拆除。重建的国民政府



大门于1929年底建成,1930年初在门楼上被塑上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手书的“国民政府”四字;东西辕门拆除后即被拓展成东西向的“国府路”(今长江路);原清两江总督署的西暖阁1930年被改建为国民政府大礼堂;同年十二月,在西花园太平湖北端又新建了一栋三层西式大楼,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的办公处,后为总统府的图书楼^[12]。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二月七日,南京市政府工务局签发建筑执照,批准国民政府文官处文书局在穿堂最北处兴建一栋四层(假五层)办公楼,其“建筑长100尺、宽60尺,工程费用法币106952元,施工期限250个晴天,建筑构造为钢骨水泥、铁制门窗。”该楼由鲁创营造厂承建,于次年(1935年)十二月五日竣工^[13](图二、图三)。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国民政府还都,这座办公楼被冠名“子超楼”,以纪念国民政府已故主席林森(林森,字子超),大门前原“国府路”亦被更名为“林森路”。

与“子超楼”同年建造的还有国民政府主计处(主管岁计、会计、统计事务)的二层青瓦屋面办公楼(该楼位于西花园的东南角,1935年5月开工,当年12月26日竣工,建筑费用法币28500.50元,由顺源营造厂承建,现暂为部队使用)、喷水池、防空洞等。这些建筑至今保存完好^[14]。

[据档案记载,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二十五年(1936年),南京市土地局曾对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行政院、文官处(辖文书、印铸两局)和参军处颁发“公有土地登记嘱托书”,划定了土地使用的四至范围。从绘制的审查用图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段后期大院内的建筑布局情况。(图四~图七)]

四、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四月的国民政府及总统府时期

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的八年期间,大院内的建筑虽未遭受大的损坏,但因年久失修,多已屋漏漆落,破旧不堪。为迎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市政府工务局受命于重庆国民政府,派员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测绘了《国民政府地形图》(图八),并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初对



国民政府原办公用房及西花园进行全面修缮(包括水暖设施等),参与修缮工程的有“京沪两地规模较大营造厂昌华等十五家”。其中西花园工程因物价飞涨,资金不到位,直至1946年12月20日才全面完工,其他工程均在当年五月初交付使用。此次大修中,原谭延闿书写的“国民政府”四字于1946年4月底被重新赶塑在大院的门楼上,原文官处宿舍和印铸局办公房也由平房改建成二层楼房。当时新建的建筑物还有大门内西侧的汽车房和“子超楼”西北角的原文官处饭厅(在已烧毁的饭厅基础上再建)等^[15]。通过这次全面维修,长江路292号院内的建筑,包括西花园内的整体布局,直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图九),仅在1948年4月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政府总统后,“国民政府”改作“总统府”,大院门楼上方原“国民政府”四字被换上时任监察院副院长周钟岳写的“总统府”三字。这三字因时间紧迫,均由木质锯成,表面贴以金箔^[16]。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4月23日,南京获得解放,人民政权极其重视对该地的保护,成立了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院内建筑得到及时修缮^[17]。1956年,省政府将这里的“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原址”公布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国务院将这里的“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十年过去了,除了新建部分服务性用房外,院内的建筑遗存依然完好无损,深受世人赞誉。

(作者为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筹] 副研究馆员)

[1]南京东南大学建筑系1999年夏测绘的数据。

[2]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全四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98年1月,第897页。

[3]戴逸:《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年)2,红旗出版社,1997年7月,第189页。

[4]同[3],第144页。朱偁:《南京的名胜古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1页。

[5][8]韩品峥:《天王府旧址历史沿革简介》,《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第158页、173~174页。



- [6]莫祥芝等纂:《上江两县志》卷十一,清同治十三年刻本,第8页。
- [7]江君谟等:《总统府史话》(江苏文史资料第49辑附录),《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6年10月,第28页。
- [9]上海《申报》,中华民国六年四月四日,第4版。
- [10]高丹予:《南京总统府的遗址沿革及其建筑遗存考》,《东南文化》1999年第5期,第93页。
- [11]《首都建设》,行政院新闻局印制,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第2页。
- [12][16]汤又新等:《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见闻数则》,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1982年,第49~50页。民国十九年(1930年)1月19日《中央日报》之《中央画刊》。
- [13]南京市档案局,全宗号:1001,目录号:3,案卷号:5833。
- [14]南京市档案局,全宗号:1001,目录号:3,案卷号:6269。
- [15]南京市档案局,全宗号:1003,目录号:8,案卷号:523、524、526、527、528。
- [17]苏南人民行政公署:《长江路292号伪总统府房屋目前修缮情况》,南京市房产管理局,南京市房产登记卷宗号:139200。



南京长江路292号大院建筑史况图



图例

	1746年		1908年前后		1926年		1935年		解放后
	1871年		1917年		1930年		1946年		现院界

注：图中大院内标示的各局为原总统府设置的机构

图一// 《南京长江路292号大院建筑史况图》



建築執照

南京市政府工務局

發給執照事茲據承造人 **周氏** 呈稱請建築業經本局查核尚無不合情事合行發給執照准予興工建築此照

建造地址 **市第一局 周府中街第 號門牌**

業主 **周氏** 住 **市第一局 周府中街第 號門牌**

承造人 **周氏** 住 **市第一局 周府中街第 號門牌**

工程摘要 **建築一樓**

應遵事項 **應於地庫及地下室等處，建築安全設施，其詳見圖樣。**

開工日期 **五月十四日**

開工地點 **市第一局 周府中街第 號門牌**

開工時間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開工地點 **市第一局 周府中街第 號門牌**

開工時間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中華民國 **二十五年** 月 **七** 日

局長 **周文**

右給承造人 **周文** 收執

图二// 南京市档案局：南京市政府工务局建筑执照，全宗号：1001，目录号：3，案卷号：5833。

建築工程說明

建築辦公處一座高六層完全用鋼骨水泥構造門窗鐵製長一百天寬六十尺內隔辦公室及一切設備佈置如附呈圖樣共二套每套計

房屋間數 **樓房 六層** 平房 **——**

建築面積 **深六十尺 寬一百尺** 面積

四面情形 **東 南 西**

建築費用 **106952.00** 元

期限 **250** 天

呈件

工程圖樣 二份	附	退縮標準圖
勘丈圖	發	排砌腳地知單
勘丈單	發	設立鋼構通知單
合同或限單 一份	圖	灌性混凝土通知單
施工細則 一份	件	其他
工程計算書及詳細圖 一份		

查勘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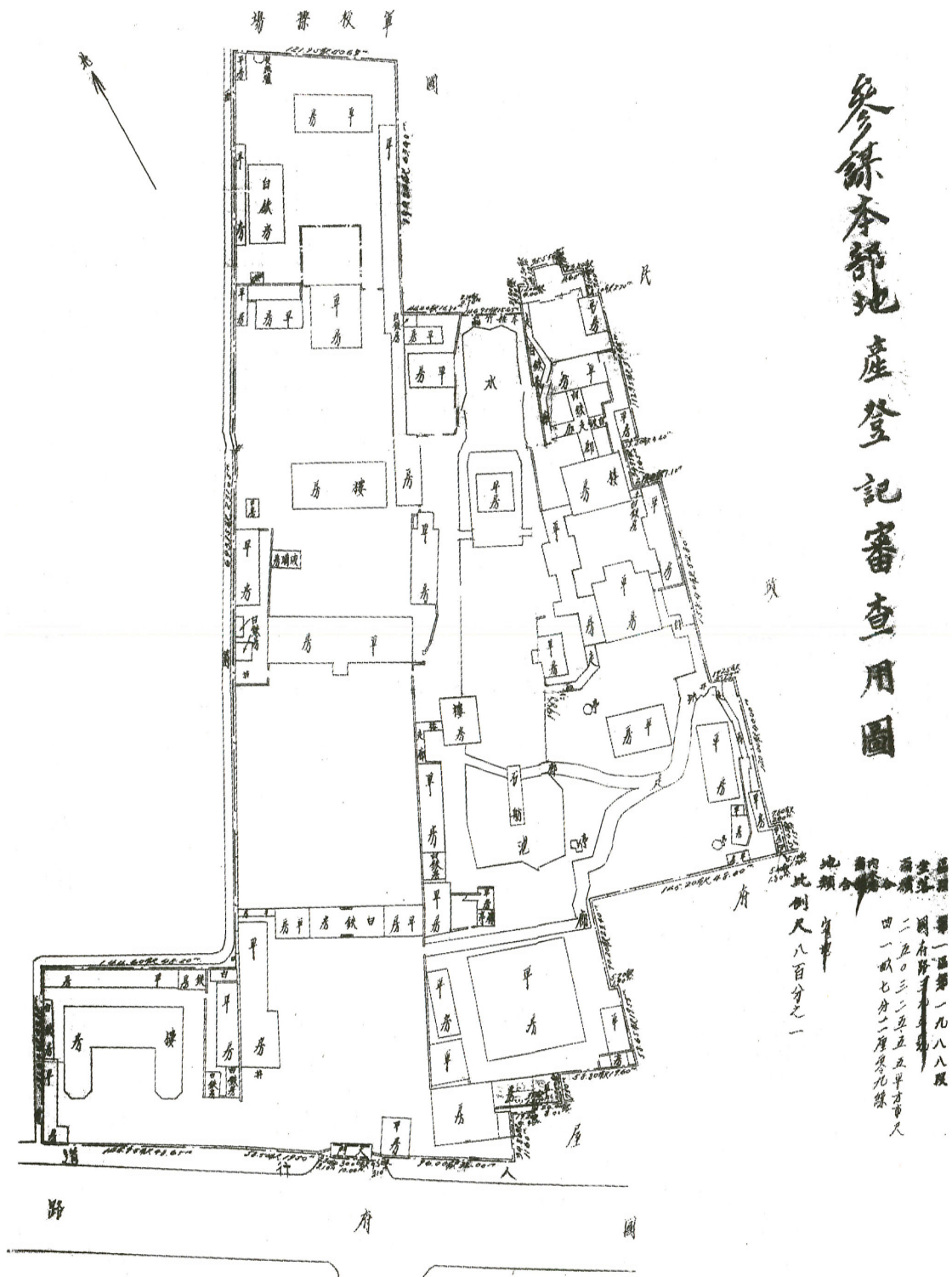
擬建樓房 **一層**

中華民國 **二十五年** 月 **七** 日 役勤人 **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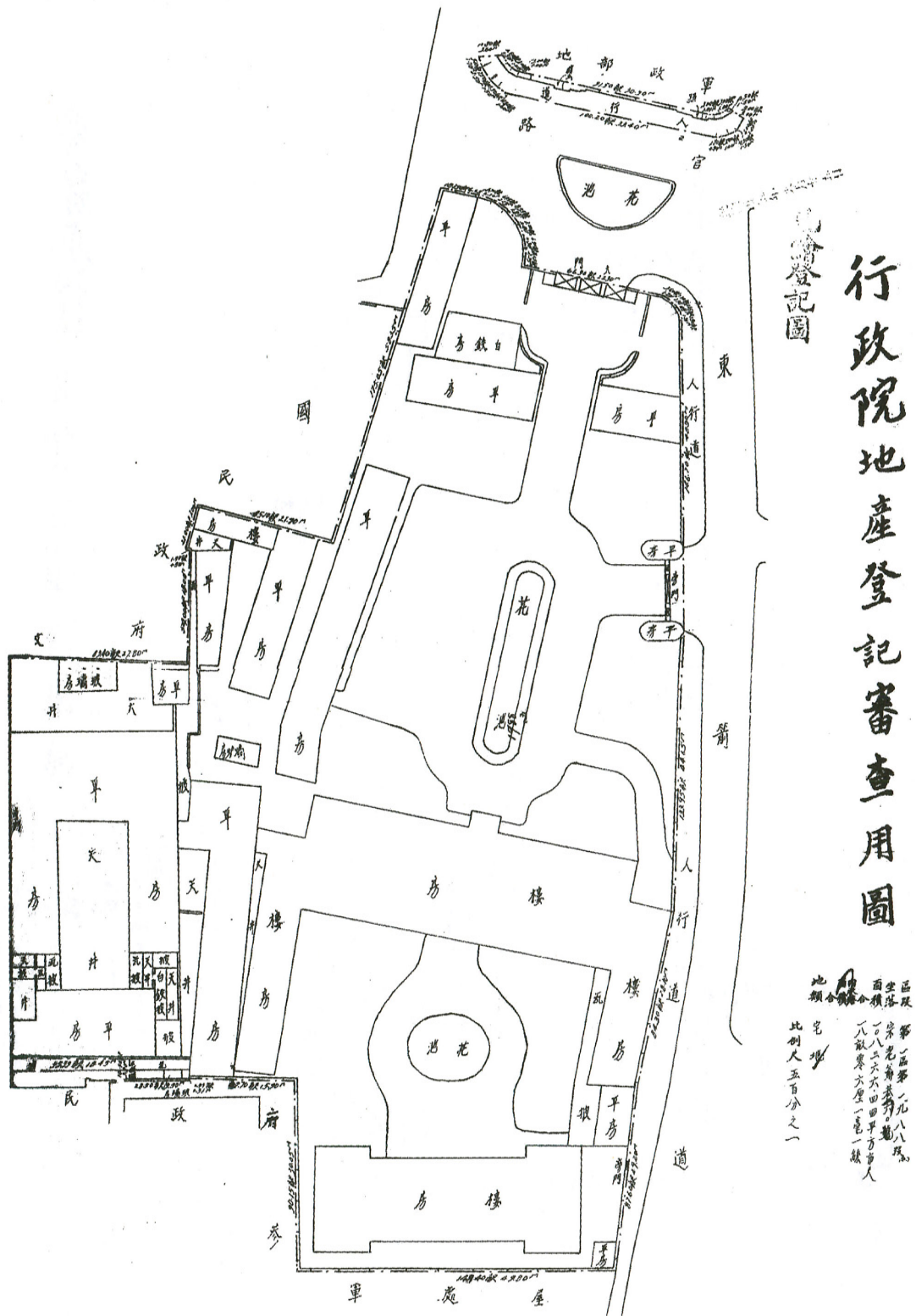
覆勘報告

中華民國 **二十五年** 月 **27** 日 覆勘人 **李**

图三// 南京市档案局：南京市政府工务局复勘报告，全宗号：1001，目录号：3，案卷号：5833。



图四// 南京市房产管理局：《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地產登記審查用圖》，南京市地政局登記卷，一區段 1/19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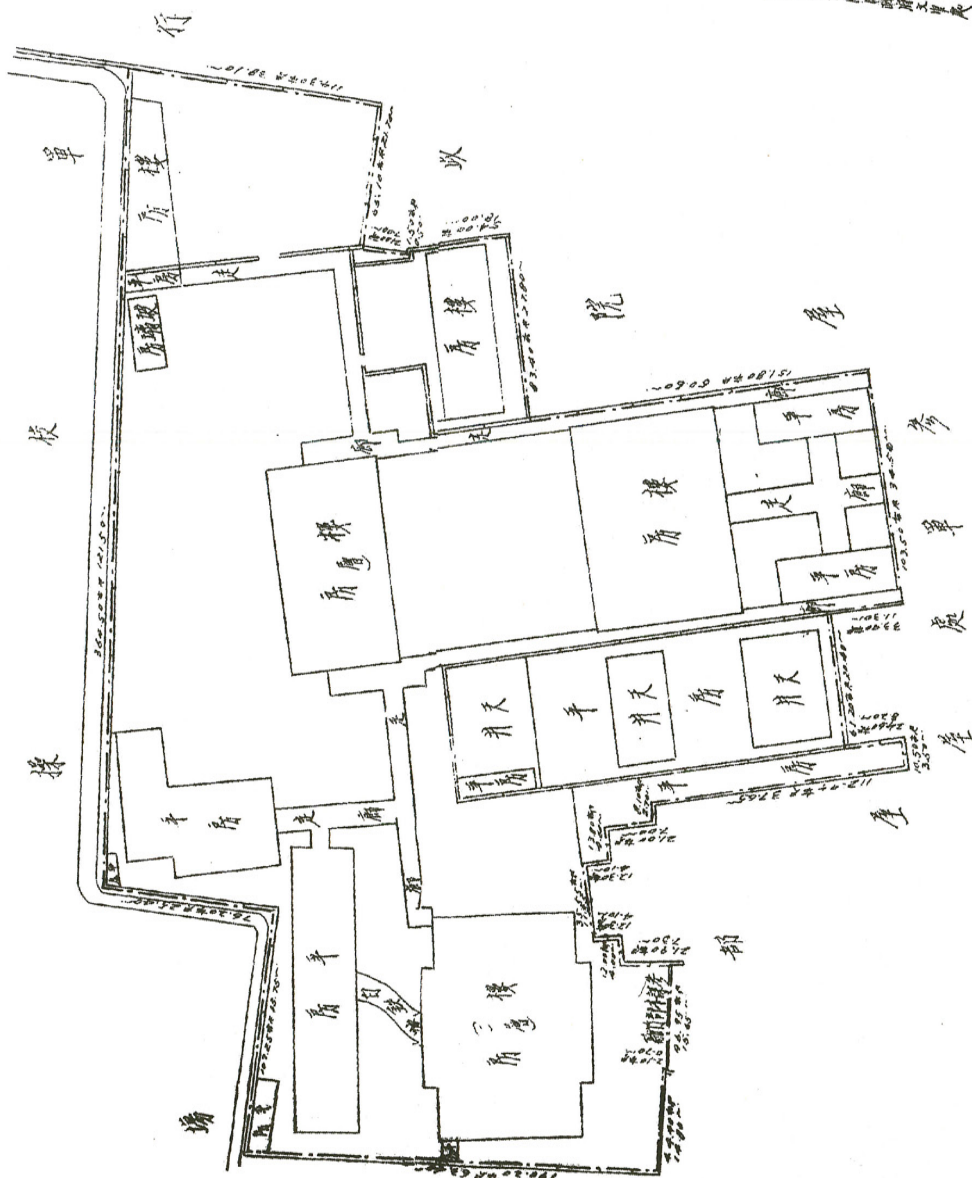
图五// 南京市房产管理局：《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地產登記審查用圖》，南京市地政局登記卷，一區段 1/1988-5。



國民政府文官處地產登記審查用圖

第一區第九八八段(四)
國府舊址
一、二、二、二、二〇平方米
十人散六分人學古基正

比例尺八百分之一
信譽新圖其詳見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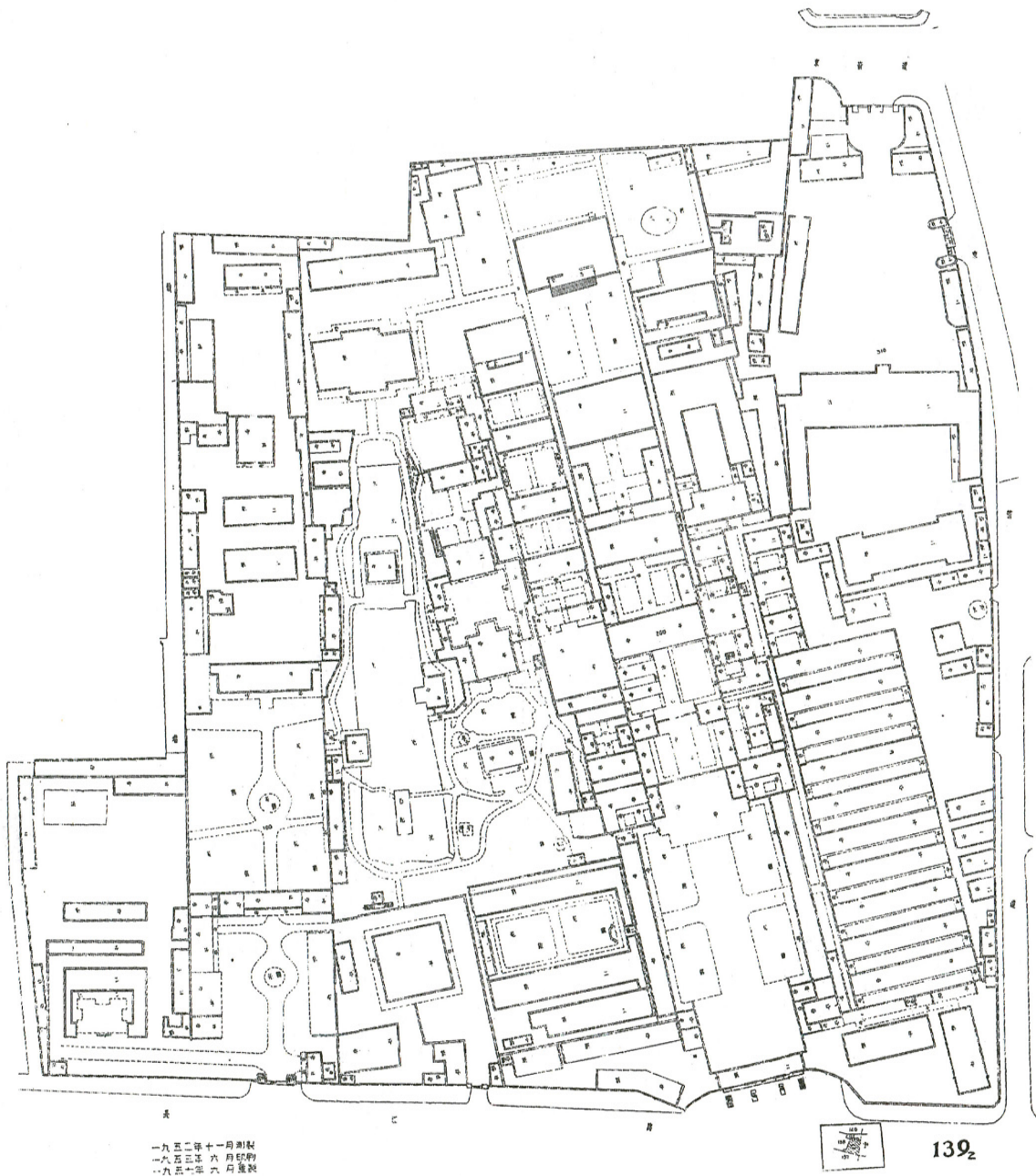
图六、南京市房产管理局：《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地產登記審查用圖》，南京市地政局登記卷，一區段1/1988-4。



國民政府地形圖



图八〇〇 南京市档案局：《国民政府地形图》（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南京市工务局虞锦福测绘），全宗号：1003，目录号：8，案卷号：523。



图九// 南京市规划局藏:1952年11月测制的大院地形图。



天朝宫殿及天朝朝仪

——（摘录《贼情汇纂》）

[清]张德坚 撰

伪宫室

逆首洪秀全、杨秀清等，皆得梧山僻凶徒贱隶，所居无非革门圭窠，所著则短褐草屨，日坐卧于蛮烟瘴雨之中，鸟睹大厦广居之盛。叛逆以来，屡为我兵所窘，穷蹙奔窜，数濒于死。每诡秘深藏，甚至一夜之中三移其居。即如秀全所居之区，谓之天朝，亦属虚设，其实不知避匿何处。虽被掳经年之人，亦不能指实逆首所在，盖初未尝占据城池，惧我兵袭而擒之也。迨陷武昌省城后，始盛饰伪宫，僭越非分。及踞江宁，见宫室之富，器用之美，益侈然自得。癸丑四月，伪天王洪秀全改两江总督署为伪天朝宫殿，毁行宫及寺观，取其砖石木植，自督署直至西华门一带，所坏官廨民居，不可胜记，以广基址，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以金陵文弱之人，逼令挑砖运土，稍不遂意，则鞭捶立下，妇孺惨遭凌虐，亘古罕闻，茹苦含冤，天地惨变，是以工甫成，即毁于火。詎虺蝎之心，冥顽不灵，四年正月复兴土木，于原址重建伪宫，曰宫禁。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惟外面纯用黄色涂饰，向南开门，曰天朝门，门扇以黄缎裱糊，绘双龙双凤，金沅兽环，五色缤纷，侈丽无匹。其宫殿堂庑，下及厢榭庖湑，无不如是。且以黄绸十余丈挂诸门外，硃笔大书，字径五尺，其文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贼中呼刀曰云中



雪,忽作歇后隐语,言外必杀也。门之两傍设东西朝房二所,内外各三层,亦皆宽敞高广。门外用红黄绸绉札成彩棚,风雨任其淋漓,月余即更换一次。门前丈余开河一道,宽深二丈,谓之御沟,上横三桥以通往来。过桥一里,砌大照壁,高数丈,宽十余丈,照壁适中搭造高台,名曰天台,为洪逆十二月初十日生日登台谢天之所。台傍数丈,外建木牌楼二,左书“天子万年”,右书“太平一统”。牌楼外有下马牌,东西各一。此洪逆伪宫之大概也。伪东王杨秀清至江宁,初据藩署,因有金甲神到处呵叱,不获安居。三日后移至内城将军署,又以逼近东门,惧城外炮子飞入,复移至旱西门黄泥岗,改前山东盐运使何其兴住宅为伪府,尽毁附近民居、闾阖,开拓地基。以窃夺之物料,威胁之人力,何所顾惜,穷极工巧,骋心悦目,以耀同俦。百姓震惊,以为尊严无比,虽逊于洪逆伪宫,然已迴环数里,垣高数仞矣。更以碎磁锋密布墙顶,拥以油灰,防人攀越以谋己。大门亦糊黄缎,并用铜环,彩画则止一龙一凤,彩棚仍以红黄绸绉为之。东西设伪官厅各一,东曰承宣厅,西曰参护厅,并有东殿尚书挂号所。此杨逆伪府之规模也。其伪西王萧朝贵、伪南王冯云山,久经殄灭,今仍列其伪衔,逆属亦有伪府,奢侈暴殄,大略相同。伪北王韦昌辉初至江宁,据富室李姓家,嗣移中正街前湖北巡抚伍长华新宅。伪翼王石达开先据故明张侯第,嗣据上江考棚。伪燕王秦日纲据中正街升平桥前湖北宜昌府程家督宅。除洪逆外,所居皆谓之伪府。伪西王府门画一龙一凤,与东王同。他如南、北、翼及燕、豫五伪王,则画一龙一虎。国伯、国宗及各伪侯亦画龙虎,而所据之第则又谓之衙。丞相画象,检点、指挥至总制俱画鹿,监军下至两司马则画豹,但监军、军帅画豹踏云,师帅至两司马虽亦画豹,则踏山岗。丞相至军帅,公堂画龙,师帅至两司马公堂一概画虎。其伪侯、丞相以下分据文武衙署并缙绅富室房屋殆尽,无不张旗鼓,粘贴伪衔,互相夸胜。而穷奢极欲,惟洪杨两逆首为最,余皆不逮矣。改妙相庵为伪天朝花园,改惜阴书舍为伪东王别业,独古林庵、随园,杨秀清周览以为朽坏,弃之不用。凡宫殿服饰等差,必由杨贼奏取伪旨,方兴工制造。初贼陷雄郡、省会,必以官廨巨第据为伪



府，如洪逆所居则用立匾黄纸硃字大书曰天朝门，杨贼曰东王府，丞相以下别用黄纸封条曰天官正丞相某姓馆，下至两司马皆然。伪王府必用黄纸糊门，上画龙凤，帷幔桌围皆用黄绸绣龙凤，后至江宁则以黄缎糊门。盖地方瘠苦，购买不出，虽帏幔亦用黄纸。总之，贼暴殄天物，有则尽用，无亦迁就，为绸为纸不同，然尚用黄色则一也。若伪王侯对联皆黄绫或黄纸硃书，伪检点以下则黄纸黑字，语皆狂悖，其对句另详贼文书条内。

注：逆首至袭而擒也一节，李家、方靖说，吉纶隆供。江宁情形程奉璜说，与众说互证，悉同。

伪朝仪

逆贼无参拜揖让之仪，凡打躬叩首皆呼为妖礼。虽贼礼拜敬天父，群下朝洪逆，亦止长跪，其余伪官互见平行，并无礼节。官降一等，卑者跪白事，尊者坐受之，跪后仍杂坐谐谑。尊者自外人，卑者但起立、让坐、奉茶而已。贼知粗鄙人绳以礼法，则手足无措，故简略之，使其易知易从耳。初至江宁，杨逆日朝洪逆所，近则洪杨诸贼深居不出，妄拟垂拱而治，必有大喜庆事，方设朝会。如杨逆有事要见，亦必请伪旨批定日时，大抵午未时居多。届时杨逆率各伪官毕集，舆马填塞街市，伪天朝门洞开，大门外立伪引赞官，传呼各官进，惟杨、韦、石、秦各剧贼得进见，虽宠任如伪佐天侯，亦不得望见颜色。伪侯以次俱排列于大门内，引赞官呼跪，则皆跪，左右史跪于阶下，侍臣递茶，伪通赞官呼曰：“天王有旨，诏众官员珠贯而入，各肃班联，趋跽起跪，不得嚣喧，三呼万岁，听旨传宣，朝觐已毕，站立两边”，读讫，则众伪官如仪起立。少顷，杨贼白事毕，出，则转身向内而立，各伪官皆跪其后，又呼万岁者三，然后掩门而散。他如生子弥月等喜事，杨逆具奏请朝觐，洪逆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见”也。寻常礼拜日，群下惟具本请安而已。杨、韦、石各伪王亦自有受贺之仪，杨逆则自韦、石以下皆朝之，余伪王惟本府属官朝之，然亦不常见。一切军务皆由杨逆主裁，仅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与之计议。凡有令则交佐天侯传至检点林锡保、胡海



隆处,各伪官日至检点衙听令,虽佐天侯等有时燕见,一月之间亦不过二三次。其一切文书多不能面白,故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贼多市井无赖,识字不多,厌见文字,悉任掌书裁处。于是则多设簿书掌书诸伪官,而被胁充先生者,似可渐操其柄也。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往之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则徒立科条,军务则全凭文告,气脉不通,已成麻痺不仁之象,贼之灭亡,可烛照而数计矣。

注:程奉璜说,与王福兴宣必昌所说俱同。

(作者于咸丰三年(1853年)任湖北抚辕巡捕官,后受曾国藩赏识,调武昌主持采编所。作者根据所获太平天国文籍,有关探报以及从太平天国辖区逃出的难民口述,咸丰五年辑成是书,其后还有增补。)



天王宫

[英]富礼赐(Forrest) 著 简又文 译

现在我们又转而参观天王洪秀全之天宫。我们虽不能进去,但从外面也可看见许多东西。天宫甚广,围以黄墙,墙高四十尺,甚厚。墙内可见黄色绿色的屋瓦,又有两座很美的亭子。宫室内部,皆为黄墙所遮蔽,不能满足游客好奇之心。天宫工程只完其一半,全宫面积将倍于现在,但现在那里做工的兵只得寥寥十余人,究未知何时全部方竣工也。近王宫处有一破棚,内有一双怪船,其形似龙,头甚大,船身已半朽了,但昔时油漆铺金,想必极为辉煌。此即天王由汉阳溯江而下直至攻克南京时所乘之圣龙船也。从前船藏宫内,今则搬在外面,没有人理它。

在宫之前门,有一黄色大照壁,长约三百码,上涂丑怪不堪之龙多条。壁上张挂天王之奇怪的诏旨。看哪!那不是吗?黄缎丹书,字画甚不雅观,皆天王亲手所书的文诰。天王最喜欢做这些文章,孳孳矻矻,执笔不倦。文内辞意,非常褻渎,为吾人闻所未闻者(意指其宗教思想奇异,在基督教之立场观之,殊为褻渎神圣也。)我会见此照壁之半尽张挂黄缎,心里因自想此缎究从何而来者。壁之对过,有一高而大之奇门,以大柱制成,宏伟可观,虽未完工而金色丹色,亦殊雅观,门顶则木工雕刻一如广州之大衙门样子。由此大门而入外门,乃到天宫之正门,门前有有上盖的廊子,两旁均金柱。廊之上盖雕刻各种龙形,有吞日者,有追妖者。正门上有一匾额,金漆色辉煌夺门,上书“真神圣天门”,两旁列大鼓二,门内各室,都挂纱灯,各以丝制,灯绳灯穗,均甚美观,当中之灯特大,制以玻璃,盖来自苏州何桂清抚台之衙门者。



圣天门之右有小屋，内有桌椅，驻有天军，随意坐卧于此。外国人来了，也不惹他们的注意。有一年老司閤人来见我们。彼云年已甚高，当天王尚在襁褓中为贫儿时，彼即看顾他者。彼请我们坐下喝茶，礼貌甚恭，我们再不能进去，只好坐下休息。于此我们看见一幅“太平天国万岁全图”。这真是一张极奇异可笑的图籍。中有一大方地，四围是洋海，地即中国；中又有四方地，围有四墙，是为天京。香港没有存在；日本只是一小点；北京也没有存在。在西北方有两小岛名为英吉利及法兰西。其他欧洲诸国大概都为“天条”所屈服了，而全个亚细亚洲——中国除外——大概已被龙吞去了。此宫虽满目是金色朱色纱灯、旗帜，而各物皆极污秽。各涂金之处渐为手印、尘土及雨水所磨蚀而去，已现棕色。屋顶及墙上之图形及颜色亦非常污脏，地上则垢物与唾沫交杂，臭秽不堪。守卫之天军，衣服蓝缕破烂，蓬头垢面，身体污秽。虽在天王神威咫尺，而凄凉颓败之景状即在门内，令人兴起居于一个人类坠落及欺骗的大系统中之感觉。

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是天王进膳了，直至膳毕各声始停。圣门半开，好些衰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他用品以待候御膳用。各种品物大都是金制的。我们虽不能身进宫内，但从宫外诸人所述也可略知其宫内之光荣。天王今年五十一岁，身材高大，体格壮健。他永不死的，但待厌倦尘世之时，将有龙车自天下降，彼将乘之上升。他已升天见过上帝好几次了。根据他的诏告，这种升天的权利现已传给其妻——但不知一百零八妻中究是那一位，大约是幼主之生母吧。宫内只许女子居住，闻宫内共有女子千名。哼！她们说起话来怎么厉害呢！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颈练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钮。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走。临朝时，彼之子——幼主——常亦同在，幼主实一病瘦少年也。天王十分勤工，常自作文告诏书，披读及批答各王奏折，对于国事亦很细心。

我不是传教士，对于天王只可下一句素人的很有根据的评语，即是：



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简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关于基督教的真理,他已被许多人忠告、函告、解释、宣讲,形形色式,不啻苦心婆心,然而他比前更为顽梗。许多传教士小心翼翼地已传给他不少的“正道”,但一概充耳不闻。小小的赞美歌或祈祷文静静地给他,他却囫圇吞下。已有许多本圣经送给他了,虽然我信他也读经,但没有甚么益处。古代教会长老及会议之议论也有寄给他看的,但先入之成见甚深。一见有传教士即以古代圣徒西里儿、奥古士丁等之言来驳斥。他的辩辞是顶混惑而诡奇的。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第一日他退让一点,但未几又说传教士错了。他从新翻译圣经,我们的圣经注解,都难得他的赞同。我们最好的经本,都被他用硃笔在旁批上“天意”,全弄坏了。如果他辩才有碍,无言可答之时,他便说他曾上过天而您则否,于是即使您语塞而退了。他又常发一种“神学病”(即天父降身),藉以告谕人民种种奇异的事情。那一天,他令各王多纳姬妾以庆祝他的寿辰。他说:“亚当最初只娶一妻是很对的,但我现在知识更多,故叫您们各娶十妇”。在起初的文诰中,他自居于与圣子耶稣平等地位,但最近则以圣父、圣子、他自己及幼主一律平等了。他已取消了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圣神。(他原本是把圣神寄托在那杀人不眨眼的东王身上的,但失败了。)此实以异端邪教掺杂于基督教之内。及其醒过来,则又以黄缎丹书与基督教士通讯,或附赠丝绸一匹。好了,无论怎样好的朋友,终须一别,现在我们与他告别,望他日可得亲见他一面。我们由侧门而出,此门上写着是“万国来朝”的。在左边,有矮屋数间,系“朝房”,各大臣陛见之先皆于此更换朝服者。有一块重要的黄缎诏谕挂在那里,但却被作为抹灯之用。屋子铺陈夺目,但污秽不堪,有如垃圾堆一般。

(摘自《天京游记》,作者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



江浙联军血洒金陵

徐家阜 郁琰

腥风血雨石头城张勋掌权

南京光复前夕,暗云愁雾,全城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老部下——清江南提督张勋接到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命令,带领清兵2万,共20多个“江防营”,急行军赶到南京。张人骏是个70多岁的老人,老朽颓弱,昏庸无能,自从武昌起义后,他被革命声势吓得胆战心惊,日夜不安,于是急忙忙把张勋调来,把南京的守城大权,拱手交给张勋掌管,自己唯张勋之命是听,反倒成了个傀儡。

张勋,别号少轩,江西省奉新县人。他早年从军,至死都拖着一条辫子,人称“辫帅”,他为人心狠手辣,凶恶残暴。他一到南京,立刻向张人骏提出,要恶狠狠地镇压南方革命党人,翦除当时驻扎南京城区的清新军第九镇(镇相当于师)。

新军第九镇,是清末第一次实行征兵制入伍的部队。其中有许多有志报国的青年志士,革命党人赵声、柏文蔚等曾在第九镇开展过活动。

张勋视新军第九镇为心腹之患,一再撺掇张人骏把第九镇调往南京聚宝门外60华里的秣陵关,赶出南京城。

第九镇一走,张勋立即在南京全城搜捕革命党人,任意杀戮居民。在他盘踞南京的一个多月中,屠杀居民三四千人,各处城门时常高悬人头示众。兵士更借口搜查革命党人。四出抢掠百姓财物,到处杀人放火。南京居民怨声载道,渴望革命军早日到来。



箭在弦上徐绍桢决心革命

“钟山如龙城如虎，江水滔滔西北相环绕。绿荫夹道杏满城，锦绣江山何处能相较。吾侪何以报国家，愿将赤血染上青青草。”

新军第九镇被迫从南京城区调往秣陵关，一路上军歌不断。这首《赤血歌》就是革命党人赵声特地为第九镇编的。第九镇统制（相当于今师长）徐绍桢策马在前，耳听歌声，引起满腹心事，他想到锦绣江山受到列强侵略，蒙受耻辱，自己受到张勋之流的排挤、压制，身居一镇之长，何以报国？何以慰民？……心里象火烧一般，灼热难受。

第九镇是清朝末年仿照日本陆军模式编练的新式军队，所以当时被称作“新军”。而张勋统率的“江防营”等部队，都是按老的模式编练的，故称“旧军”。平时新军瞧不起旧军，旧军妒忌新军，双方隔阂，如同冰炭。

这时，消息传来，两江总督张人骏给张勋的部队补充了大量弹药，每人发500发子弹。给第九镇，也算补充弹药，每人却只发3发子弹，张人骏又在张勋的挑唆下，收缴了第九镇的大炮、重机枪。

第九镇到达秣陵关驻地后，接连捉到10多名密探，他们化装成乞丐、小贩，被捕后都供认是张勋派来的，还供出张勋派便衣侦探三四十人，到秣陵关监视九镇。这时，又发生张勋的亲信、安置在第九镇的宪兵营管带（相当于今营长）旗人桂城，半夜持抢闯入徐绍桢营房，企图暗杀徐绍桢的事件，桂城被当场捕获。

“张勋要搞什么鬼?!”第九镇官兵十分愤慨，他们关注着徐绍桢的态度。

1911年11月3日，上海的革命党人起义，上海光复了，革命军一鼓作气，乘胜占领吴淞口。这一讯息传到南京秣陵关，第九镇全军官兵兴高采烈，革命气氛高涨。

这一天，徐绍桢约了江苏省布政使樊增祥、清末状元南通张謇来到两江总督衙门，面见张人骏，劝说张人骏响应起义。但张人骏却支支吾吾，顾



虑重重,久久拿不定主意。

徐绍桢等3人,见张人骏如此犹豫不决,遂即告别。路上,徐绍桢向樊增祥、张謇俩人道: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张人骏如此不明事理,只能由他去充当‘沉舟’、‘病树’。当今形势,民心所向,军心所归,革命犹似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勾心斗角鸿门宴鹿死谁手

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字固卿,是明代开国功臣徐达的14世孙,中过举,又精通军事。前年,清廷派他去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训练新军,是新军中一位主要人物。他对清廷的腐败十分不满,平素同情革命,曾多次出面庇护第九镇部属的革命活动。前任两江总督端方,指名要逮捕正在第九镇的赵声、柏文蔚等革命党人,都经徐绍桢营救,方得平安无事。

这一天,徐绍桢劝说张人骏起义未成,辞别樊增祥、张謇,急匆匆赶回玄武湖后湖住宅,立刻找了第九镇参谋官龚之麟,来到后园五角亭中。五角亭,紧紧依靠在玄武湖后湖,湖边一排石栏杆,依湖而筑,弯弯曲曲,延展开去。亭子周围堆叠着玲珑起伏的太湖石假山,象一座座石屏风,遮住了远处景物。

徐绍桢和龚之麟一阵相商后,站在太湖石假山旁久久沉思,终于毅然作出了决定,吩咐龚之麟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事不宜迟,你把请柬就给送去。”

在江南提督张大帅住所,张勋斜靠在杨妃榻上。他的宠妾三姨太卞小毛子在一旁伺候。这时,来了卞小毛子的堂兄“江防营”参谋官、张勋幕僚卞礼卿。

一进门,卞礼卿递给张勋一张大红请柬,说:“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请大帅赴宴。”

张勋看过请柬,向卞礼卿道:



“徐绍桢请咱明晚去他公馆五角亭赴宴，说是他那位李碧玉夫人40大寿。礼卿，你准备一副厚礼，李碧玉在南京城是个有名的女才子，不要被她取笑了。”

卞礼卿却缓慢地、胸有成竹地回答：

“大帅，这徐绍桢平素和咱们很少应酬，而今又是兵慌马乱，大帅，防人之心不可无呀！”

张勋大不以为然，说道：

“礼卿，你真是少见多怪了。我戎马半生，南征北战，大风大浪经得多了。他徐绍桢一个白面书生，即使摆下鸿门宴，刀山剑林又何所惧！”

“那是当然，”卞礼卿称道，“徐绍桢怎比得了您大帅。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大帅，还是多加提防为好。”

听到这里，张勋哈哈大笑，指着卞礼卿的脑袋说：“兵不厌诈！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徐绍桢要摆鸿门宴，来得好，让他摆，我们将计就计，就给他来个‘宴鸿门’”。

接着两人一番密谋，张勋吩咐卞礼卿，挑选200精兵，到时在后湖一带埋伏，并要卞礼卿带一班快枪手随同赴宴。

剑拔弩张徐统制纵虎归山

卞礼卿指挥的江防营兵丁，暗暗埋伏在玄武湖后湖一带。

当晚，徐绍桢在五角亭宴请张勋，他希望张能顺应形势，赞同起义。席上，布政使樊增祥、南通状元公张謇在座。

卞礼卿由第九镇参谋官龚之麟接待，在五角亭相近的一间小楼上坐席，两人各自严密戒备。卞礼卿随带的20名亲兵，在小楼外间由第九镇官兵招待酒会。

席间，酒过三巡，徐绍桢将话语逐渐引入正题，他带着三分酒意向张勋道：“轩公，你我都担负着国家安危重任，而今老百姓苦难重重，民不聊生，满清王朝，丧权辱国，朝廷上那些王公高官……”



徐绍桢话还没讲完,张勋已经怒气冲冲,指着徐绍桢说:“徐绍桢,你胡言乱语,悖逆犯上!”

徐绍桢还是希望张勋能审时度势,转变态度,继续道:“武昌一声炮响,革命义旗一举,各地响应。轩公,可见民心所在,中国实非革命不可。”

张勋一阵狂怒,拍案而起,吼道:“你,不必多言,造反,杀无赦!”

这时,卞礼卿猛地从席上站起来,手一挥,作出了一个暗号,20名亲兵刹时间都跟着站了起来。在席上静以待变的第九镇参谋官龚之麟紧跟着推开桌子,一步抢先,站在卞礼卿面前。立刻,在假山后边,100多名九镇官兵,手持盒子枪,像神兵天降一般,黑沉沉一片,形成了对五角亭的包围。

五角亭内,张勋正指着徐绍桢高声吼:“谁要造反,我打他几个窟窿。”

说着,张勋高举酒杯,正准备摔杯子,发出他“宴鸿门”的暗号。这时,卞礼卿看到自己人被包围了,急忙上前,一手拉着张勋,一手拉住徐绍桢道:

“轩公,固老,你两位酒喝多了,喝多了!”卞礼卿一边暗示张勋快撤;一边假作调停;“固老,改日再叙,改日再叙……”

张勋在卞礼卿和20名亲兵蜂拥下,悻悻而去。

徐绍桢高声向张勋道:

“明辨事理,洞察形势,方算是英雄本色。张少轩,你要三思。”

龚之麟见张勋等人远去,眼看坐失良机,不禁大为惋惜,问徐绍桢:

“固老,您怎么放虎归山?”

徐绍桢双眼深沉地凝视着张勋去处,缓缓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张少轩他日后也会明白的。”

徐绍桢送走樊增祥和张謇,连夜和龚之麟赶回秣陵关,第二天,1911年11月7日,徐绍桢召集全镇官兵,庄严宣告起义,部署攻打雨花台。

起义军喋血捐躯雨花台

雨花台在南京聚宝门外,地势险要,张勋在这里安下了两座炮台,并派官兵把守,严加守备。



这时,南京城内的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苏良斌来到秣陵关和徐绍桢联系,说已联络了总督府的警卫和巡防队的几支清兵在城内起义迎接革命军。徐绍桢、苏良斌两人约定11月8日清晨,城内城外同时起义,内外袭击张勋守军。

在此之前,徐绍桢和上海革命军已取得联系,上海军政府都督陈英士已同意赶运军火前来接应,首批弹药已发运镇江。

11月8日清晨,徐绍桢发布进攻雨花台的命令。起义军在雨花台、水西门一线和清军展开激战。清军雨花台炮台,急忙发炮猛轰,由于惊慌失措,一阵乱放都未中的。

战斗一打响,起义军士气旺盛,迅速推进,很快接近敌军阵地前沿,但就在这紧要关头,战局发生了变化。在激战中,起义战士每人的三五发子弹,很快消耗掉了,在敌军密集的炮火下,已无法应战,只得埋伏在小高地、田埂等处,成了挨打的局面。

突然,一声怒吼,震天动地,起义军先锋队唐有德挥舞战刀,指挥战士准备肉搏。他刚跃出两三步,就被敌军机枪扫中。队长张国俊、潘绶丞在激战中则先后受重伤,战士伤亡惨重。城内起义活动因泄密,全被张勋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上海军政府接应的弹药,运到镇江后,中途受阻,未能及时运到前线。

前线起义将士,弹尽援绝,身陷绝境。后来虽然由于敢死队的英勇战斗,起义军曾一度占领雨花台,但终因缺少弹药,伤亡惨重,第二天清晨,张勋守军发起反扑,起义军乘浓雾撤出雨花台。这一仗,徐绍桢投入两个团的兵力,伤亡近千人,敌军伤亡亦多。强攻雨花台未能成功。

重振军威徐绍桢披挂上阵

徐绍桢秣陵关起义,统率第九镇攻打雨花台失利,退集镇江休整。徐绍桢本人星夜赶到上海,受到上海革命军都督陈英士和江浙各地革命军



的推举,组织革命军江浙联军,徐绍桢就任江浙联军总司令,指挥联军进攻南京。于右任为联军顾问。

江浙联军兵力号称4万,实不足2万人。主力有镇军(镇江革命军)、苏军(江苏革命军)、浙军(浙江革命军)和来自上海的沪军,上海吴淞口的淞军以及上海学生军、上海女子敢死队等,江浙联军司令部设在镇江。

这时,停泊在镇江、高资一线防守长江的清海军将佐宋文翔、吴振南等,率领14艘舰艇起义,来到联军总司令部。徐绍桢当即指派各舰,仍在镇江巡逻,协同革命军作战。

清军守卫南京的防卫部队,总共2万余人,由张勋统率指挥,其中主力是张勋的“江防营”6000人和在清军中素有大胆将军之称的“记名提督”王有宏部6000人,以及从徐州调来的徐州镇一个师的兵力和两江总督衙门卫队等。

这时革命军政府发出了《进攻南京檄》,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军的斗志。11月16日,在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召集各军将领议事时,传来上海西人报纸登载的外国人对革命军进攻南京可能进行干涉的消息,于是决定革命军迅速行动。11月20日,徐绍桢总司令发布攻击令,命令江浙联军全线出击。

战云密布,战鼓声催,一场辛亥革命史上最激烈的攻坚战,即将在古金陵展开。

大炮无栓乌龙山智取报捷

南京的地势较为险要,历来有“虎踞龙盘”之称,城内城外山冈起伏,炮台林立,易守难攻,五大要塞更为凶险。此刻,张勋在这五大要塞:乌龙山、幕府山、狮子山、雨花台、天堡城,布置重兵守备,以抵御革命军。

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在军事会议上,指着军事地图一一向各军将校介绍说:“南京的险要,就在于这五大要塞,我军不先占领这五大要塞,就无法攻城。他又说:五处要塞,周围60里,而今张勋已经把这5处,布成



一个相连的战区,其中乌龙山、幕府山是这个战区的门户;在乌龙山炮台,有20多门重炮,杀伤力很大,因此乌龙山炮台必须智取,正面强攻,我军将蒙受重大损失。”淞军黎天才请战,攻打乌龙山。黎天才在光复上海时,从黄浦江一直攻打到吴淞口,把清军赶下了大海,取得吴淞大捷。现在这支革命军被称为“淞军”。

在徐绍桢发布进攻令前,总司令部曾来一位特殊的客人,此人姓官,名成鯤,清军陆军学校炮科毕业,不久前是清军南京总炮台的指挥官。此番官成鯤来到联军总司令部,要求面见徐总司令。徐绍桢接见后,两人秘密商谈了很长时间,官成鯤才欣喜地告别。

夜色苍茫,寒风凄厉,战前一片寂静,黎天才率领淞军、浙军共1000余人到达乌龙山麓,在夜色掩护下进攻清军阵地,乌龙山炮台守军,从睡梦中惊醒,急忙上阵,他们迅速卸下了炮衣,很快装进炮弹,准备发炮轰击。这时,意想不到的怪事出现了:清军突然发觉所有的大炮的炮栓,全部不知去向,大炮无法发射。正当清军目瞪口呆、惊惶失措之际,炮台内一部分官兵已树起了起义的旗帜,革命军未伤一兵一卒,占领了乌龙山。

乌龙山失守,张勋暴跳如雷,为扭转战局,连夜调拨援军,十万火急地向幕府山增援。这时,徐绍桢命黎天才扩大战果,连续作战,奔袭幕府山。黎天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在敌军密集炮火下,激战6小时,守敌不支,全线溃退。拂晓,革命军占领幕府山要塞。当张勋的援军接近幕府山时,得知幕府山已失守,只好狼狈后撤。

革命军占领幕府山炮台后,随即炮轰狮子山,只发射了几炮,就见狮子山清军在炮台上挥动讯号旗,要求停止炮击,表示愿意归顺。这一仗,革命军连下乌龙山、幕府山、狮子山三大要塞,夺得要塞大炮16门,弹药无数。

乌龙山的快速占领,奠定了胜局。清军乌龙山炮台,炮栓的神秘失踪,更是全局的转机所在,影响重大。原来那一天官成鯤面见徐绍桢,接受徐绍桢总司令密令,说明乌龙山部分官兵转向革命,临战前,把炮栓全部卸



下,立了大功。事后,徐绍桢任命官成鯤为江浙联军炮兵司令。

将军大胆王有宏轻敌丧命

清军昼夜之间,连失乌龙、幕府、狮子山三处要塞。张勋急忙调动重炮,加强天堡城、雨花台和南京城太平门一线火力,并派遣“江防营”提督王有宏带领重兵守备。

11月26日,革命军全线进攻。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率领顾问于右任、参谋龚之麟亲赴太平门前线指挥。此时,突然传来紧急情况,据报:有敌军两股,每股二三百人,正向联军总司令部方向前进,意图偷袭总司令部。徐绍桢得讯,立即转回总司令部。

这时,联军总司令部的直属部队,都已派往前线参战,只留下警备队队长杨炎昌、副队长周应时率士兵百余人,情况十分危急,徐绍桢即命杨炎昌把100多名士兵,组成两个加强排,两位警备队长各自带领一个加强排,分向总司令部左右两翼展开,带枪的持枪兵和空手的徒手兵,一个个相间埋伏,各自保持一段间距,这样延伸阵地,待到敌军接近时,前后左右流动发枪射击,作为疑兵。片刻之间,两股清军来到,见到革命军前后左右枪声此起彼落,四面呼应,猜疑有大军埋伏,畏缩不前,最后,一窝蜂地慌乱后撤,全部逃窜回城。

11月27日,江浙联军总司令亲自率领浙军、淞军攻打太平门。

太平门清军守将王有宏,号称“大胆将军”。他因镇压义和团有功,受到清廷特赏黄马褂。此人精通武术,平时挥舞一柄大刀,有“万夫不挡之勇”,是张勋部下的一员猛将。王有宏一向看不起新军和徐绍桢,认为秀才谈兵,中听不中用。今日要和徐绍桢交战他更加夸下海口说:“若敢来犯,管叫徐绍桢命丧疆场,片甲不留。”

27日凌晨,江浙联军士气旺盛,在总司令徐绍桢的指挥下,猛攻太平门。王有宏几次要带队出阵冲杀,都被部属劝住。王有宏的侄子、“江防营”参谋王小山,向王有宏献计道:“联军新得乌龙、幕府等地,锐气正盛。我们



当避其锐气，坚守阵地，待等他们久攻不下，士气疲惫了，然后，我军一鼓作气，出阵冲杀，可获全胜。这是古代名将曹刿所用的彼竭我盛之谋也。”王有宏听后，勉强压住满腔怒火，在阵地上咆哮不已。

联军从清晨到中午，久攻不下，士气逐渐疲惫。到午后，联军枪炮声稀落了，还隐约可以听到联军阵地上一片混乱，夹杂着骂声、埋怨声。

王有宏听得联军阵地骚乱，心中大喜，深深赞许老侄王小山的谋略，这真是“敌气衰竭”的大好战机。于是当机立断，命令全线出击。王有宏本人为保持“大胆将军”威风，全副提督穿戴，头戴红顶花翎，身穿钦赐黄马褂，跨乌雅马，持指挥刀，跃马当先。

王有宏刚一出马，他那红顶、花翎、黄马褂，在战场上显得分外耀眼，立刻成了联军密集火力的靶子。只一瞬间，他全身就中弹百余发，倒地毙命。

原来，徐绍桢深知王有宏一向鄙视新军，作战时又好轻率上阵，故在激战到中午时，暗中命令前线联军，佯装士气衰落，特意安排，制造种种假象迷惑敌军。结果，骄横不可一世的王有宏，果然中计毙命。

这一天，王有宏所属“江防营”官兵千余人，生还者只 17 人，革命军大捷。

全面胜利徐绍桢率兵进城

攻打天堡城，是光复南京的最后一战，也是战斗最为激烈，双方死伤最为惨重的一战。

天堡城位于南京紫金山的西高峰，原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为保卫天京建筑的堡垒，城用巨大的石块垒砌，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军事上控制南京的关口，居五大要塞之首。

天堡城攻击战开始，革命军各路军，向紫金山冲击，冲锋号、枪炮声、厮杀声震天动地。天堡城清守军，凭险据守阵地，枪不断扫射，炮不停轰击。革命军几次冲锋，都未能破，双方死伤遍野。



这时,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命令停泊在长江沿岸的起义海军军舰,临江发炮,猛轰敌军阵地,一阵猛烈的炮声,天堡城笼罩在一片炮火烟雾中。

激战两昼夜,革命军冲锋厮杀,前仆后继。镇江革命军管带杨韵珂带领全营官兵,向天堡城猛冲,身受重伤,壮烈牺牲,年仅30岁。后来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为褒彰先烈,将天堡城命名为韵珂城。

浙江革命军敢死队队长叶仰高,在攻夺天堡城战斗中,带领敢死队员100人,深夜冒大雨攀登悬崖,从紫金山侧面偷袭天堡城,当他和10名士兵,冲入天堡城后,不幸中奸计全部壮烈牺牲。

12月1日,清守军不支溃退,革命军终于攻战了天堡城,强大炮火直轰南京城。这时清两江总督张人骏同江宁将军铁良,正在北极阁张勋的指挥所里等候张勋商讨军报。突然一发炮弹,命中故阁,轰隆一声,5名卫士当场被炸死。张人骏吓得丧魂落魄,在铁良的扶护下仓惶出逃,离开南京。张勋在前线,得知张人骏逃走,眼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咬牙切齿地带领一批残兵败将,也撤出南京,逃往浦口。

12月2日,南京城鞭炮连天,人潮如流,总司令徐绍桢率革命军——江浙联军进入南京。

一个月后,1912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结束。

(摘自《总统府奇闻录》)



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始末探析

— 凡 徐晓虹

“7·7”事变后，日军扩大侵华战争的同时，在内蒙、华北、华中地区扶植傀儡，建立伪政权，用“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略方针，形成以日军为后盾的所谓“国中之国”。本文拟通过对华中地区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始末的阐述，以揭露日军侵华期间，一面建立伪政权，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一面收买汉奸汪精卫，拉拢、诱降蒋介石，妄图灭亡中国的罪恶实质。

—

1937年，日军发动“7·7”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29日北平沦陷，次日日军占领天津。在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指派下，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陆军武官助理今井武夫少佐，于天津陷落的当日“邀请”原北洋政府代总理、京师宪兵总司令、76岁的江朝宗任北平治安维持会会长（后任市长）^[1]。天津治安维持会于8月1日成立，会长是原北洋政府内务总长、69岁的高凌蔚^[2]。在日军侵占北平的当天，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在加紧向华北进攻的同时，又策划在上海等地制造事端。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16日，日本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布《临时命令第452号》，向上海派遣军明确作战要点，并散发《上海及南京附近军用地志概况》、《上海市资源调查》等材料^[3]，准备侵占上海、南京等华中地区。在内蒙一带，关东军加紧建立与伪满州国毗邻的伪政权。9月1日，伪察南自治政府成立。13日，大同沦陷。10月，伪晋北自治政府、伪蒙古联



盟自治政府相继成立。

与此同时,自10月初开始,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政府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和驻中国大使陶德曼不断秘密接触,进行和平谈判。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日军于11月8日攻克太原,12日占领上海,12月中旬又攻占南京、济南、合肥、杭州等地,其战争气焰越来越嚣张,并通过狄克逊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和平”的谈判终未能搞成^[4]。

上海失陷10天后,在关东军的策划下,蒙古、察南、晋北三伪政权合并,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德王任总务委员长。之前,12月5日,日军在上海浦东地区扶植一个治安维持会,称为大道市政府,安排台湾人苏锡文当市长^[5]。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下,所属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少将及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少将等八个师团部队,对无辜民众进行了灭绝人寰的大屠杀,6个星期内,南京30万同胞惨死在日军屠刀下^[6]。就在日军进行大屠杀的同时,14日,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怀仁堂成立。王克敏、齐燮元、汤尔和、朱深、王揖唐等分任各部部长,其管辖区以平津为中心,向外延伸至日军占领下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省^[7]。24日,日本内阁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声称在上海方面,要“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建立与华北新政权有联系的新政权”^[8]。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即《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府声明》,指责至今“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18日,日本政府又发表《补充声明》,扬言帝国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另外扶植伪政权,来“调整两国邦交”^[9],意欲以此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二

近卫声明发表后,华中方面军加紧策划“建立高度的亲日新政权”。2月初,以华中方面军特务机关长白田宽三大佐为首的“白田机关”,奉命尽快“寻找”合适人选。日军最初的计划,是“南唐北吴出面组织伪政府”^[10],



即“请出”闲居上海的原北洋政府第一届总理，77岁的唐绍仪任大总统；隐居北平的原直系军阀头目，64岁的吴佩孚为副总统。后因唐慑于当时上海不少亲日分子“身首异处”的惨状，犹豫观望，始终“不敢出面”；吴则由于国民党方面做工作，声明“不作日本傀儡”，“消极不干”；再者，“傀儡内部之倾轧摩擦仍未消除”等原因^[11]，使拼凑傀儡政权一开始就不如日方所愿。臼田宽三回东京向陆军参谋本部汇报时，苦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泪水汪汪”地诉说^[12]。2月中旬，臼田再返上海后，终于找到“新政权机构最适位之迟迟奋起者”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等人^[13]。15日，松井石根接见三人，“含泪”赞扬“诸君为东亚和平起见，全然不顾本身危险而崛起，不胜衷心敬佩”，要求他们“早日促成新政权，与日军协力一致前进”^[14]。正当三人在法租界梁的寓所秘密安排人选时，内定的伪绥靖部长周凤岐于3月7日在上海被暗杀^[15]。“周凤岐被刺之后，各人更觉胆寒，不敢再试”，内定的伪司法院长章士钊“亦声明不来”^[16]。为不使“招来动摇，前功尽弃”，松井石根的继任者畑俊六大将即“劝告彼等即刻移至虹口继续工作”。在日军占领下的虹口区新亚饭店（该店系上海派遣军特务部据点，是日后维新政府所在地、大民会总本部，附近的重光堂后为日汪进行密谈之处），“连日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同意“日方提出的国名、国旗、政权、宣言、政纲”等，至3月20日“最后一次秘密会，竟至决定树立政权之吉日，组成典礼准备委员会、任命委员等^[17]”。26日，在日军护卫下，梁鸿志、温宗尧、陈群、陈箴、陈锦涛、任援道、王子惠等人抵南京。28日上午10时，日本外务省代表、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代表、日海军第三舰队代表及即将就任的伪政府各院、部长等，聚集在原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典礼。会场四周悬挂民初五色旗和“友邦”日本旗。梁鸿志首先致词，宣布就职，然后伪各部部长分别就任，接着梁宣读《成立宣言》。声称本政府“原为临时性质，与临时政府初无对立之心，向来中央所管事项之不可分析者，仍由临时政府会商办理。一俟……恢复交通，即与临时政府合并”^[18]。按照日本的意图，在华中地区成立的政府属过渡性质的政



权,“一俟时机成熟”就将南北两伪政权合并,成立伪中央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伪南京维新政府参照伪北平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实行“三权分立”制,设行政、立法、司法三院,分别由梁鸿志、温宗尧担任院长,因寻不到“适位人选”,司法院院长空缺。司法院直属的司法行政院、行政法院等机构置于行政院兼管之下。行政院是伪维新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设秘书厅,铨叙、考试、统计、典礼、印铸、侨务六局及外交、内政、财政、绥靖、实业、教育、交通、司法行政八部。秘书厅秘书长吴用威,陈篆、陈群、陈锦涛、任援道、王子惠、陈则民、许修直分任外交、内政、财政、绥靖、实业、教育、司法行政部长,梁鸿志兼交通部长,后由江洪杰继任。立法院设秘书厅、编译处,法制、外交、财政、经济、治安、审计委员会,分别由潘承镠、陈于棠、杨景斌、张韬、黄垆(兼审计委员会)担任委员长,秘书长为叶先圻^[19]。

伪维新政府的班底大多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亲日派官僚,另一部分是国民党方面的投降派军人。伪行政院长梁鸿志,1882年生,1918年8月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员兼秘书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被列为祸首之一通缉,匿居北京日本使馆。1924年11月,任临时执政政府秘书长。1925年兼日本人主办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国委员。“7·7”事变后蛰居上海,是个地道的亲日派官僚^[20]。伪立法院长温宗尧,1876年生,1892年赴美留学。回国后于1904年任英藏订约副大臣,1909年任两江总督洋务顾问,1912年任临时政府上海通商交涉使,1916年5月任护国军都司令部外交局长。1920年任广州军政府外交部长,1932年1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7·7”事变后寄寓上海^[21]。伪内政部长陈群,1890年生,日本明治大学毕业。1917年9月,任广东大元帅府秘书,1921年任广东军政府秘书,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1932年1月,任国民政府内务部政务次长,后任首都警察厅厅长^[22]。

伪政府成立后,由于南京遭到日军三个多月的烧杀焚毁,到处残垣断



壁,一片荒凉,尽管难民营已于2月18日宣布解散,但城内幸存的居民大都还躲在难民营,无家可归。同时,原国民政府大院内,上海派遣军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部队调走后,又由十一师团天谷直次郎少将接任南京东部警备司令官,率部进驻。原政府在市内各机构的房舍均被日陆海军占据着。政府仅有几个院、部、委员长,无办事人员,也无处办公。面对此情景,在日军护送下,30日政府人员又返回上海,躲在日租界新亚饭店二、三楼设立各院、部、会“事务所”^[23],在日本宪兵的保护下活动,成为世人所耻笑的“饭店政府”。

伪维新政府成立的当天下午,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即发表声明,谴责日伪分裂中国的罪行,并宣布:南京伪组织与华北伪组织一样,“完全为日本之傀儡,其参加此项组织人等,自应依国法惩处”^[24]。

三

按照派遣军参谋部提供的方案,伪维新政府实际控制的地盘小得可怜,只有华中地区日军占领下的京、沪两市及苏、浙、皖三省部分地区。在日军的保护与配合下,各部长分派各地活动,建立省、市、县伪地方政权。绥靖部长任援道坐镇南京,召集1月初成立的治安维持会人员,在日军配合下,由会长陶锡三,副会长孙林荣、杨九鸣、王承典、赵公瑾等人交涉,驱逐难民营中尚未迁走的难民,恢复秩序,并将治安维持会改名为督办南京市政公署,由任兼督办。至10月下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伪政府相继在苏州、杭州、蚌埠成立,陈则民(伪政府教育部长由陈群兼任)、汪瑞、倪道烺分任伪省长,杭州市伪政府、南京特别市伪政府亦同时成立,何瓚、高冠吾分任伪市长。上海特别市伪市长是傅宗耀(伪维新政府成立后,大道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25]。

伪政府一成立,财政上就陷入严重的困境。日军每月支付的津贴不够敷出,人员薪金拖欠,许多活动亦无法开展。梁鸿志向畑俊六“请求”增加地方税收比例,并提出原国民政府从30年代起一直依靠关税提供53%



作为主要收入,要求得到关税补贴。同时,战争初期,由英国人主持的中国海关冻结支付辛丑条约所规定给日本的赔款及中国欠日本的其他债款。4月初,畑俊六代表伪维新政府与上海海关督办英国人弗里德里克·威·梅兹谈判,要求解冻中国海关关税收入款项^[26]。经过近一个月的谈判,5月3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与日本外务省签定《中国海关问题协定》。协定规定:凡日本在华占领区所得关税,均须存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新华日报》于5月5日发表短评,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据理驳斥。5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英日擅订中国海关协定,向英国政府提出照会,并作如下声明:“英国与日本订立关于中国关税之办法,中国决不受拘束,并保留对于海关之一切权利与行动自由。英日两国未经中国之同意,对于中国海关问题订立协定,中国政府不得不引为遗憾”^[27]。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并没有从中国海关的关税收入中给南北两伪政府一分钱的补贴。为了支撑政权,梁鸿志催促上海特别市政府“依靠志同道合的同志”(伪政府控制的上海黑帮)秘密贩卖军火、烟土、征收土地税等,所得按比例补贴政府^[28]。11月下旬,按照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指令,伪维新政府财政部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滥发大量钞票,与原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通用,既以此来弥补伪政权财政的不足,又“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以达到企图“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29]的罪恶目的。

伪北平临时政府未设外交部,日本政府为了澄清这一点,即于4月初声明指出,临时政府最后将掌管外交事务,而伪维新政府则在两个政府合并之前,暂行使外交“代理权”^[30]。伪维新政府成立之初,伪外交部曾照会日、英、美、苏、法、德、意等20个国家驻上海领事馆,要求得到承认。但直到伪政府解散,从未被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承认。陈篆于9月初到北平和长春活动,“访问”伪临时政府和伪满州国,签订了有关“友好协议”,并“互派使节”。此外,陈的主要任务是“参加梁鸿志与原田熊吉的会谈”。次年2月18日,陈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死,由廉隅接任^[31]。



根据日本政府要求,两个伪政权“应加快促成合并”。4月4日,梁鸿志、陈群等人在派遣军特务部安排下访问北平,与伪临时政府王克敏、汤尔和、董康等人开始商讨合并。4月29日,王克敏回访上海,再商合并事宜。7月19日至22日,日本内阁举行五相会议,通过《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南北两伪政权合并,并与伪蒙疆联合委员会联合,其目的是:“在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之下,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32]。9月9日至10日,在日方再次安排下,双方派代表在大连举行会谈,就合并问题达成协议,决定组建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作为统一的组织机构。9月20日,王克敏、梁志鸿分别率南北要员,在北平举行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预备会议,通过并发表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大纲、办事细则及成员名单。联合委员会成员南北各占3人,即北平王克敏、王揖唐、朱深,南京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经商定:王克敏为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朱深、温宗尧任常务委员,王揖唐、梁鸿志、陈群为委员。9月22日,伪联合委员会在北平举行了成立典礼^[33]。在梁鸿志等人忙于到北平商谈南北合并事宜期间,伪维新政府在各省的市、县伪政权基本建立。从9月中旬起,驻新亚饭店的伪政府各院、部、会“事务所”连同日本职员陆续迁往南京。10月1日,伪维新政府正式在原国民政府(今南京市长江路292号)挂牌,门楼上方挂有梁鸿志书写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匾额^[34]。

四

伪维新政府迁回南京,原国民政府大院只设行政院和交通部以及日本顾问处,其他院、部、会散驻在市内原国民政府其他机构所在地。10月15日至25日,梁鸿志受日本政府“邀请”,到东京、大阪、神户等地活动。抵日“第二日应近卫首相之招待宴”,之后“各省大臣、官内省大臣、议会各代议士、枢密院等,均经会见”,并与“海相陆相及藏相等,每人均经约1小时之谈话”^[35]。1939年1月5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派遣特务机关本部部



长原田熊吉少将为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同时,伪政府在立法、财政、绥靖、教育、实业、交通、编译等方面均有日方顾问。日军还以照顾梁鸿志的生活和安全为名,派遣叫园部的宪兵少佐警卫,特务部的女特务田中真子作随员。担任翻译的是日本人冈田尚和冈田清兄弟^[36]。至6月底,日军派驻维新政府的顾问多达27人,梁鸿志等人的一切活动均在日军监视之下。当年8月初,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外交官访问伪维新政府,当问到一位官员担任什么职务时,他急忙回答:“哦,不不不,日本人负责一切”^[37]。

早在伪维新政府成立前,华中方面军参谋部就制定了一个《华中日中经济提携计划》上报东京陆军部。从日本的观点来看,成立华中伪政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日本能控制华中地区的工业、运输和交通事业的计划得以实现。我们从参加日汪会谈的高宗武、陶希圣逃出后揭露的谈判密约中得知,伪维新政府早在上海期间,就由派遣军代表原田熊吉和梁鸿志签订了一系列的秘密协定。其中最主要的是有关华中开发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协定^[38]。华中公司和华北的对等公司一样,按日本政府指令于1938年4月8日在上海成立,由日本政府投资一亿日元(华北公司投资三亿五千万日元)。因华中比华北的类似资源相对来说较少,华中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搞复兴和重建工作”,而华北公司则是强调开发和加工自然资源。针对华中情况,日本决定强调复兴该地区的工业,并取得交通运输的控制权,以利进行扩大华中和华南地区的战争。华中开发公司是一个控股公司,并按控股的办法组织和资助各子公司。从4月8日至12月27日,由中日联合经营并在伪维新政府注册的子公司共12个: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华中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渔市场组合、上海内河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华中电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恒产股份有限公司、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华中都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华中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大上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在上海、南京、杭州成立^[39]。根据原田和梁于12月25日签订的《关于华中开发公司协定》中规定:“日方合股人对影响公司业务的全部重



要决定拥有绝对控制权”，当“军事上有不可避免的必要时”，日方“有权先采取行动”，事后“通知政府”。日本的投资保证了它对各子公司的控制，政府必须进行合作，以便为“公司的经营奠定法律基础，并保证日方人员为经理，同时配备中方人员任副经理或助理”，“政府应在缴纳财产税和所得税上给予优惠或豁免”^[40]。这样，华中地区的经济完全在日本的控制之下。

南北两伪政权成立联合会后，又于9月下旬至12月底在北平、南京分别举行了四次联委会，并发表《宣言》，商讨建立伪中央政府事宜。但由于华北、华中两派遣军都想抓住自己的傀儡，内部发生矛盾；而南北两伪政权又都想保全自己的地盘，因此终未形成一个政权实体。同时，自10月下旬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日本政府加紧对国民政府进行招降。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虽国民党，亦不拒绝》的政府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这个《声明》，竭力鼓吹中日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的东亚新秩序，希望国民政府不要拒绝日本的“一贯厚谊”，以此加紧收买汪精卫之流。12日，汪精卫派高宗武、梅思平到上海与日本政府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日租界新亚饭店附近的重光堂举行会谈，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并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商定汪叛逃的具体步骤^[41]。12月18日，汪潜离重庆经昆明逃往河内。22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中日关系之《根本调整的总方针》的第三次声明，再次鼓吹“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42]，并具体提出对国民政府招降的条件。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叛国投敌。汪精卫集团投敌后，日本对联合会的兴趣大减，转而策划由汪与王、梁会谈，商讨还都并建立汪伪中央政府事宜。

从1939年2月初起，伪维新政府忙于筹备“初周纪念”活动，大肆宣传其卖国投降的“业绩”。同时，又在日军安排下，梁积极参与汪、王的会谈，讨价还价争席位。下旬，成立由伪内政部长陈群为会长，伪南京市市长高



冠吾、伪行政院宣传局长孔宪铿为副会长的“初周纪念筹备委员会”，其成员有104人。从3月18日起至4月底止，在南京、上海、杭州、蚌埠等地开展宣传伪政府“一年之伟业”的庆祝活动。3月28日上午，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维新政府成立初周纪念庆祝大会”。主席台上“有政府各院、部、会长、三省市行政长官”，来宾有“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内政部长王揖唐、司法部长朱深等专程来南京参加”，“友邦方面，计有山田中将、及川司令官、喜多中将、原田少将、津田中将、森岛参事官等”莅临指导。下午，由大民会总部副会长陶锡三主持，在原国民大会堂召开民众庆祝大会。当晚，大民会总本部、南京市联合支部、支部组织民众进行“友邦习俗”的提灯游行。29日，由伪内政部和民会总部组织的“赴日视察团”22人，在日本指导员浦田三郎、尾花弘明顾问陪同下，到东京、大阪、神户等地进行“亲善活动”。“维新政府政绩展览会”和“儿童乐园”亦同时在南京朝天宫、白鹭洲开幕^[43]。伪维新政府的投降卖国行径，一切爱国人士恨之人骨，对卖国的汉奸“必将锄除之”。从筹备伪政府起到1939年4月底止，伪维新政府内政部公布的县以上“杀身成仁”的“殉难先烈”，有最早内定的伪大总统唐绍仪（唐于1938年9月30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44]、内定伪绥靖部长周凤岐、伪外交部长陈篆、伪立法院顾问马航育、伪钱币司长钱应清、伪杭州市长何瓚、伪常州市公安局长汤人杰、伪太仓县长黄颂声等47人，另有科、队长以上的“各界骨干”280余人^[45]。

9月21日，汪精卫到南京，召集王克敏、梁鸿志商谈“建立中央政府之事宜”。会上，“王、梁对汪提出意见”，认为汪是来抢果实的，“以当未从华北及华中派遣的日本机关接到任何通知为借口”，未达成一致意见^[46]。1940年1月5日，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为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汉奸的青岛会谈拟定《中央政治会议组织要纲》（决定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决定案）。6日，“梅机关”拟定《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大纲》（决定案）和《国民政府政纲》（决定案）。7日，“梅机关”拟定《青岛会谈要领》。10日，汪精卫召集干部会议，由周佛海报告青岛会谈的准备情况。15日，汪



精卫电邀王克敏、梁鸿志等汉奸赴青岛会谈。24日至26日,在“梅机关”的策划下,汪、王、梁举行青岛会谈,对成立伪中央政府进行“最后洽商”^[47]。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并通过伪国民政府成立大纲。30日,汪伪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并举行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汪精卫及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主要人员宣誓就职。汪精卫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梁鸿志为伪监察院长、温宗尧任伪司法院长、伪立法院长是陈公博、伪考试院长系王揖唐。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当日,仅存两年零一天的伪维新政府和伪临时政府及其联合委员会,同时宣布解散^[48]。

伪维新政府是侵华日军在华中地区扶植的傀儡政权,它通过其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统治,成为日本侵略军控制京、沪两市及苏、浙、皖三省部分沦陷区人民的工具,但它的统治无时无刻不受到爱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日本投降后,侵略者和卖国者最终都受到历史的审判。当今日本国内仍有少数右翼势力企图否认当年侵华事实,但历史是不容抹杀的。故借本文以告诫人们正视历史,尊重史实,以史为鉴。展望21世纪,祝愿中日两国人民有一个共同和平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筹] 副研究员 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筹] 馆员)

[1][41][43][47](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编译组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事变的回想》),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62页,第90~93页,第120页,第124页。

[2][6][7][24][27][48]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5页,第582页,第583、584页,第594、595页,第601页,第689页。

[3][4][8][9][29][32][42]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9页,第247页、第252页,第259页,第270页,第271页,第286、287页。

[5]上海《新闻报》,1937年12月6日,第1版。

[10][11][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胡鄂公密报日本策划“唐绍仪工作”致孔令侃等电一



- 组》，《民国档案》1998年第1期，第11页，第17页，第17页。
- [12][26][28][30][37][40](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乐刻等译，郑文华校：《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 1937~1945》(上)，商务印书馆 1978年，第155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60~162页。
- [13][14][17]《维新政府初周年纪念庆祝大会报告书》，1939年5月版，第19页，第21页，第22页。
- [15]上海《新闻报》，1938年3月8日，第1版。
- [18]上海《新闻报》，1938年3月29日，第1版。
- [19][23][25][31][35][39][45]行政院宣传局编制：《维新政府初周年纪念册》，1939年5月版，第3~5页，第7、37、43页，第175、179、183、213、219页，第308页，第229页，第147页，第308~329页。
- [20][21][22]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884页，第1299页，第1002页。
- [33]《南京新报》，1938年9月12、21、24日，第1版。
- [34]《南京新报》，1938年10月2日，第1版。
- [36]陈器伯：《梁鸿志与伪维新政府》，《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江苏、南京文史资料研究会编，1963年，第66页。
- [38]香港《大公报》，1940年1月22日，第1版。
- [43]《南京新报》，1939年3月29~31日，第1、2版。
- [44]陈恭澍：《蓝衣社内幕》，重庆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 1943年，第30~38页；又见《国府公报》1938年10月8日，渝字第90号。



推行奴化教育的工具——大民会

— 凡 曹 翔

伪维新政府是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在华中地区扶植的傀儡政权，它不仅是日军在京、沪两市及苏、浙、皖三省部分沦陷区实施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的代理人，而且是日军加强殖民统治，进行文化侵略，贯彻奴化教育的傀儡。早在伪维新政府借驻上海期间，伪政府行政院就于1938年6月20日成立宣传局，孔宪铨任局长。孔在上海日本特务机关指使下，纠集汉奸20余人，分组成立京、苏、浙、皖报道组，利用报纸、广播、宣传品进行媚日卖国活动。8月1日，《南京新报》、《苏州新报》、《杭州新报》、《蚌埠新报》创刊，与日人合办的“中华联合通讯社”（中联社）亦同时成立。接着，常州、无锡、扬州、常熟、昆山、海宁、嘉定等市、县新报亦陆续出现。宣传局开办新闻训练所，每3月1期，共办4期，培训专职编写人员和速成日语翻译。《南京新报》是伪政府机关报，每天一张对开4版，主要消息来自日本“同盟社”和“中联社”。报上充斥“中日亲善提携”、“建立东亚新秩序”、“日军胜利前进”、“国民党军溃退”及“昨又有殉难先烈多人”等新闻，大量篇幅是“皇军大欢迎——美丽好招待周到”、“本田商店日本鲜鱼、蒲铎盐鱼”、“大优惠皇军——人民安慰所、倚红阁妓院、广寒宫妓院露布”之类的整版广告^[1]。在伪维新政府迁南京前夕，9月11日，伪宣传局所属的南京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整日是日本歌曲、南京特务机关长和警察厅长加强社会治安的训令。次日，由华中方面军特务部开办的维新学院在上海复旦大学开学，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原田熊吉少将为校长，专门培训伪政府官员和翻译人员^[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伪维新政府期间的“民众团体”——大民会。伪维新政府规定:其人员不准参加任何党派和团体,但要“一律加入大民会”。可见大民会的重要性。早在日军侵占东北期间,为加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于伪满洲国成立初就在长春建立了协和会。当时的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声称:“协和会与建立满洲国同时产生,规定为国家机构之一,为竭尽全力维护建国精神、训练国民,并实现其理想的唯一的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团体”^[3]。伪北平临时政府成立初,华北派遣军特务部即以协和会为蓝本,在北平建立新民会,继而在伪临时政府所辖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公署,广泛设立新民会支部、分支部,开办新民训练所、新民教育馆和新民学院。新民会创立机关报《新民报》,将童子军改名为新民少年团,组建新民合唱团、开设新民广播电台、新民电影院、新民娱乐社、新民茶社等^[4]。日军通过新民会实施社会教育,大肆宣扬“建立东亚新秩序”和“王道乐土”精神,从政治、思想、文化上进行渗透。“8·13”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利用一批汉奸在上海日租界组织了东亚会,继而又建立了兴亚会、东亚黄道会、反共联盟等团体。1938年7月15日,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兴亚会改名大民会,会址设在日租界新亚饭店六楼上。该会中央机关为总本部,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部,各设部长一人,地方设联合支部和分支部。其经费由日特机关提供,受日本最高顾问北原雄龙、指导员三浦斯夫等人指挥。不久,大民会逐步扩展到苏、浙、皖地区,遂建立省、市、县联合支部、分支部^[5]。

大民会和新民会、协和会的基本目的一样,是日本特务机关在华中地区配合日军军事侵略、推行奴化教育的“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团体”。大民会纲领有四条:“一、振兴实践‘民德主义’,确立新中国国民精神。二、政教普及、民情上达。三、革新生活,强化民力。四、中日提携,以图东亚之自主兴隆”。宗旨是:“建设东亚新秩序,树立中央新政权”。会标是太阳、月亮和星。意喻日军是太阳,里面的月亮是大民会,靠太阳发光;民



众是依傍月亮的小星,靠太阳保护^[6]。10月1日,大民会总本部随伪维新政府迁南京,在宁海路38号设总本部,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伪立法院院长温宗尧任会长,副会长是原南京治安维持会长陶锡三。总本部设监事、理事会,下有秘书、组织、宣传、社会服务、调查统计五处办事机构。大民会的首席顾问是派遣军参谋长松室孝良少将,另有特务部滨田中佐、军报导部马渊大佐指导^[7]。在《南京新报》发表的《评大民会纲领》社评中,露骨地声称,今日中国“事实上离不开日本之指导与监护、提携。盖仰日本居于指导监护之地位,中国处于被监护地位,如此进行,东亚之自主兴隆,实利赖焉。……日本系老大哥,坐第一把交椅,其处心积虑,在为有色人种作屏障,为有色人种争地位,必一致拥护此老大哥,增加其勇气,减少其顾虑,然后始能胜任”^[8]。大民会在苏、浙、皖三省及上海地区共建联合支部、支部105处,其会员主要是伪维新政府及省、市、区、县伪政府人员、伪新闻机构人员、部分市、县、区强制集体加入的小学教师和中学师生、伪行业协会人员、社会上的流氓、帮会分子,伪维新政府及伪省、市政府中的日军顾问和日籍职员为“名誉会员”,至1939年底有会员96000余人^[9]。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大民会搞了几次大型“民众活动”。第一次是在伪维新政府迁南京前,于8月9日同时在南京、苏州、杭州、松江等地举行“反共反蒋反战民众大会”。较大的一次,是在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为配合第二次《近卫声明》,加紧对国民政府进行招降,于11月6日以伪维新政府名义在南京鼓楼广场召开“反共救国民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伪政府所有人员、日军顾问、部分日驻军、大民会各省、市、县的联合支部、支部代表队伍、各区民众共“近10万余人”,几乎是当时南京居民的三分之二。会上,大民会代表声嘶力竭地喊道:“大民会的最大目的,就是反共救国!”^[10]在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大民会又组织了两次“反共救国民众大会”。大民会除在南京设总本部、联合支部外,还在市内各区设支部,但因“找不到适合会长者”,许多支部形同虚设,“活动无法开展”。伪维新政府时期,大民会总本部向苏、浙、皖三省及上海地区散发了近70万册宣传品,宣传



“中日提携”、“建设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卖国思想,配合日军进行奴化教育。汪伪政府成立后,大民会改组,把“当初出之于友邦日本人士之意思的”大民会冠以“中国”两字,变成“中国大民会”。其宗旨之一“树立中央新政权”算是完成,但仍要“帮助政府完成和平反共建国的艰巨事业”,更需“友邦日本各方面的多多帮助”才能成功。汪精卫之流为了宣扬投降卖国的“和平建国论”,就利用大民会的宣传小册,肆意歪曲孙中山于1924年11月北上途中,在日本神户发表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内容。尔后,汪伪政府又陆续发行了《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及《大东亚月刊》等杂志,把孙中山说成是“亲日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是“一致的”,赞扬日本侵略者的“东亚联盟”、“大东亚战争”、“大东亚共荣圈”等强盗逻辑的“合理性”^[11]。除了投降就是卖国,再找不出新的内容。大民会又几经改组,但“民众附合甚少”,终未能象当初那样“兴隆”^[12],至1940年12月宣布解散,并入汪伪中国国民党。

(作者为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筹] 副研究员 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筹] 馆员)

[1][8][10]《南京新报》,1938年8月1日至9月30日、第1~4版,1938年9月4日、第2版;1938年11月7日、第1~4版。

[2]上海《新闻报》,1938年9月13日,第1版。

[3]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3页。

[4] (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乐刻等译,郑文华校:《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28页。

[5][7][9][12]赵如珩述:《中国大民会的过去及将来》,南京大民会宣传部1940年,第1~3页,第3~4页,第7页,第11~12页。

[6]刘希平著:《维新政府与新中国》,南京大民会宣传部1939年,封面、第12页及封底。

[11] 周化人:《大亚洲主义与亚洲联盟》,《大亚洲主义》(第1期),1940年8月15日版,第21~25页。



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见闻数则

汤又新 丁绍兰

国民政府大门和礼堂的改建

南京国民政府所在地,是沿用军阀时代江苏督军署、清朝两江总督衙署的老房子。大门是两边灰色围墙当中一个矮矮的圆门,门前一对石狮和两个木岗棚。大门与大堂之间的空场上,还有一道隔墙和二门。每逢举行纪念周或其他会议时,大院内车水马龙,无回旋余地。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曾面向蒋介石建议,认为国民政府为首都的中心,中外观瞻所系,屋宇太差,有失“国体”,亟需重新改建,首先拆造大门,以壮观瞻。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将大门改造翻新,遂命令参军处负责招工承办这个工程。不久(大约在1929年初夏),大门的拆建工程便开始了。先将旧大门和东西两边的围墙全都拆除重建,围墙还加高了一尺,原来大门内的一道隔墙和二门亦同时拆毁,使广场更为宽敞。新建的正门是一座砖结构水泥门,正面有三个圆门八根抱柱的三层大门楼。由于结构简单,工程不大,施工不到半年,就全部完成了。大门两边楼下,东边是传达室,西边是卫兵司令室,二楼是参军处职员宿舍,第二层更简单,只有正中一小间是升旗预备室,室外两边是水泥平台,由平台再登水泥扶梯即为旗杆座,亦可瞭望四周。大门上有水泥塑制、字面贴金的“国民政府”四字,系行政院长谭延铎所书。这四个字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未有变动,直到1948年5月,蒋介石当了总统,才把它铲掉,换上监察院副院长周钟嶽写的“总统府”三字,当时为了赶时间换招牌,顾不得简陋,按字样锯了三个木头字,贴上金箔,在蒋介石就任总统的第三天就草率地钉在门楼上了。



在国民政府重建大门的第二年(1930年)又扩建了礼堂,扩建的原因是:在一次接受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译名)呈递国书时,按外交礼节,大使进礼堂门,首先一鞠躬,上前数步,至“主席”面前再一鞠躬,国书递毕,须从原位后退,两次鞠躬后,至礼堂门口转身出门。那次许阁森后退时不在意,步子跨大了一些,退到了门槛边几乎被绊倒。事后经典礼局呈请蒋介石批准,决定翻修礼堂,将原来权充礼堂的那座旧花厅屋面翻盖,延伸到花厅外的天井,面积扩大约三分之一,室内柱子包了装饰板,地面改铺花瓷方砖,四周又加装护壁板,礼堂大门改为南向,前面又辟出一条过道与中间穿堂相连。过道两边墙上嵌黑色冲大理石护壁和朱漆柱,顶上做有暗花玻璃的藻井,里面配置了灯光。同时还将中间穿堂和西边通礼堂的走廊两边都装上了固定的毛玻璃长窗(此窗不能开),这样就挡住了窗外的视线,把走廊和穿堂两边的破旧瓦房统统遮盖住了。据说这个巧妙的设计系出于名建筑师卢某之手。其实这手法再好也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始终没有治好礼堂屋面的一漏再漏。

国民政府门前的警钟和学生请愿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突然侵占我东北三省,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蒋系1929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时任主席)下令撤兵,实行了不抵抗的投降政策。在全国人民无限愤慨、各地学生游行示威的一片抗战声中,国民政府门前出现了一个“中国警钟会”,在国府对面大照壁前的一棵冬青树上挂了一口警钟,钟前竖了两幅白布大标语,一幅上书:“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督促政府,立即出兵”。另一幅上书“中国警钟会”五字。咣咣!咣咣的钟声昼夜不停,风雨无阻地敲着,围观群众愈聚愈众,莫不表示同仇敌忾,但蒋介石置若罔闻,更激起爱国学生义愤填膺,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游行队伍曾先后多次进入国民政府大院,要求面见蒋介石请愿。蒋介石第一次被迫出见,他站在大堂屋檐下放的一张桌子上,对学生讲了一些所谓抗日救国必须有充分准备,何时出



兵,政府自有主张,学生应体会政府苦心,先回校复课等等的话。当时学生未得具体答复,不肯退出。在僵持不下时,蒋耍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对学生说:“你们学生是受过教育有理智的,我是一国的元首,你们要懂道理,有礼貌,我还有要事要办,你们有事可找贺参军长(贺耀组)”。当时贺站在桌子旁边,讲了几句与蒋义意同词异的“劝勉”话。蒋则从后面溜走了。

数日后,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的学生代表团云集于南京,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到国民政府请愿,蒋介石仍避而不见,派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代见,张亦站在大堂前的桌子上对学生讲话,因张的讲话万变不离其宗,不能离开蒋的授意,学生仍不满意,张又去黄埔路官邸向蒋请示,最后拿了一张蒋介石亲笔写的“手谕”来作为搪塞。手谕的内容(记不太清)有:“本主席效忠党国,早具决心”二句,收尾语中有:“切望尔等以学业为重,即回校复课,体恤时艰,共抒国难,此谕”。下面签名有“中正”二字。由张治中郑重其事地当众宣读,并将词意逐句作了解释,然后面交学生代表。这张一纸空文只不过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暂时骗取学生的信任。

在同年12月冬天,一个天气阴寒的早晨,细雨濛濛,示威游行的队伍再一次来到国民政府,学生在大院内高呼抗日救国、要求出兵的口号。蒋介石不敢露面,由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出面代见。在细雨中,于右任站在大堂前的桌子上,以乡音极重的陕西话讲了约半小时,意思不得不与蒋唱同一个调子,依然不能取信于学生。至下午气温骤然下降,阴霾四布,接着大雪纷飞,寒风凛冽,但请愿学生立雪堂前,坚持要蒋介石出来答复,直至夜幕已降,学生仍在雪中坚持不退。蒋无可奈何,假惺惺地“关心”学生的忍饥受冻,命参军处准备了许多军毯和饼干,分送给学生,表示“慰问”,但全体学生坚决不受。

关于“林森奖学金”

在林森70岁那一年(1936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为了表彰林森“年高德劭”、“功在党国”,庆祝他的70寿辰,设置“林森奖学金”,交行政院转饬财政部国库署拨款20万元,专户储存,并成立林森奖学金



管理机构负责保管,规定颁发奖学金条例,主要是鼓励成绩优异的学生或资助优秀生出国深造。这在国民党还是第一次。

1943年林森死后,奖学金的名义尚存,但对莘莘学子,嘉惠无多。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在清理林的遗物中,有他收藏的字画近千幅。因林早年丧偶,没有亲生子女,干儿子倒很多,都无遗产继承权。经国民政府决定,将这批字画编列号码,采用抽签的办法拍卖,定价每件为法币10万元(约相当于硬币银元10元)。这些字画以赝品居多,珍品很少,但在每幅的正面都盖有“青芝老人鉴赏”六个字的印鉴(青芝老人是林森鉴定字画用的别号),并在卷首的反面又盖有“眼福”或“寓目”二字的图章以区别字画的等级(前者为上品,后者为较次品),这是凭他自己的水平而鉴定的记号,因此,林收藏的字画就身价十倍,吸引了许多爱慕虚荣的人,纵非字画爱好者,亦得林之收藏以炫耀门庭。当这些字画在林的如意里官邸展出抽签出售时,购者踊跃,不到三天,争购一空。变价所得约相当于银元数千元,全部充作奖学金之用。

蒋介石出入总统府的警卫情况

从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到国府路(今长江路)总统府,沿途布岗和汽车通过时的通信联络等都有严格规定:当他的汽车(除蒋介石自己坐的汽车外,后面还跟有一辆侍卫车)从官邸开出南驶时,即按电铃通知黄埔路南段路口的岗亭,在过岗亭转弯西驶时,岗亭的卫兵就按铃通知总统府大门口的卫兵司令(这个卫兵司令是一个排长,专管大门口值勤的岗位),让门卫有所准备,当汽车由汉府街转弯进国府路时,大门口即按铃通知站在大堂后穿堂走道上的预备班(即仪仗队)列队,等蒋介石下车时吹三番号致敬。这时候参军处局长以上的办公室的信号灯都亮了,同时电铃连响三次,即知“总统”已入府,以后信号灯如熄了,即表示“总统”已出府。

蒋介石进府后,一般在大堂下车,有时也直驶中堂下车,步行到子超楼,乘电梯上二楼办公室,或者穿过中堂,上台阶进西式平房内东面的一



间休息室办公或休息（当年周恩来总理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曾亲自来总统府找蒋介石谈判，就在这间与休息室相连的会客室）。如遇开大会、举行庆典或纪念周，蒋介石就直接进入礼堂，不去后面。

从大门直到子超楼的一条路线上，设岗位不多，大门口设的固定岗亭平时站四个卫兵，一个班长，大堂通右边西花园军务局的门前，设有一岗，只有中堂和后边子超楼门前各加一岗，蒋的办公室和休息室以及其他各处都不加岗，因此，表面看来，没有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的气氛，而实际上，跟在他后面的那辆汽车上的便衣侍卫数十人，下车后早已分布到与中间穿堂相通的各条走道和交叉路口流动放哨，随时警戒了。

另外，在总统府和黄埔路官邸周围一带如小营、竺桥、大行宫、成贤街等处的派出所所长，都是蒋介石的侍卫官担任的。

解放前夕的总统府

1949年4月中旬，人民解放军云集长江北岸，待命南渡。国民党残余部队兵败如山倒，已面临全面崩溃，当时总统府内一片混乱。少数在宁头头慌忙收拾细软，准备逃跑。那些不愿走和走不掉的小职员亦人心惶惶，莫知所措。4月21日，代参军长刘士毅召集留守人员在西花园桐音馆中间的会客室训话。那天正是周末，且时近中午，多数人已经下班，到场人数寥寥无几（约10余人），他们都是无精打彩，面面相觑。当刘士毅从军务局局长办公室（当时他兼任军务局长和代参军长之职）走入会客室时，一副紫灰色的暗淡面容，他有气无力地说：“长江防务巩固，可保无虑，你们在此好好看守，我们把带走的人和留守不走的人是一视同仁，同等看待的，以后的薪水会按月寄给你们，留存的粮食尚可食用一时。我本人今天下午还须到溪口（指蒋介石的家乡）一行”。在场职员无一发言，沉默了几分钟，就散会了。转眼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陆续胜利渡江，总统府的卫兵闻讯，也在22日半夜溜跑了。

（作者均在原国民政府、总统府任职，南京解放前为原总统府第六局庶务科荐任科员）



我所知道的蒋介石总统府

朱明镜

一、总统府概述

蒋介石的总统府座落在现长江路292号,即现江苏省政协所在地。从蒋介石1948年5月20日当上总统起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为止,总统府在风雨飘摇中只存在11个月,现在已变成历史的陈迹了。

总统府的房屋建筑分前、中、后三部分。

前造进门处原先是中式辕门和围墙,入内是朱门朱户朝房式的东西两长厢,在清朝的两江总督年代,这里曾是文武属员参见总督前临时休息的地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后,1929年把辕门改建为门楼。后来更名为总统府,仍沿用此建筑,两厢则作为卫队的兵舍。总统府大门外置卫兵4人,由班长一人率领。门楼下面为卫兵司令室,是大门警卫排长和班长的驻地。

过了东西两厢,正中是一座五开间的大厅,厅正中是设有公案的暖阁(现已不存)。厅上有孙文亲笔书写的“天下为公”四字匾额。厅前东西两侧各有内外两个小门:东侧外门额刻“琼树”二字,内门额刻“清峙”,西侧外门额砖刻“璇纛”,内门额刻“飞黄”,均为清末两江总督衙署原物。“琼树”通东厢走廊,“清峙”里面是总统府的机要室。出“璇纛”门北面有三间两厢一小院为参军处医务室,“飞黄”里面是总统府的总收发室。穿过大厅,东西两侧各有厢房。东厢房为总统府第六局(总务局)的会客室,西厢房为交际科。越过东西厢房,东侧一大间、内隔两小间为参军处秘书室,西侧一大间为第六局管理科。由此向北,到了玻璃穿堂,西侧有一巷道,北转为蒋介石



石召开会议、做纪念周与接受外国大使呈递国书的礼堂。巷道屋尽头处有腰形小门，直达西花园。玻璃穿堂北为三大间的二厅。二厅东边这一间隔成两小间，内小间为参军长办公室，外小间为参军长休息室，后兼作外宾休息室；西边这一大间为参军办公室（解放后西边这一间也隔成两小间）。大厅、二厅全是朱漆房柱，遇到重要的节日，悬挂宫灯，古色古香。

穿过二厅，就是总统府中部，东西两厢房是总统府人事处办公室。正北一幢西式五开间平房，中间是穿堂，穿堂前面有台阶，是蒋介石接待外宾及拍照的地方。东边二间是套间，外间是蒋介石的会客室，内间是他的休息室，蒋介石在接待外宾或接受外国大使、公使呈递国书后在此休息，有时在此批阅文件。西边二间是通间，为蒋介石的外宾接待室。过了外宾接待室，进一方门，门内是水磨石甬道，两旁有木栏杆，甬道正中有双扉朱漆木门，名麒麟门。水磨石甬道北端是一座两层的西式大楼，这是总统府第二局即政务局的办公楼。

穿过政务局大楼就到了总统府的“子超楼”，这是后部。该楼建成于1936年，因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字子超，所以命名“子超楼”。此楼建造前是一块荒地。楼前两株参天大雪松下面，过去有石碑，上写“林森手植”（今已不存）。“子超楼”共五层，有半层在地下。地面上第一层与地下部分是“总统府”第一局即文书局办公所在。二层楼东南角向南的三个房间，是蒋介石的办公室，内有大写字台一张，上置文房四宝，有檀木方桌一张，上置花瓶，黄丝绒沙发一套，蒋介石坐的是皮转椅。办公室东一间是休息室，内有浴盆与抽水马桶。办公室西一间是接待室，有黄丝绒沙发两套，林森时期此室是书房，四面都是壁橱，放书籍与古玩。蒋介石办公室对面的房间是副总统李宗仁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实际是虚设，李宗仁从未来过。蒋介石办公室西隔壁为第一局局长许静芝的办公室，再西一大间为“总统府”秘书的办公室。李宗仁西隔壁是秘书长吴鼎昌的办公室。三层楼正中是一个会议厅，是召开“国务会议”的地方。会议厅北面墙壁上有一块长方形的汉白玉，上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金字（今已不存），会议厅



四周靠墙布满沙发,当中会议桌成山字形,会议桌两边设高背皮靠椅,正中坐北向南,蒋介石的皮靠椅比其他皮靠椅更高出一头。四层楼上都是小房间,是电讯室与服务人员室。

以上所述是从南到北正房大院。此外,还有从南到北的东西两个侧院。西边侧院在礼堂之北,外宾接待室与政务局大楼之西,西花园之东,子超楼之南,共有四进:前三进是三开间平房,最后一进是楼房,前三进是总统府第四局即典礼局的办公地方,最后一进是第五局即印铸局办公地方。东边侧院从南到北全是中式平房,是总统府警卫队,军乐队与清洁队及勤杂人员的住房,总统府第六局即总务局的庶务科、出纳科等在此办公。其中有三间是改建过的半西式平房,是第六局局长、副局长的办公室。东西两个侧院之外,有东、西花园。西花园为总统府第三局即军务局所在。军务局长办公室在桐音馆。桐音馆东侧西式平房为高参办公室。西花园中山堂之北一幢三层四方形西式大楼为总统府图书馆,藏书中有比较完整的《国民政府公报》。图书馆后面一排平房为总统府档案室。东花园在“子超楼”东边,有西式的喷水池,池北是花房,池南有二层西式楼房一幢,是文官处宿舍。

总统府有防空洞两处:一处在西花园孙中山先生住室前面,系汪伪时期所建;一处东花园喷水池东面,是林森任内所建。

二、组织结构

总统府在“总统”“副总统”之下,设置资政,人数不定,由总统就勋高望重者遴选之,对于国家大计得向总统提供意见并备咨询。总统府置秘书长1人,特任,承总统之命综理总统府一切事务并指挥监督府内所属职员,设置副秘书长1人,简任,辅助秘书长处理事务。秘书长先是吴鼎昌,继为翁文灏。李宗仁任代总统时为翁文灏与吴忠信。秘书长下设秘书12至18人,均简任,受秘书长之指挥、监督、撰拟重要文稿,承办特交事项。总统府设置参军长1人,特任,承总统之命,指挥监督参军及其所属职员,办理有关军务事项。任参军长的有薛岳、孙连仲等,李宗仁代总统时为李



汉魂,刘士毅。参军长下置参军 11 人,内中将 7 人,少将 4 人。总统府设置参事 5 人,简任;设置编审 14 人,内简任 3 人,荐任 11 人,编审主任张占鳌。此外,还设专门委员 4 人,荐任。

总统府下设六个局,其中第一、第二、第五三局属秘书长领导,第三、第四、第六三个局属参军长领导。

第一局即文书局,局长许静芝兼典玺官,副局长朱云先,均简任。该局掌理一切法令文告之宣达,文书之撰拟、翻译、编审、保管、收发、玺印及印信之典守,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及会议记录等事项。下置七科,全局共 177 人。

第一科 49 人,科长江圣根(总统府科长一般均为荐任)。

第二科 13 人,科长朱起达。

第三科 14 人,科长王大为。

第四科 10 人,科长曾省三。

第五科 18 人,科长张锡甲。

第六科 44 人,科长张家柱。

第七科 8 人,科长齐宪为。

总收发室 19 人,主任由编审胡建磐兼,科员及书记官,事务员 19 人,内荐任科员 2 人。

文书局主编和发行《总统府公报》(1948 年 5 月 20 日前为《国民政府公报》),每天一份,主要内容:(一)总统(主席)令;(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令;(三)法律、条例、细则、规程;(四)授勋、抚恤、荣典;(五)文官简任以上,武官上校以上总统直接任免人员名单及文官荐任以上,武官上尉以上经五院呈请总统批准任免人员名单;(六)五院裁决、判决文件;(七)通辑令;(八)归化(即入中国籍)人员名单;(九)法令解释。

第二局即政务局,是从蒋介石私人办公室——侍从室中划出管党政的第一处的一部分加上原“国民政府”的一部分人员合成的。

第二局掌理机要文件之撰拟,机要案件之查签及转递,调查材料之研



究整理事项。局长陈方,副局长李白虹,简任,都是侍从室的人。全局45人,下置三科。

第一科16人,科长郑钟毓。

第二科14人,科长夏新霈。

第三科13人,科长曾资生。

第三局叫军务局,是与政务局同时从蒋介石的侍从室划到“总统府”来的,掌理有关军事命令之宣达,文件之承转及其他有关军报事项。局长俞济时,中将,蒋介石的外甥,侍从室的人。副局长是傅亚夫(少将)和贺楚强(军简二阶)。属下有少将高级参谋6人,上校参谋4人,中校参谋8人,简任专门委员2人,简任秘书4人,荐任秘书4人,中校副官1人,少校副官2人,上尉副官1人,中尉副官1人,荐任科员5人,军荐二阶科员1人,上尉科员1人,委任科员13人,军委一阶科员2人,书记官15人,测量绘图员2人,事务员5人,书记8人,共计88人,分7个科。

第四局称为典礼局,掌理国庆日及其他纪念日典礼事项,阅兵、出巡、授勋、国际礼仪、接待外使、招待外宾事项以及京内外官员,团体与蒙藏政教领袖觐见典礼事项,其他大典及礼节。局长吴思豫,中将参军兼任,副局长刘迺藩,外置简任秘书1人,简任专门委员1人。全局36人,分两个科。

第一科18人,科长周青。

第二科14人,科长蔡顺礼。

第五局即印铸局,掌理县以上机关印信、官防、官章之铸造、登记;勋章、奖旗、奖章、纪念章之制发,总统府所颁法规及公报之编印,职员录之刊行,公文纸之统一印制等事项。局长周仲良,副局长吴椿及技正3人,均简任。全局151人,下置三个科与三个工厂。

第一科25人,科长陈伯瑜。

第二科17人,科长卢启聪。

第三科22人,科长索树白。



铸印工厂 24 人,厂长贺汉生。

制章工厂 29 人,厂长许允鳌。

印刷工厂 29 人,厂长谭鳌芝。

铸印、制章、印刷三厂的地点在总统府背后的黄家塘。

第六局又名总务局,掌理总统府警卫、庶务、出纳、举行典礼之布置、来宾登记、普通交际、交通运输、卫生医药等事项。局长陈希曾、中将;副局长徐本生。全局 130 人,分七科一所。

文书科,掌文书及典礼之布置事项,全科 14 人,科长吴璧存,科员 6 人,荐任 5 人委任 1 人,书记官、事务员等 7 人。

出纳科,掌本处出纳事项,科长周国创,全科 17 人。

庶务科,掌本处之庶务事项。科长谢毓坛,全科 19 人。

管理科,掌总统府之警卫及家具、器材、工具等事项。科长刘克仁,全科 19 人。

交际科,掌总统府普通交际及觐见总统的来宾登记事项。科长朱华封,上校;全科 15 人。

交通科,掌总统府及总统官邸的交通运输事项。科长胡镇随,全科 12 人。

内务科,这个科负有特殊任务,专为蒋介石一家人的生活服务,办公地点在蒋介石官邸,人员配备也与其他科不同。全科 18 人,科长袁广陞,上校,蒋介石的小同乡,浙江奉化人;下置中校科员 1 人,书记官 1 人,事务员 15 人。全科有浙江籍 12 人,其中奉化 6 人。

医务所,掌理本府医疗卫生事项。全所 14 人,主任医官李任,医官 6 人,司药 3 人,看护长 1 人,事务员、书记、雇员等 3 人。

总统府除上述六局之外,尚有机要、侍卫、统计三室与人事、会计二处,警卫、军乐两队。

机要室,掌理有关机要电务事项,虽直属总统府,但与军务局关系密切,因此办公地点在大厅东耳房,靠近西花园,便于联系。机要室主任毛庆



祥,下置副主任1人,简任秘书2人,荐任观察4人,全室31人,分两科。

第一科14人,科长黄咸益。

第二科9人,科长顾贞元。

侍卫室,掌理有关侍卫事项。侍卫长石祖德,中将;副侍卫长2人,少将;侍从武官3人,参谋2人,副官2人,简任秘书1人,书记官2人,事务员4人,侍卫官25人,警务员21人,侍卫21人,雇员2人。合计86人,其中浙江省籍的73人,校级以上军官35人。

统计室,掌理总统府统计事宜,全室11人,室主任赵荣长。

国民政府设有人事处,文官与参军两处下分别设立人事室,分管两处的人事工作。总统府成立后,将被撤销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人员与文官、参军两处人事室的人员合并成立人事处,掌理有关人事事项。处长梅嶙高,简任;帮办1人,荐任。全处72人,设置四个科。

第一科14人,科长吴国权。下分三个股:第一股掌管资政、顾问、秘书、参事、编审、专门委员、参议及第一、第二、第五三个局、会计、统计两室与人事处本身人员的任免、迁调、级俸、铨叙、退休、抚恤事项;第二股掌理参军及第三、第四、第六三个局与机要、侍卫两室,军乐、警卫两队人员的任免、迁调、级俸、铨叙、退休、抚恤事项;第三股掌理印信、文稿、档案、庶务与员工福利事项。

第二科15人,科长陆东平。也分三股:第一股掌管上述第三、四、六局与机要、侍卫两处、军乐、警卫两队人员的考勤、考核、考绩、考成与奖惩事项;第二股掌管第一、二、五局与资政、顾问、秘书、参事等人员的考勤、考核、考绩、考成与奖惩事项;第三股掌管证章、人事、动态、统计、收发与庶务。

第三科22人,科长傅瑞华。下分三股:第一股掌管全国各项人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人才)之调查;第二股掌管全国各项人才资料之征集审计;第三股掌管全国各项人才之考核。

第四科19人,科长吴光韶。该科承办全国各项人才人事资料之征集、



登记、管理、审订等事宜。

会计处，共 28 人，会计长吴治普。下分三科：第一科 5 人，科长温凤韶；第二科 15 人，科长徐学铿；第三科 6 人，科长路承华。

警卫总队主要任务为蒋介石担任警卫，驻在蒋介石官邸（黄埔路）。全队官员 18 人。总队长周觉生及副总队长两人均少校，下置队长、教官、军医等 15 人。

军乐队，队长何肇廉，连同副队长、分队长等共 17 人。消防队，队长蔡汝梅。

以上合计总统府人员共 946 人，加上工人及勤杂人员约 1500 人左右。

三、总统府的职能

总统府国务会议，以总统、副总统、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并设委员 16 至 22 人。每两周举行一次会议，必要时总统得召集临时会议，三分之一委员认为有必要时也可以召开。主席为总统，如总统、副总统因故不能出席时，由五院院长依次代理。讨论议决事项：一、立法原则；二、施政方针；三、军政大计；四、财政计划及预算；五、各部会长官及不管部会政务委员之任免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之任免；六、院与院间不能解决之事项；七、主席交议事项；八、委员三人以上就上列 1~6 各款范围内连署提出之建议事项。国务会议议决之事项如总统认为执行有困难者得提交复议。复议时如有五分之三以上在任委员的主张维持原案应予执行。

各国大使呈递国书一般都是蒋介石自己接受，事先由典礼局约定时间，并派科长或典礼局长亲自出马去大使馆，将大使接到总统府大厅下车，典礼局长陪同检阅仪仗队，与此同时，军乐队奏大使本国的国歌。然后到参军长休息室稍事休息，接着仍由典礼局长陪同经过压花玻璃穿堂与巷道由南进入礼堂，蒋介石率 18 名秘书与 11 名参军自北面进入礼堂。蒋站在主席台前，蒋的左边站立由秘书长率领的 18 名秘书，右边站立由参



军长率领的 11 名参军。外交部长和典礼局长站在台前两旁，外交部长、典礼局长介绍大使与蒋介石、秘书、参军相见，一一握手。大使向蒋鞠躬行礼，蒋答礼，大使递国书，致颂词，蒋接受国书，致答词，大使再鞠躬，礼毕，拍照。蒋率秘书、参军们退席，大使退到外宾接待室，在外宾接待室，典礼局长向大使敬香槟酒、雪茄烟。典礼局长和仪仗队送大使上车回馆，在大使离总统府时，奏中国国歌。第二天，典礼局长持蒋介石的名片去大使馆回访。

总统府纪念周每周举行一次，时间在星期一上午八时，地点在大礼堂，各部院科长以上人员参加。蒋介石主持纪念周，有时自己讲话，有时请秘书或国民党重要人物讲话。纪念周结束后，他往往到总统休息室里休息并批阅文件，然后离去。

国庆、阅兵、出巡及其他。国庆大典时蒋介石最感兴趣的是阅兵，但又没有去搞一个永久性的广场，因此往往是在西面广场（即原国民大会堂旁）临时搭一个检阅台，邀请各国的大使、公使观礼，出动陆、海、空军与大炮、坦克。他身着特级上将、陆、海、空军大元帅的礼服，后面跟着参军们。蒋介石出巡，也是参军们都跟着，文臣武将，前呼后拥。蒋介石接见京内外官员及团体与蒙藏政教领袖觐见，须事先在交际科登记。

蒋介石的总统府，也只是摆一个样子。蒋介石发号施令并不出自总统府，而是出自密室——侍从室。侍从室就象封建皇帝的内务府或内书房，不同的是侍从室管得宽，党、政、军、财、文样样都管。蒋介石的重要文告，由侍从室拟定，军政大事由侍从室办好文稿送国民政府盖章发出。不分白天黑夜，蒋介石只要想办什么事就给侍从室下个条子。

蒋介石抓人事抓得极紧，全国的简任以上文官和上校以上武官都由总统直接任免，全国荐任以上文官和上尉以上武官都必须由五院或总统的秘书长、参军长呈请总统批准任免，全国的文官要经过考试院的普考、高考与铨叙，全国的武官都要经过国防部的铨叙。荐任以上文官和上尉以上武官的任免都要登载《总统府公报》，传达到全国。



蒋介石早年在上海黄浦滩混事，以拜“老头子”起家，后来他当了“领袖”也要人拜他老头子。他是中央政治学校校长、中央训练团团长，以及黄埔军官学校、步兵学校、炮兵学校、陆军大学、海军学校、空军学校、甚至军医学校、军需学校无一不是他兼任校长，目的是要所有文武官员都成为他的学生。蒋介石对他的黄埔学生特别关心，无论谁结婚，只要给他打一个报告，他就批给三百块钱，“恩赐”、拉拢。当然是国库开支。

蒋介石用人原则上是非亲不用，宋子文是他的舅子，孔祥熙是他的连襟，陈立夫、陈果夫是他的拜把老头子陈其美的儿子，陈其业（参政员）、陈其采（主计长）是陈其美的堂兄弟。研究院的翁文灏当了行政院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也当了大官。他需要用某个人时，他能把党证、官印、现钞一齐送上。

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的第三科即总统府人事处的第三科掌管全国各项人才之调查、登记和考核。各项人才包罗广泛，调查详尽，按性别、年龄、籍贯、出身、学历、专长，专门训练、经历、现任官职等分类编目登记，管理方法相当科学，对蒋介石抓权中之权——人事，随时要查阅资料，随时可以提供。如蒋介石要派一个科学代表团出国考察，代表团团长的条件是年龄四十岁左右，清华大学毕业，专攻物理，国民党员，并曾在中央训练团受过训，在军事科学部门工作，现官所简一阶或二阶，通英、德两国语言，留学欧洲或美国的。这样的人才不用远求，人事处第三科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向总统提出可供选择的人员名单。人事处第三科连科长共 22 人，侍从室是比较精干和办事效率高的。

总统府任用官员要有保证人。保证人资格，荐任职或校官及委任职或尉官之保证，以驻在南京之中央机关或地方机关现任荐任职或校官以上者 1 人，经认可者为合格。雇员之保证以现任南京机关之委任职或尉官 1 人，经认可者为合格。保证人应负法律上之连带责任：一、有“反动”行为；二、泄露公务上之机密；三、违法舞弊亏蚀公款公物；四、擅离职守；五、其他不法之行为。被保证人如因畏罪潜逃时，保证人应负交出之责。简任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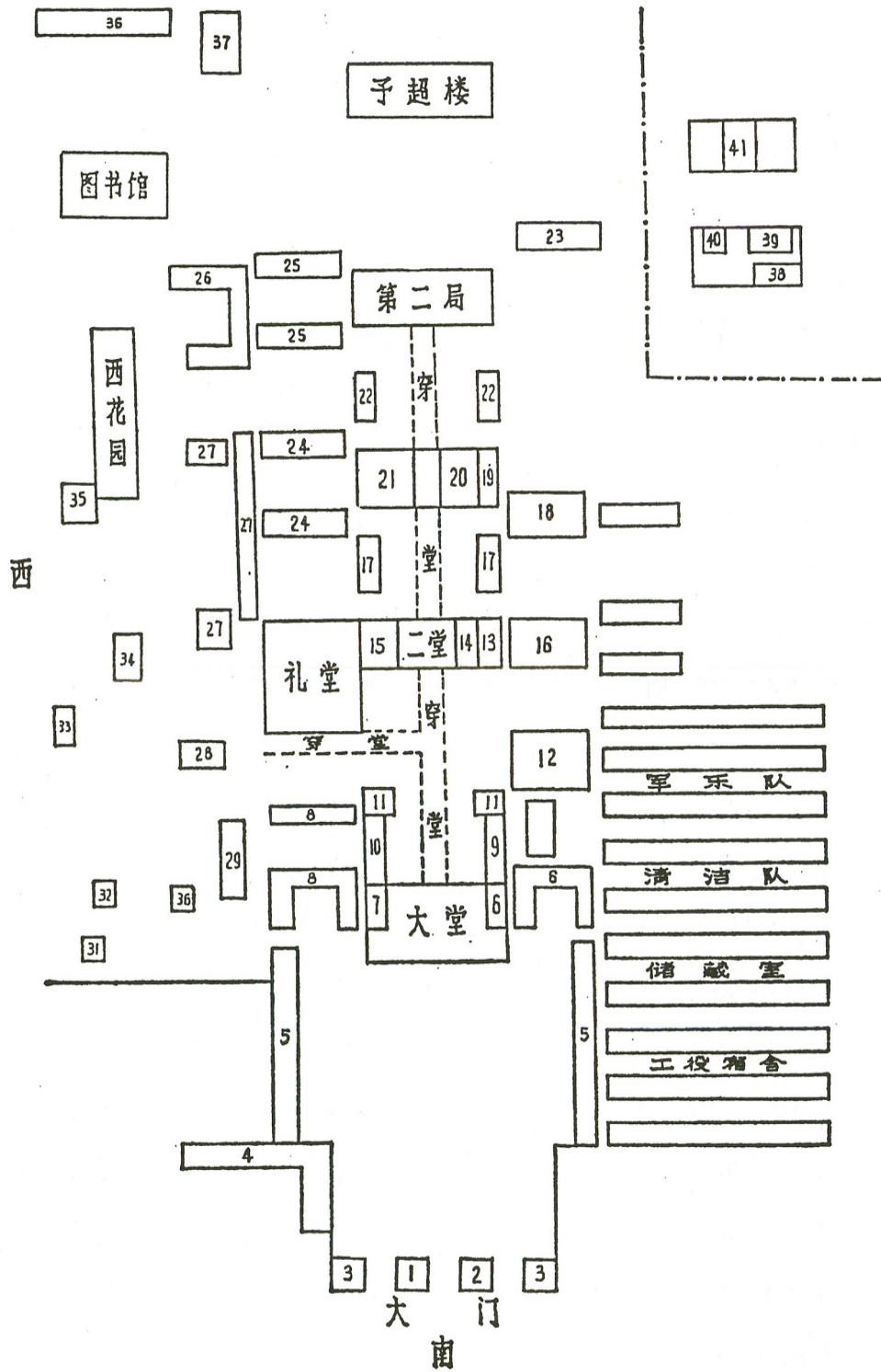
遇与上校同样要找保证人。总统府秘书长、参军长所属人员之任用在被任用人取保以后分别由秘书长、参军长先行派用,经铨叙部铨叙以后才予正式任命。

总统府机要室人员除取保任用外,还实行保密连保连坐切结办法:一、员役分别以3人互相连保签字盖章履行连保责任;二、发现同保之人有违犯保密规定嫌疑或事实应速密报,经查实而未损及公务时可减免罪行。

上述提供的资料,并不完备,笔者希望知情者不吝补正。

蒋介石的总统府在南京解放后由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接管,历年来进行多次整饬,现为江苏省政协办公地址。西花园内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办公处保存辛亥革命时期历史古迹,修缮一新,成为人们参观的文物单位。

(作者于南京解放初曾任南京市人民政府文物保管委员会接管总统府时的秘书)



蒋介石总统府示意图



1. 卫兵司令室
2. 传达室
3. 楼梯间
4. 交通科、汽车间
5. 兵舍
6. 机要室
7. 外收发室
8. 医务室
9. 会客室
10. 第六局交际科
11. 第六局管理科
12. 第六局局长室
13. 参军长室
14. 会客室(外宾休息)
15. 参军办公室
16. 第六局文书科
17. 参军处人事室
18. 第六局庶务科
19. 蒋介石休息室
20. 蒋介石会客室
21. 外宾接待室
22. 内收发室
23. 职员宿舍
24. 第四局
25. 第五局
26. 原孙中山先生起居室
27. 第三局
28. 桐音馆第三局局长室
29. 第三局高参室
30. 鸳鸯亭
31. 印心石屋
32. 石舫
33. 夕佳楼
34. 水榭
35. 中山堂(漪澜阁)
36. 档案室
37. 饭厅
38. 蒋介石办公室(子超楼二层)
39. 李宗仁办公室(子超楼二层)
40. 秘书长办公室(子超楼二层)
41. 国务会议室(子超楼三层)

蒋介石总统府示意图说明



林森与台湾的情缘

— 凡 夏 彪

1943年8月1日晚，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于战时陪都重庆，终年76岁。林森于5月10日晚乘专车回官邸，途经市郊化龙桥下坡时，因车方向盘失灵撞及路旁电线杆，由车身激烈震动而引发脑溢血，至此卧床两个多月。病中的一天，蒋介石及林森于辛亥革命前在九江创立“浔阳阅书报社”时的知己吴铁城等前去探望，林指着墙上挂的手书“抗战必胜”条幅，再三重托各位，抗战到底，勿忘光复台湾。蒋即捂胸坚决保证：“请主席放心，台湾必归祖国怀抱，以挽赎国家于台湾省骨肉同胞之亏负”。林在不能言语、神志不清的弥留之际，仍不断喃喃自语：“……台……湾，……台……湾……”。林森到底与台湾有什么关系？林称台湾为“第二故乡”，早在青年时代就与台湾结下了割不断的情缘。台湾是少年林森走向社会的地方，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青年时代；台湾使他亲临国破家亡的境地，是他跟随孙中山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起点。

—

林森，字子超，号长仁，晚年自号青芝老人。1867年3月16日（清同治六年二月十一日）出生于福建闽侯尚干凤港乡一个商人家庭。三岁时随父道炳移居福州，兄弟五人，森居长，二弟长义、四弟长智、五弟长信均早卒。三弟长礼，生一子名京，继森为嗣，曾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留美归国后，在绥远省政府任秘书，后于日军攻陷太原时阵亡。

林森6岁进私塾，始读经书。9岁入美国教会所设的培元学堂读书，



1884年肄业于美国教会办的鹤龄英华书院。当年冬,台湾知府派员来福州考募10名洋务通译,17岁的林森以年龄最小、成绩第一被录取。此时正值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违约进犯凉山被清军击退,转而派孤拔率舰队偷袭马尾港福建水师,击沉军舰11艘、商船9艘,官兵伤亡700余人。中法宣战。不久,法军侵占澎湖,封锁台湾海峡,不断偷袭基隆、沪尾等港口。知府执事即通知录取者居家待命,战事平息后再行。林尚有半年学业未完,本可以留下继续学习,待毕业后再作打算。但他却在美籍教师帮助下,独自登上停泊在港口的从日本开往台湾的美国商船,只身前往台湾。报到时,福建巡抚兼台湾知府刘铭传亲自召见,对少年林森在战火纷飞时不畏艰辛,冒险东渡,兼程而至,大大赞扬了一番。林亦受宠若惊,表示要“精心授事,不辱大人使命”。后分派到台北电报局任洋务通译。首次来台,一待就是四年。这期间,林除任中、英文通译外,还兼笔帖之类的文书抄写。因办事认真,谬误甚少,多次得到上司奖励。空余时,他常主动与美籍主簿练习口语,间或到附近的番学训练所学习日语。1888年冬,林首次回福州省亲。返抵家中,在他幼年时定下的闽侯郑姑娘,年已16,父母劝他早日成亲。他却以双方年龄尚小为由,拒而不受。翌年春,旋回母校复学,毕业后校方欲留任教习,他回复在台差事未完,退还聘书。仲夏,林三渡海峡,又回到台北电报局。不久,得悉巡抚衙门有意召他为幕僚,他急着接连七次上书巡抚刘铭传,陈述自己“才疏学浅,不敢上攀”,恳请留为原处,婉言谢绝。当年底,林升任通译主簿。1890年春节后,林突接火急家书,告知嗣父道举病危,催他立刻归家料理后事,林即四度海行,二次返家。谁知抵家时,伯父身体安健,倒是喜事已准备停当,日子也定了,只欠他这个新郎官。林悉受骗,当即推说差事在身,跑到码头买了五日后返台船票。后经大婶和母亲再三劝说,大伯和父亲一顿顿痛斥,他只好俯首认过,同意结亲。三日后,23岁的林森与18岁的郑氏完婚。两天后,林即返台。一直过了两年半,他均未回过家。一天,林接三弟家信告知郑媳已卧床半载,且日渐沉重。1892年秋,林三返福州,护理病中的少妻。翌年春,郑氏终因多年



肺癆不治而亡。林痛感自己未尽夫妻之責，对不起林、鄭兩家，遂立誓不再續弦，至終鰥居。

二

喪偶之後，了無牽掛，林又七渡海峽，再返台北電報局。台灣和澎湖歷來屬福建省轄，自 1861 年曾國藩辦安慶內軍械所，興起洋務運動以來，經欽差大臣沈葆楨、知府丁日昌、福建巡撫劉銘傳等人先後 20 余年的慘淡經營，對外興築炮台、修造船艦、操練民團、屢抗法軍侵犯；對內開山撫蕃、興築鐵路、大辦郵電、推行夷州新政，確已有一些成效。1886 年（清光緒十二年），即林首次赴台第二年，台灣設省制，劉銘傳授任台灣巡撫，誓將台灣建成“一隅之設施，為全國之范”。林此次返台，鐵路自基隆南下，已鋪至新竹，台北新城內除巡撫衙門、布政司衙門等早已竣工外，又新建成番學堂、西學堂、郵政局、機械局等新式機構。但好景不長，1894 年甲午戰敗，隨着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滅，洋務運動徹底破產。次年 4 月 17 日，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和澎湖等地。“城頭逢逢雷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台灣去”，詩人黃遵憲字字血淚，寫出了當時中國人民的極度憤慨。割台凶耗傳到台灣島，台北立即鳴鑼罷市，市民湧進巡撫衙門，抗議清政府的賣國行徑。此時 28 歲的林森，即將電報局同仁組成義軍，同時又把兼任教習的中西、電報兩學堂的師生組成聯合義軍，準備抵禦來犯之敵。三處往來組織安排，日夜操練拳腳刀槍，他一介文弱書生，經一個多月的奔走苦練，已精疲力盡。隨着時局日趨緊張，操練亦越發加緊，林身體漸漸不支，至端午節前一天忽昏倒在地，被同仁抬進醫院。1895 年 5 月 29 日，端午節後次日，日軍陸續派出三個近代化師團和一支海軍艦隊，共 40000 余人，從北、中、南三個方向進攻台灣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等地。林在病中，日軍攻占基隆。清政府派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為“割台大臣”，遂在基隆口外日艦上與日方代表簽署交割台灣協定。接着，日軍又從鹽寮登陸，當地義軍拼死血戰，全軍覆沒。日軍直入迂回襲擊



台北侧背,此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闻讯,却不战而放弃台北,偷偷地和一批官吏士绅,坐上法国商船逃归大陆。林病愈后,台北已被日军侵占。电报局由日人主管,原职员须重新登记。面对日军的威逼,林拒绝登记,愤然辞职。四日后,林辞别同仁,怀着国破家亡的悲愤心情,搭上美国邮船,八渡海峡,返抵福州老家。台湾军民经过五个月的艰苦奋战,随着黑旗军统领、台南总兵刘永福战败,偷乘英舰逃回厦门,台南陷落。十月下旬,日军占领台湾全境。

三

回家不久,林被聘为鹤龄英华书院英文教习。林前后任职三年余。由于甲午战败,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帝国主义掀起了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资本主义各国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办工厂、银行,抢夺铁路投资,进行政治贷款,强占军事基地,划分势力范围。亡国的灾祸,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在此期间,国内外陆续发生了三件大事,又一次次激发了林森。一是甲午年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次年春,兴中会在香港设总部,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遂逐步向内地发展,遍及湖广闽浙等地。当年10月,兴中会在广州发动首次起义失败,陆皓东等革命志士被捕遇害,孙中山逃亡日本,清政府捕杀乱党的消息时有新闻。二是从英文报纸上看到,孙中山从日本经美国到英国宣传革命。一天,在伦敦被清驻英公使龚照瑗诱捕囚禁,预谋伺机暗解回国处死。后经孙的老师英人康德黎等奔走营救,才脱险出来。三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失败。康、梁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光绪帝囚于瀛台,西太后又一次“临朝听政”。得悉这些消息,身为教习的林森,想到在台北的亲身经历,常常在课堂上拍案痛斥清政府的残暴腐败,对内戮杀志士,压迫百姓;对外卑躬屈膝,割地赔款。时时歌颂孙中山有远见有作为,赞扬兴中会提出的革命主张。林的言论在师生间引起震动,校方请他收敛一些。谁知林却越发激昂,一次在校会上竟



泪如雨下，痛陈清王朝的专制腐朽无能，从甲申到甲午，屡战败屡割地，害国家误民族，此国不亡谁亡？台下师生一片凄然。

四

1898年冬，一日夜间忽有一位在福州知府当差的亲戚来校急告，福州地方乱党黑榜上有林森和林雨时的名字，叫他们赶快离开。林雨时系林森本家堂弟，英华书院毕业后回闽侯任职，后于民国初年曾任林森秘书。逃到哪里去？别的地方无亲无故，只有一条路——再去台湾。此次东行是五度赴台，九渡海峡了。前几次是为官府当差，用熟练的英文和自学的日文在电报局当通译，力求精通业务，丰衣足食，荣宗耀祖，不想政局腐败，国破家亡，不堪回首。此次却是戴上了“乱党”的帽子，为躲避杀头之罪而逃亡台湾。台湾的林姓多为从福建去的望族大户后裔，遍及全省各地。林森首次赴台至现在均用林长仁这个名字，为了躲过官府的耳目和日本人的猜疑，林决定此行改名不换姓。经过一天一夜海行，火轮到了台北大稻埕码头。经日警盘问，此大陆来的男性青年用流利的日语回答：“本人姓林名森，字子超，31岁，大陆福建闽侯人，不堪忍受大清国的腐败，为求生计，偕堂弟雨时到台湾来投亲靠友，混一碗饭吃，请多多关照！”林森和雨时来到码头附近同乡张少湘开设的留芳照相馆歇住。此时，台湾已被日本称作“高砂岛”，台北的太平街改称“太平町”，照相馆成为“写真馆”。街墙涂满三井物产及日本仁丹之类的广告。台北的城墙在日军吆喝下正在拆除，原巡抚衙门前旗杆上的大龙旗已换成太阳旗，仿佛到了日本国土地，而市面上往来人群讲的都是闽南客家话。所闻所见，触景生情，林森不禁黯然泪下。好不容易熬过了年，一天张少湘从外面回来告知，在街上看到法务部招募通译的公告，劝林森前去应试。林以流利的日、英口语和规范通畅的译文，一试即中，旋被分派到台南法院嘉义支部法院任通译。

林此次赴台前一年，孙中山派陈少白来台北发展兴中会工作。不久，陈通过兴中会老会员、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台的台北良德洋行总帐杨心如，



结识洋行老板吴文秀、广东商人赵满朝、容祺年等人，组成兴中会台湾支会，杨任负责人。在嘉义不到一年，1899年秋，林森经杨心如等人介绍加入兴中会。旋即，杨按孙中山从日本横滨来电指示，派林森回福州，筹建福建地方兴中会。杨以商量的口吻对林说：“兴中会现在福建仅有会友，还没有支会组织。林先生桑梓任教多年，门下必定可观。贵宗亲又是闽台两省望族，林氏子弟也向皆卓越有为。凡此地利人和，莫不有利于开展革命工作。所以孙总办视足下为堪当方面大才，福建地方革命发展非倚重林先生不可。只是听说足下所以来台，还因家乡那边已遭满虏所忌，无法存身。此情之下返里甚是危险，不知足下有否顾虑？请林先生衡量裁夺”。林当即表示：“既入组织，当死不辞，定不畏艰险，广收会员，早日筹设福建支会，积极开展驱虏运动”。是年冬，经张少湘一番打扮，林森唇上留着日式短髭，戴着金边近视眼镜，额后装上一根假辫子，提着放有用密码编成的福建省兴中会会员冯超骧、饶辅廷等20余人名单的柳藤箱，俨如一位富商少爷，带着堂弟林雨时，在台北大稻埕码头，登上开往福州的火轮。

船行淡水河出海，林森一片依依之情。他17岁少年初赴台湾，15年间九度海行，5次来台，前后在台12年。如今是十渡海峡，返回故里。虽不好断言就此即将与台湾长别，也估计短时间内难有东渡之行。现在他已32岁，步入中年，才算是孙中山所创兴中会的一名新会员，始踏上反清革命的征途。

五

此后40多年，林森一直把台湾称作“第二故乡”。终因政局多变，林辗转南北，奔赴欧美，再没有去过他日夜思念的台湾。抗战爆发，1937年11月初，年已70高龄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随政府文职人员溯江迁到重庆后，还时时打听台湾的消息。他忘不了青年时代在台湾度过的动荡生活，忘不了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起点，至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台湾。

林森逝世3个多月后，11月17日，国民政府为林在重庆歌乐山下双



河桥旁举行国葬,墓志铭为叶楚伦撰文,居正书写,吴敬恒篆刻,其墓至今尚在。

(作者为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筹] 副研究员 南京图书馆特藏部 助理馆员)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1980 年。

[2]朱西宁:《林森传》,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社 1982 年。

[3]丘斌存:《林子超先生与台湾》,台湾《传记文学》(第八卷第二期),1966 年。

[4]台湾国史馆:《前国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遗集》,台湾国史馆 1966 年。

[5]叶楚伦:《国民政府林故主席墓志铭》,1943 年 11 月 17 日。

[6]《中央日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大公报》、《新蜀报》、《益世报》:重庆,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五月至十一月。



李宗仁在南京任副总统与代总统的日子

沈 旻 沈 岚

李宗仁(1890~1969年),字德邻,广西临桂人。作为国民党桂系元首,李率八桂子弟同蒋介石有过北伐、抗日时期的相互合作,更有你争我斗的激烈交锋。而国民党军队全面溃败则为李宗仁及其桂系暂时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表演舞台:经二十多年与蒋氏的反复较量,李宗仁从一名地方实力派领袖一跃而为中华民国副总统,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又登上代理总统宝座,达到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这其中固然有桂系首脑们通力协作、运筹帷幄之故,也有美国政府“走马换将”、推波助澜之效,而导致风云变幻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战争。正是这场摧枯拉朽的伟大变革,决定了蒋家王朝在大陆最终覆灭的命运,也造就了李桂欲挽颓势而不得的结局。

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美国深感南京政府前景堪忧,其对华政策开始了“急转弯”。6月,美特使魏德迈来华视察期间,曾与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有过接触,他在稍后发表的声明中说,中国的复兴“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袖”,对蒋介石很是失望。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由南京向国务院发出一份特别报告,内称:“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由此可见,美国人已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李身上。李宗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民主将军”的面目适时登场了。

李宗仁早就不安于北平行辕主任一职,一则认识到国民党在东北、华北的军事几无希望,急欲借机从北平险境中解脱出来;二则为与华府调整



对华政策的举措相呼应,故决定参加1948年春“行宪国大”副总统一职的角逐。他从北平赶到南京,住进国防部设在大方巷21号的招待所内,会同黄绍竑、程思远等桂系智囊积极筹划竞选事宜,并以太平路安乐酒家为竞选大本营,决策机关另设于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公馆内。

总统“选举”可谓波澜不惊,蒋介石虽故作姿态仍顺利当选;副总统的竞选却因有蒋桂直接交锋而风波迭起、好戏连台。蒋介石先用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由党内提名的规定来压李宗仁,李毫不退让,声称党内不提名就在党外竞选,还与同时参选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程潜结成攻守同盟,志在必得。蒋被迫收回成命,又企图凭借中央的权力、财力支持总理哲嗣孙科当选,下令CC系陈立夫负责有关事宜。岂料陈独揽助孙竞选引起党内其它派系妒忌,唯恐其得手后更得蒋氏专宠,于是都转而支持李宗仁,局势反而对李有利。国民大会三轮投票下来,李宗仁得票最多,一直领先孙科200票左右,但尚不足法定多数。为阻止李氏当选,蒋介石加紧活动,一方面制造舆论,说李有逼宫夺权的打算,一方面压其他候选人退出竞选,把所得票改投给孙科。李宗仁针锋相对,以“国大代表不能自由投票”为由宣布放弃竞选,孙科不得已也退出竞选,使国民大会一度陷于瘫痪状态。李氏以退为进的策略果然奏效,多年来不满蒋介石的人几乎全站到李桂一边,蒋介石也不得不出面要求李重新参选,无形中令对手势力大增。

1948年4月29日,李宗仁终于在第四轮决选中以微弱多数击败孙科,当选国民政府第一任副总统。尽管据1946年底国会通过的宪法条文规定,中华民国副总统没有多大实权,但毕竟这次在国大内进行的蒋、李对抗以李取胜告终,这不仅堪称桂系在中国政坛上的一项杰作,更是对蒋介石个人权威的严重挑战。

正副总统就职典礼上,蒋介石给了即将就任的李副总统一个不大不小的教训。关于此事,李宗仁30年后在回忆录中如是叙述道:“按政府公布,总统与副总统就职日期是五月二十日。我照例遣随员请侍从室转向蒋先生请示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我听了颇为



怀疑,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蒋先生尤其是喜欢提倡民族精神的人,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但他既已决定了,我也只有照办,乃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孰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我当然只有遵照。”

李宗仁接着又回忆道:“五月二十日,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数百人皆着礼服,鲜明整齐。各国使节及其眷属也均着最华贵庄严的大礼服,钗光鬓影与燕尾高冠相互辉映。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在这种气氛中,我深感到穿军便服与环境有欠调和。孰知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相形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蒋先生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仅此一幕,即可预料蒋、李二人未来共事的前景了。

当初蒋介石为拆开李、白,把白崇禧调到南京当政府首任国防部长,如今李宗仁当上副总统回到国民党中央,为不让两人同处一地,蒋又将白崇禧调离总统府,到武汉担任华中“剿总”司令,遗缺由蒋嫡系大将何应钦顶替。由于蒋介石一手独揽大权,挂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虚名的李宗仁在南京备受冷落,连重要会议和外事活动都很少通知他参加,国家大事更是无权闻问。总统府大院内办公大楼“子超楼”的二楼、总统办公室对面的两室套间是副总统办公室,但由于蒋、李两人矛盾已深,彼此心照不宣,所以李宗仁很少去那里办公,免得同蒋介石经常照面,而是以城北的傅厚岗69号(今南京市鼓楼区傅厚岗30号)为官邸过着无所作为的日子。当时有报刊讥评道:“李宗仁在总统府里,恐怕只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算是唯一的点缀,也可以说是唯一的胜利象征”。表面上优游养望的他实则以静制动,待机观变。

是年入夏以后,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三大战役先后打响,国民党军事局势的不断恶化,使蒋介石统治根基发生根本性动摇,李宗仁蛰



伏以待的时间也因之大大缩短。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频繁发出报告,探询对策,并在辽沈会战国民党军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向国务卿马歇尔明确提出“委员长退休,让位于李宗仁,或其他较有希望组成非共产之共和政府与较能有效与共党作战之政治领袖”的建议。华盛顿方面对蒋也越来越丧失信心,终于决心采取切实步骤“弃蒋扶李”。

李宗仁当然感到气候的变化,于10月间公开亮出“和平”主张,得到立法院部分立法委员支持,中枢干要里“主和”人士日渐增多。不久蒋系内部也显现离心迹象,黄埔系、复兴社、三青团以及国大代表、中央监执委中有30多人秘密誓约参加“拥李主和”运动,推李宗仁出面主和的呼声日益高涨。李宗仁在南京抢过“重开和谈”倡导权的同时,白崇禧则在汉口拥兵抗命、遥相应和。蒋介石为挽救危局打算把中原军事统交白崇禧指挥,白原已应允,在其飞回南京同李交换意见后却幡然变计,不愿再承担中原军事了。蒋因此对李宗仁更加忿恨,立即召集军统头目毛人凤、沈醉在李住宅周围布置暗杀事宜。然而一个月后,蒋嫡系精锐部队在淮海战场作战不利、覆没在即,手握40万大军指挥权的白崇禧更加重了李桂一方的筹码,蒋鉴于情势,只得又取消了密谋已久的暗杀计划。

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条战线上均遭致命挫折的蒋介石,权衡全局后乃决定退居幕后,让李宗仁出来缓和局面,为己谋得喘息时间,伺机东山再起。1948年12月24日,蒋正式任命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为自己下台作准备。12月31日,总统府总务局交际科奉命发出通知,邀请李宗仁、五院院长及中央常委40多人参加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举办的晚餐会。饭后蒋宣读了由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拟就的求和文告,并愤而表示“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矛头直指李、白为首的桂系,痛恨之情溢于言表。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各方强大压力下宣告下野,离任文告中却闭口不谈辞职之意,仅言“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翌日,李宗仁发表就任文告,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中华民国代理总统。然而,蒋介石引退前已作



好部署,国库里的大量外汇和货币储备被运往台湾,军事系统及装备也转移至台,除桂系所在地区与部分省份外,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官员仍受命于蒋,连曾当过李宗仁幕僚的新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也直言不讳自己唯蒋命是从,而代理总统所在政治中心——南京,也处在蒋方亲信、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直接控制下。在李宗仁入主总统府之前,蒋当然不会忘记下令府内各局“整理全部机密档案”,特别是让军务局将有关李桂的材料全都拣出销毁,以免给对方留下口实。蒋去李来,总统府一般人员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就是来往文件、材料明显减少,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坐镇溪口,手中仍紧握住党政军大权不放,另一方面则因为李宗仁除在此参加一些礼节性活动和召开重要会议外,同亲信商谈、决定主要军机大事的地点仍以傅厚岗官邸为主。尽管代总统能将总统府原亲蒋警卫中队全部换成自己的桂系部队,却无法改变蒋氏亲信遍掌军政要职的状况。

李宗仁既无经费,又无实权,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的政府内阁又雪上加霜,竟在蒋氏操纵下擅自迁往广州办公,中央各院、部、会、署等机构和总统府各局官员也纷纷南迁,使南京顿成半空状态,总统府只能靠代总统和几位桂系秘书长支撑门面。府院分裂不仅使李宗仁陷于难有作为的困境,就连南京政府的存在似乎也成了问题:说它在南京,但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说它在广州,但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关,而没有政府首脑;说它在溪口,但溪口只有一个宣布“引退”的总统,而党政机构均在广州——“一国三公”的局面使南京国民政府更处在四分五裂的境地。

李宗仁是以“主和”为口号上台的,为摆脱处处受人掣肘的困境,也惟有以“早启和谈”为第一要务。上台伊始,他主动发起“和平”攻势,邀请沪上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出面斡旋与中共和谈事宜,还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1月24日,他以“代总统”名义发布取消全国戒严令、释



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活动等命令，不过这些命令竟无一真正实行。27日，他又亲自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愿在“中共八条”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尽管李宗仁在“和谈”问题上做足文章，但真实意图是想通过“和谈”稳定局势，争取时间，企图保全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同中共分庭抗礼，重演隔江对峙的“南北朝”史。因此当行政院政务会议讨论和谈方案时，李宗仁将“就地停战”、“划江分治”两项确定为和谈要旨。

3月30日，准备参加北平谈判的首席代表张治中，携腹案赴溪口向蒋请示后回到南京。次日下午四时，李宗仁在总统府“子超楼”举办茶会，特邀五院院长、国民党留京中央常委一起听取张治中溪口之行情况汇报，并商谈有关和谈问题，最后决定由李宗仁发起，在宁成立“中央和谈指导委员会”，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孙科、吴忠信等11人任委员。

4月1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离京北上，所带去的“和平”方案与中共提出的和谈八项原则实际相距甚远。中共已洞悉了南京方面搞划江而治的“求和”底蕴，坚持“无论和战，人民解放军都要过江”的立场，给李桂以当头棒喝。就在同一天，南京高等院校有上千名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谈的阴谋，并到总统府门前请愿，要求面见代总统。李宗仁派出总统府代秘书长邱昌渭接见学生代表，表示将保证学生生活和教育经费，称自己也和学生一样期望和平。但是就在当天下午，总统府大门前竟发生了军官暴徒殴打学生的“四·一”血案——李宗仁如今已身不由己、焦头烂额，根本无法实现当初自己有关“和平民主”的种种承诺了。面对李宗仁上台后更为恶化的国内形势，扶李上马的杜鲁门政府也停止继续对华援助，采取了“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策略。曾为美国人带来希望之光的李宗仁在他们眼中已变得黯淡无奇了。

北平和谈期间，李宗仁曾多次在傅厚岗私宅内召集白崇禧、黄旭初、程思远、李品仙、夏威等桂系头目与骨干会商时局，众人对达成和谈结果已都不抱奢望。李还派飞机送夫人郭德洁、程思远夫人石泓以及黄旭初等



人先行返回桂林,暗示了南京已不可久居。4月16日,南京代表团和谈代表之一黄绍竑带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返京请示,进退维谷中的李宗仁既不敢擅自接受协定,又不敢断然以拒、自绝生路。此时桂系内部亦发生严重分歧,黄绍竑审时度势,主张接受和平;白崇禧却因桂系主力尚存,反共态度强硬。争执结果,李宗仁仍不能下定决心同蒋决裂,最后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和谈终告破裂。4月20日24点一过,中共中央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横渡长江,至此,李、白“隔江分治”的幻想彻底破灭。

4月2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的杭州会议决定,总统府和行政院次日由南京迁到广州办公。大批辎重物品和人员从总统府涌出,分别向火车站和京杭国道方向奔去,一阵忙碌混乱之后,总统府内遍地狼藉。当天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城里已听得见隆隆炮声和不绝于耳的机枪声,李宗仁参加完会议由杭州飞回南京,在傅厚岗官邸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23日七点半钟,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为李代总统备车,总统府随员30余人乘吉普车随行开往明故宫机场,众人大多通宵未睡,面色惶松而紧张。飞机匆忙起飞后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随即转翼向东南方飞去。李宗仁就这样黯然告别执掌才几个月的总统府,待17年后他偕夫人从海外回归祖国怀抱,有幸携友故地重游,南京早已换了人间。

(作者为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筹] 馆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编辑)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

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

申晓云:《桂系元戎李宗仁》,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编后记

江苏省委、省政府于1998年8月决定在原南京民国总统府旧址筹建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并由江苏省政协、江苏省文化厅等单位落实筹建工作。参加筹建的江苏省文化厅工作人员在对原民国总统府遗址及其建筑遗存进行考察的同时，面对众说纷纭的历史传说，经反复查对文献档案及原始图片资料，拨开层层迷雾，还其本来面目，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基本理清了长达300年之久的现南京民国总统府遗址的历史沿革，初步明确了现存建筑群晚清至民国时期近130年的兴衰状况。

该集的编纂，得到了海峡两岸朋友们热心帮助和大力支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博物院、南京图书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房产管理局以及台湾国史馆、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社等单位 and 部门给予我们许多帮助。特别感谢提供有关资料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蔡鸿源研究员、协助查找资料的南京图书馆特藏部夏彪先生及参与我们实地测量的江苏省政协管理处万载洪先生。江苏省文化厅领导自始至终给我们的工作以指导、支持和帮助；《东南文化》编辑部的同志们为文集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由于时间仓促，该集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望专家学者和朋友们指正。

编者

2000年3月于西花园

《东南文化》编辑委员会

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承源 王世襄 史树青
冯其庸 朱家溍 季根章 张忠培 严文明
汪庆正 杨仁恺 杨伯达 苏东海 俞伟超
耿宝昌 黄远竹

主任 徐湖平
副主任 奚三彩 金实秋 郑旗 詹引
委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车广锦 谷建祥 沈遐龄
张敏 金实秋 邹厚本 郑旗 奚三彩
徐艺乙 徐湖平 殷志强 康雪莲 詹引

主编 徐湖平
副主编 谷建祥(常务) 徐艺乙
编辑部主任 谷建祥
编辑 田名利 黄海涛 庞鸥 万新华
美术编辑 史晓蕾
编务、校对 申宪 何刚
广告、发行 王强 董博
英文翻译 孙长初
电脑照排 许定富

编辑出版 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社

地址 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 邮政编码 210016

电话 (025)4806201 传真 (025)4802061

E-mail: dnwh@public1.ptt.js.cn

印刷 南京花园印刷厂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

国内发行 全国各地邮局(所) 订阅代号 28—236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发行代号 1152Q

特约经销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西街40号

文物出版社门市部 邮编 100052

2000年增刊2

建 築 執 照

南京市政府工務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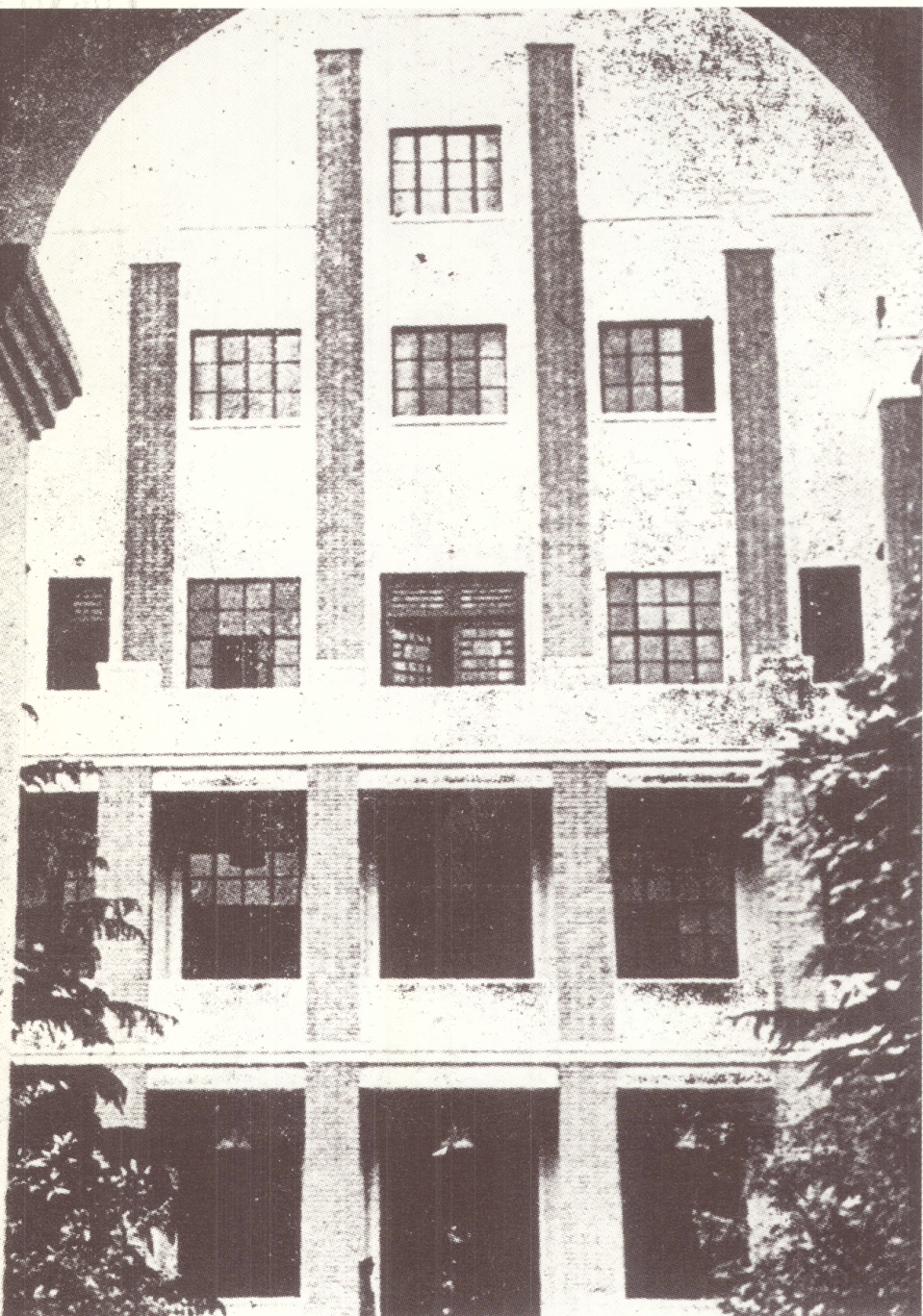
發給執事茲據承人 **文書局** 報請建築業經本局查核尚無不合情事合行發給執照
 准予興工建築此照

建造地址 本市第一局國府內街第

業主 **國民政府文書局** 住第一局人街第

承建人 **文書局** 住第一局人街第

號門牌
號門牌
號門牌



國民政府文書局大樓（“子超樓”）

架立離地以免危險
備查

時作場 二十
向核准後再啟
價 六九五三元
月 月 月 月
日 日 日 日

向收執